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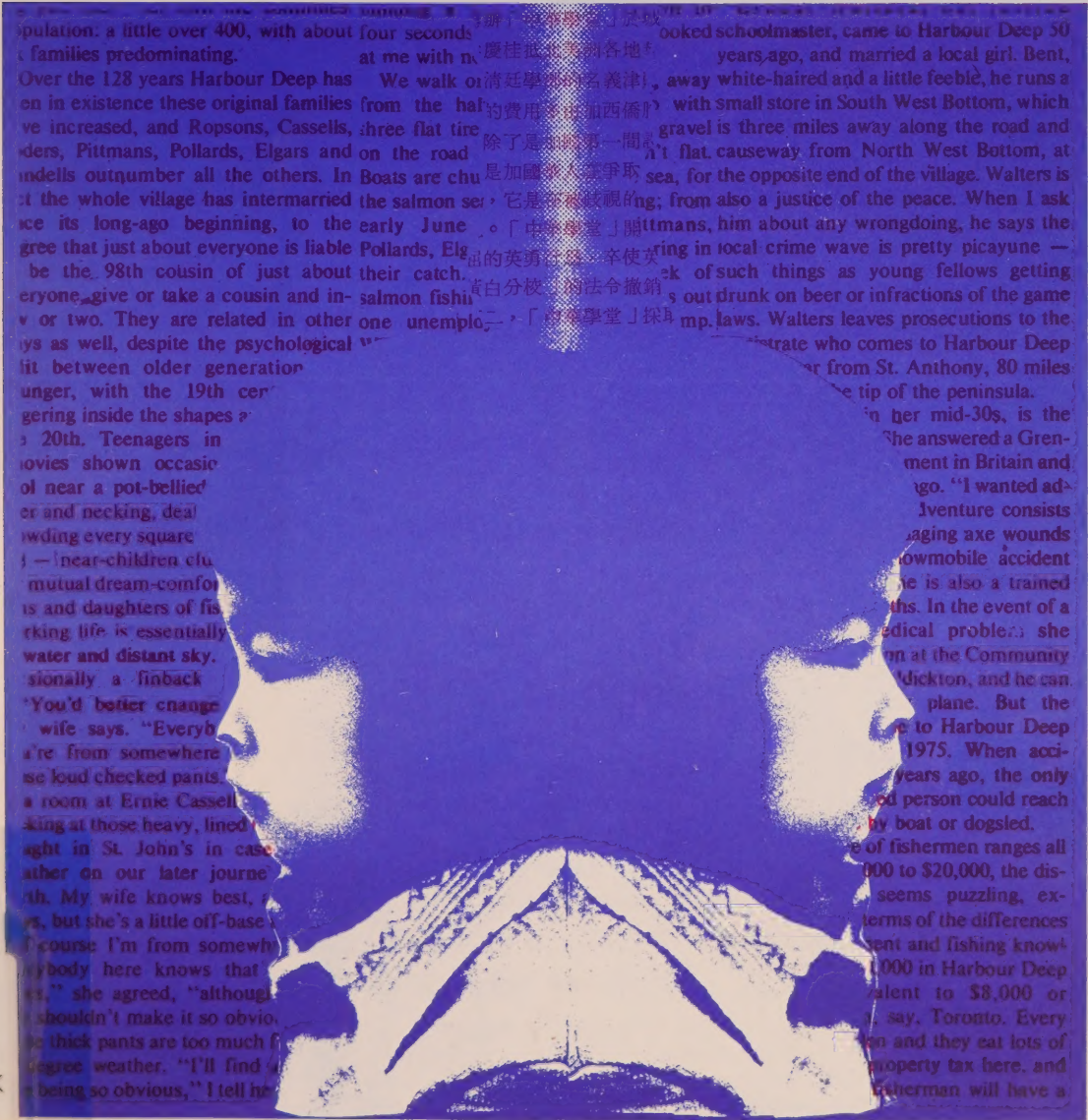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8043536 5

海外述林

月刊

THE CROSSROADS monthly

第二期 1977年2月號



population, a little over 400, with about four seconds
(families predominating.
Over the 128 years Harbour Deep has
en in existence these original families from the
ve increased, and Ropsons, Cassells, three flat tire
ders, Pittmans, Pollards, Elgars and on the road
ndells outnumber all the others. In Boats are chu
t the whole village has intermarried the salmon ser
ce its long-ago beginning, to the early June
gree that just about everyone is liable Pollards, Elg
be the 98th cousin of just about their catch
eryone, give or take a cousin and in-salmon fishu
v or two. They are related in other one unemplo
ys as well, despite the psychological
lit between older generation
unger, with the 19th cer
gering inside the shapes
s 20th. Teenagers in
ovies shown occasio
ol near a pot-bellied
er and necking, deal
rding every square
s — near-children chu
mutual dream-comfor
is and daughters of fis
rking life is essentially
water and distant sky.
sionally a finback
"You'd better change
wife says. "Everyb
s're from somewhere
se loud checked pants.
a room at Ernie Cassell
king at those heavy, lined
ght in St. John's in case
ather on our later journe
th. My wife knows best,
s, but she's a little off-base
I course I'm from somewh
ybody here knows that
es," she agreed, "althoug
shouldn't make it so obvio
se thick pants are too much f
egree weather. "I'll find
being so obvious," I tell h

「辦」的學期，「於」
：「桂」此，並到各地
：「清廷學制（名義津）
的費用，並由西僑」
除了是加國第一間
是加國華人學取
它是加國就視
「中法學堂」開
出的英美德法，幸使英
黃白分校，的法令撤銷
二，「中法學堂」採

ooked schoolmaster, came to Harbour Deep 50
years ago, and married a local girl. Bent,
away white-haired and a little feeble, he runs a
with small store in South West Bottom, which
gravel is three miles away along the road and
a flat causeway from North West Bottom, at
sea, for the opposite end of the village. Walters is
ing; from also a justice of the peace. When I ask
ttmans, him about any wrongdoing, he says the
ring in local crime wave is pretty picayune —
ck of such things as young fellows getting
out drunk on beer or infractions of the game
mp. laws. Walters leaves prosecutions to the
strate who comes to Harbour Deep
from St. Anthony, 80 miles
the tip of the peninsula.
in her mid-30s, is the
She answered a Gren
ment in Britain and
go. "I wanted ad
venture consists
aging axe wounds
owmobile accident
he is also a trained
ths. In the event of a
edical problem, she
on at the Community
dickton, and he can
plane. But the
e to Harbour Deep
1975. When acci
years ago, the only
ed person could reach
by boat or dogsled.
e of fishermen ranges all
000 to \$20,000, the dis
seems puzzling, ex
terms of the differences
ent and fishing know
000 in Harbour Deep
alent to \$8,000 or
say, Toronto. Every
en and they eat lots of
roperty tax here, and
fisherman will have a

余
097.1
no.2
77:Feb.)
NADA_HK

專題：北美洲的中文教育往何處去？● 加拿大移民新法案

恭賀新年

海外述林
同人敬賀

海外述林目錄

第一卷第二期

1977年2月號

(總第二期)

二丁整理

李安納·溫哥華

瑞蓮·三藩市

本刊記者

本刊記者

天

於天

編輯部

何澤生

向東

方生

金帛

二丁

仁

李懷敏

學生

無業游民·溫莎

魯平·溫尼泊

學永

李落

梁啟超

一丁

編者

專題：北美洲的中文教育往何處去？ 3

早期北美洲的中文學校 6

爭取中文教育機會的先例 7

關於新移民法案的幾點問題 訪問簡家聰律師 8

加拿大移民新法案 10

附新移民法案最重要的部份 11

種族不和二三事 13

今年的經濟展望 14

華人地產事業問題 訪問嘉年地產實業公司陳慶之先生 15

民生與經濟（長篇連載之二） 18

四度時空：寓言一則——悼某君 20

無望的禱告

給你的一封信 21

並不存在的第四度

「魁北克國」的面積該多大？ 22

哄動一時的豬型流行性感冒 23

讀者來函 25

經濟評論——資源、人口、制度 27

加了人工後你實際得益多少？

「四人幫」座談會紀錄 30

談金剛 34

母親，請你不要震怒！ 35

一位不喜歡多倫多的漫畫家——啞視機 36

北美洲華僑史（長篇轉載之二） 38

兄弟之間——魯迅與周作人（之二） 39

編者的話 42

Editorial 43

A History of Racism in British Columbia 44

Race To Race 48

Education In China 51

Impressions of Toronto's Chinese Press 52

"Shaking and Doing" in Chinatown 54

The Changing Face of Toronto's Chinatown 56

Shur Kang-di

Mei Hua

Fong Che-kao

Eric Walsh

Lau Bo

William P. Wen

北美洲的中文教育往何處去

■二了整理■

孩子問為什麼要學中文

「Ms. Chan，為什麼我要學中文？」一個六歲大的華裔兒童在課室裏問教師。

陳老師猶豫了一會，很多的念頭忽然間浮現在腦海裏。她感到有些混亂和迷惘，最後不得不含糊地以「因為你是中國人嘛！」回答了學生的詢問。

孩子們並不滿足這個回答，覺得老師並未能解答他心目中的疑問。

而事實上，陳老師亦的確是沒有圓滿的解釋給孩子知道他為什麼要學習中文。

上述的情形相當普遍，在北美洲各地中文學校教授的老師一定經過同樣的窘境。孩子們這些詢疑為什麼要學中文的眼光在溫哥華的文疆學校裏出現過，也一定曾經在多倫多「兒童樂園」（多市東區兩間中文學校的統稱）的課室裏被提出。

華裔子弟們提出這個問題是非常合理的。他們大部份是生於斯，長於斯的兒童，在法律上和社會上他們擁有該國的公民身份，雖然在實際日常生活中，華裔土生的教育和就業機會並不一定與其他的公民均等。在北美洲，打從曉得觀看電視節目時開始，孩子便藉着各種媒介去體認當地大多數民族的生活習慣，包括文化、語言和價值標準。自然，孩子們的思考能力還沒有發展到深入辨別事物的程度，他們仍是在吸收的階段中，待年紀稍大後才可以把學習得來的東西加以消化和提昇。兒童們對「祖國文化」、「根源」和「認同」等概念是含糊的，也不是他們這個初長階段裏急切需要知道的問題。「平等」却是他們比較關注的東西；例如說，哥哥有一隻香蕉，弟弟也一定要有，否則可能大打出手；隔鄰的小弟弟有一輛三輪單車，本家的子女也會央求父母購置一架。因此，在課餘或周末，該是孩子們遊玩的時間而將他們送到中文學校去上課，總被孩子們視為不公道的對待。撇開部份父母們將中文學校看成育嬰院這一點不說，英裔兒童除了日間必需上課的數小時外，餘下的時候他們便可以「自由」頑耍，而華裔兒童卻被安排到中文學校去讀書，孩子們的反抗是必然的。學習中文是對祖國文化有所認識的基本條件這一點不是他們幼小的心靈可以理解和接受；反之，孩子們會視它為一種針對他們的懲罰，是父母強迫他們留在學校裏，取去他們玩樂機會的不公平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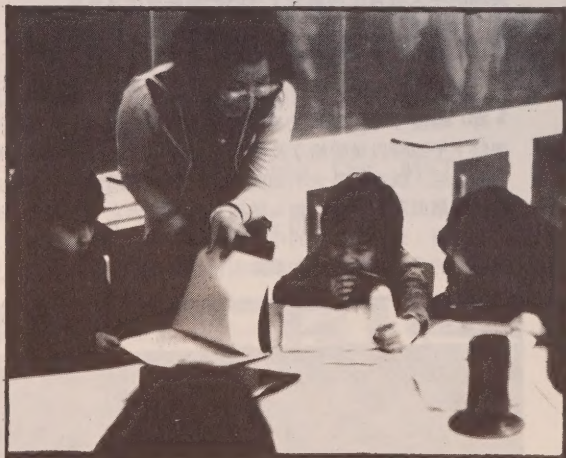
明顯地，基於這種社會條件下的中文教育是毫無意義的，其效果是反面的。孩子們對中文和中國文化祇會更加反感和抗拒。

社會背景

小數民族的語文使用在北美洲一直是被壓抑和不受歡迎的。不要說原來是北美洲主人的紅印第安人的語文將要如中國古

代的甲骨文一樣，祇有學院裏研究它的教師們才會通曉。還是加拿大兩種官方語文之一的法文，在加拿大也是受到排斥的遭遇。法裔加人在加拿大不能算是一個小數民族，況且它還有着開國民族之一的令譽；其它小數民族的語文在北美洲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

小數民族，尤其是那些剛踏足在北美洲這塊土地上的新移民的子女們，在學齡前使用的語文多數是長輩慣用的祖國語文。兒童入讀幼稚園以後，開始接觸一個新的環境，一個與自己家庭全然不同的世界。北美洲（包括大部份的加拿大和美國，也許魁北克省和加州除外）現行的英語教學制度迫使小數民族的子弟必需在極短的時間內曉得學會使用英語，那樣他才可以與其他的兒童交談或玩在一起。社會對小數民族語文的不尊重，做成教師發覺兒童交談時使用的不是英語，而是自己的母語的時候，露出譴責的眼色，助長了屬於大多數民族成員的兒童輕視和恥笑小數民族語文的使用。華裔土生兒童一方面以為自己既然是當地公民，表面上有着與其他兒童同等的權利享受，一方面又希望被大多數民族成員的圈子所接納，他們對這些譴責的眼光和恥笑更為敏感，在日常生活的行為上努力做到被認許的程度，因而對使用自己祖國語文失却信心。這是為什麼部分華裔子弟的日常生活方式表現得「比白種人還要白」的原因。



一九六九年，加拿大魯杜多政府在魁北克省要求獨立的高漲氣氛下，推出了一套「兩種官方語文、多元文化」的政策。與其說它是代表了政府尊重小數民族的意向，倒不如說它祇不過是為了緩和法裔加人不滿意被歧視的息事寧人的門面功夫。去年數次的語文事件爭執，魁北克黨人在魁北克省競選獲勝，對加拿大政府的多元文化政策來說無疑是極大的諷刺和抗議；同時，也是對加國政府處理小數民族事務的誠意提出新的挑戰。發揚某一民族文化，並非一年一度的嘉年華多元文化節便足夠的，也不是將街道的名稱附上法文或中文譯名就說是完成了

任務。政府應該主動地在社會各階層和範疇內推行多元文化的政策，尤其應該在教育方面努力工作。不僅在校園內開設小數民族語文的課程，予以學分上的承認，並且負起通曉兩種語文——英語和小數民族的母語——的專業老師，分派他們到小數民族聚居地的公立中、小學校去授課，鼓勵學生們學會使用兩種語文的技能，減少他們可能存有的認同心理壓力。同時，在校園內外，政府必需積極的透過各種宣傳媒介去教育人民大眾，使他們認識文化並沒有優劣之分，所有不同民族的文化皆是各自民族辛勤積累下來的勞動果實；世界上沒有一種文化比別一種文化更高尚，有的祇是歷史短暫和悠久之分。大多數民族應該尊重小數民族的文化，小數民族也應該吸取大多數民族文化精華的成份。這樣才可以真正做到文化上的交流，多元文化社會這個稱號才不至名實不符。

即是說，中文教育（廣義的說，小數民族的文化教育）在北美洲祇有得到社會的公認和尊重下才能夠有效地發展和推廣。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中文教育較諸北美洲其它各地辦得更好，除了那裏的僑胞們的血汗和心機外，他們在七十年代初期不斷努力向美國政府爭取它的承認不能算是另一重要的因素。（詳情請參閱本期瑞蓮君的「爭取中文教育機會的先例」。）

我們的意見

北美洲的中文教育往何處去？這問題是值得在這方面努力的人士思索的。本刊編輯部同寅亦察覺問題的重要性，因而我們於上月間舉行了一個編輯座談會，討論了一些我們關心的問題。以下就是根據當時談話的內容綜合整理，是為我們對「北美洲的中文教育往何處去？」的一點點看法。

中文教育日見式微？

有人說近年中文教育在北美洲日趨式微，我們並不以為然。有「規模」的中文學校，即是那些每天上課四、五小時（在課餘下午四時以後開始）及周末上十多小時課的中文學校和他們的學生人數無疑是大不如前。我們並不以為這個現象是由於教師薪酬低薄的主要因素，誠然它也是原因之一。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後，北美洲各地的中文學校如雨後春筍，林立紛繁。多倫多市的「兒童樂園」和新澤西州的費浩（Freehold）中文學

一	一	一	一	一	
同	同	同	同	同	
學	學	學	學	學	
習	習	習	習	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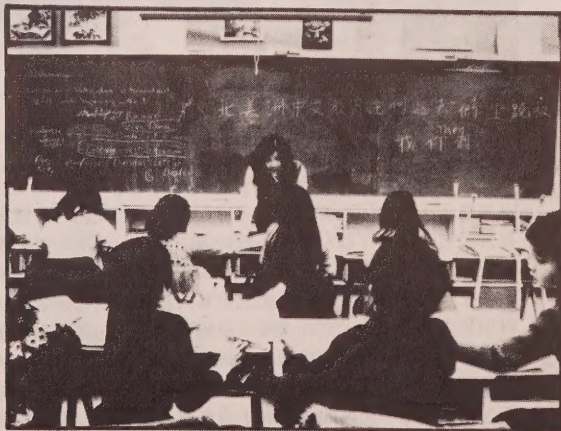
校便是千百間此類小型中文學校之一二。這些新興的中文學校的成員，包括教師和行政人員，均是義務工作者。據知「兒童樂園」的工作人員是連車馬費都是自備的。由此觀之，教師的薪酬不可能成為中文教育「日趨式微」的主因。

新移民喜歡遠離唐人街，搬到埠邊的住宅區居住也被歸咎成為中文教育漸趨低落的原因。這些人認為幼齡兒童不便往返多數位於唐人街附近的中文學校是這些學校的學生人數減少的原因，這情形也未必是對的。位於多倫多市中心栗子街（唐人街心臟地帶）的中華聯合教會中文學校的梁校長在訪問時告訴我們，學校部分員生是居住在十多里路程的多倫多市北面。在美國華盛頓巴費士特（Bethesda），一個由台灣籍僑胞主辦的中文學校，其學生的居家也是散佈在周圍方圓十多英里的地區。祇要家長們認為子女有接受學習中文的必要，在能力許可的路程內，他們還是會不嫌其煩的將兒女送到中文學校去。

根據本刊擁有的不完整資料顯示，有規模的、學制較完整的中文學校在北美洲的確是日漸減少。這現象的出現是有它的外在因素的。維持學校的經費誠然是十分困難，並且是問題形成的首要原因。可是，部份新一代的僑胞對祖國文化的淡淡，希望落根於北美洲而生發出來的北美洲文化認同，排除功課繁重的壓力而減少中文教學的時間等等現實因素却是不可忽視的。另一方面，規範較小的中文「學校」却在北美洲各地不斷湧現。這些「學校」（其實稱呼它們為「中文學習班」更為貼切）的學生人數不定，由二、三十位至一、二百名不等，實際情況則視乎當地環境而言。我們可以大膽地說一句，在北美洲，那裏有僑胞聚居，那裏便有中文學校。

教學經驗

由於教師和行政人員大多數是一些沒有教學經驗的義務工作者，這些新興的中文學校的程度便產生參差不齊的現象。不僅學校與學校間出現這些情形，就是同一的學校，同樣的情形也由於教員的去留而影響每年教學的程度不一。這些學校的教師隊伍大多數是由一些熱心的家庭主婦、未婚青年男女和大學生等組成。結婚、生兒育女、個人問題、畢業離境或功課繁重是形成高度去留率的幾點主要因素。既然這些老師們都是非專業人士，他們祇有自身在摸索的情形下得到寶貴的中文教學經驗。除了少數的例子外，他們一旦離開學校，不僅使該學校損失了一位有教學經驗的老師，同時，也沒有將經驗傳交給後進的老師，至使他們得要從頭再來吸取經驗。文章開首的陳老師



未能迅速而圓滿地解答學生的質詢，正是她沒有經驗和對問題未曾嚴肅地思索過的緣故。

教學語文和課程的選擇

十九世紀末直至本世紀六十年代為止，北美洲的華僑以廣東省四邑籍的移民最盛，六十年代以降，香港和台灣省來的移民却日漸增多。因此目前北美洲的中文學校採用普通話和廣州話授課的為主。課程的選取亦各有不同。規範稍大、歷史較久的則擁有一套由學校教職員編撰的課程。內容則以適合北美洲的社會生活為題材。部份學校，由於經驗和人力的問題，採用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或南洋等地編製的現成書籍為課本，自然是較為方便簡單的。

在北美洲出生的華裔兒童的立場來說，他們的「國語」自然是英文，而中文則成為他們的第二語言。因此，學校的負責人在決定選取那一種中文語言（即普通話和其他方言）作為授課之用的時候，便不得不以實際生活情況作為左右了。大部份的學生是來自說廣州話的家庭，上中文課時以廣州話講解也許使兒童更容易接受和領悟，回到家裏時也可以和長輩交談，得到進一步的學習機會。同樣地，在日常生活條件的需要下以普通話授課也將會收到同樣的效果。多倫多市比華利街(Beverly St.)的一間中文學校，更開設了分別以普通話和廣州話授課的中文班級，使兒童可以因實際需要而得到選取的機會。

採用普通話為授課語文，拼音和簡體字是應該被列為首先考慮的兩種中文教學工具。簡體字和羅馬化拼音方法的優處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但它却是八億祖國人民目前使用的文字和語學體系。據知台灣省在去年也開始使用簡體字。華裔兒童倘若失去學習使用簡體文字和拼音方法的機會，那麼他成長後發覺竟然不能透過書信與文字和祖國的親人或同胞溝通的時候，他幼年所受的中文教育幾乎是白費，他的痛苦較諸不能使用中文也許更深，而北美洲的中文教育因此變得毫無意義。

文化認同的問題

在上面，我們說陳先生的答案是不能夠圓滿地解釋給華裔兒童們認識到他們為什麼要學中文。「海外述林」在北美洲各地的通訊員在替本文搜集資料，向學生家長或中文學校的負責人提出同樣的問題的時候，所得到的答案幾乎是一致的，那就是：自己既然是中國人，當然希望子女們認識中國文化和中文。可是，土生的孩子却未必一定能夠接受這個答案，因為他們認為自己不是一個中國人，而是一個加拿大或是美國人。他們有的祇是中國人的血統而已。在個別國家觀念仍存在的今天，他們的看法是對的。土生兒童在成長的過程中接觸到的環境均要求他們同化於當地的文化體系裏，因而形成他們把中國文化置於第二位的心態。否定認同中國文化已經不再是民族意識上的問題，而是一個更現實的迫切選擇。倘若老師或家長們不是從尊重文化這一理念上着手開導，而一味使用強行的文化認同，迫使兒童接受不是主位的別一種文化，引起抗拒後果是屬必然的。這情形在第二、三代的土生華裔更見顯著的表現。

展 望

究竟北美洲的中文教育往何處去？問題的答案是需要大家探討、實踐和再探討後才可以使它顯現出來的。長遠的看，我們認為加拿大和美國其它各地的華僑社區應該向三藩市和紐約的華僑社區看齊，努力向當地政府爭取中文教育的承認和重視。三藩市的「劉與尼哥斯」案件在這方面給了北美洲各地僑胞一個很好的前例。中文教育祇有在華裔兒童消除額外的功課負擔和擺脫被恥笑的壓力後，才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和得以蓬勃。祇要政府能夠主動負起這個責任（同寅認為政府是有主動負起這個責任的義務，否則北美洲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便成為空洞無力的裝飾名詞），優良的師資、完善的校舍設備、統一並適合加拿大和美國社會的中文教材等等困難，也就得以迎刃而解。

短期的目標，在長遠的目標還沒有達到之前，我們支持美國新澤西州費活中文學校發出的呼籲，北美洲各地的中文學校在可能的範圍和條件內作緊密的聯絡，促進彼此教學的經驗交流，必要時還可以組織地區性的中文教學研討會，探討中文教育在北美洲所遭遇到的種種問題，並籌組中文課程和教學的編寫工作室，給後進的中文學校提供經驗上的援助。我們相信在眾志成城、齊心合力的共策下，中文教育在北美洲是更能擔任傳播中國文化的角色。★

華 僑 旅 行 社

AA TRAVEL INDUSTRY

384 College St. Toronto, Ont. M5T 1S7

(樂都戲院右隣)

電話：九六七·四七七九

服務週到 價錢最平

廉價豪華旅遊團

本社代理各國簽證

學生回港特別優待

每日有機，來往多倫多、香港、

東南亞及世界各地

早期北美洲的中文學校

■ 李安納 ■ 溫哥華 ■

私塾的出現

十九世紀末期，初抵北美洲的華僑由於人生路不熟，當地民風未開，生活異常艱苦，居住條件差劣。他們認識到造成這些環境的原因，除了盲頑的社會風氣和歧視的社會制度外，自身的淺薄知識水平也是促使生活貧困的因素。華僑旅居異地，語言不通，愛國心重，對祖國文化自然是懷有強烈的嚮往，更不忍心讓子侄們對祖國文化毫無認識。在環境的許可下，仍念念不忘兒女們的中文教育，設法在工餘之暇，推舉一些文書較佳的同胞，如店舖司理、掌櫃等，開設一些雛形的中文識字班，向華裔兒童教授中文的基本知識。稍後，富有的僑商，更從國內徵聘儒學究前來北美洲教授彼等的子侄。也有在國內仕途上不得志的秀才舉人，離鄉背井來到北美洲尋求新的生活出路，亦於各華僑聚居地設館授徒，辦起私塾上來。因此，最早的中文教育在北美洲的華僑社區可以說是以私塾的形式出現的，這自然是受了當時國內的教育制度影響使然。

美國的私塾

清末光緒年間（公元一八七五年至一九〇八年）僅是三藩市一地便有十多間私塾。這些私塾的規範與當時國內的沒有多大的差別，教授的課程亦以古文、四書、八股等為主。二十多名的僑童在私塾老師的帶領下，進一步吸收中國文化的滋潤。民初的革命志士廖仲愷便曾經在三藩市有名的陳馨甫私塾接受他的基本中文教育。一般的私塾館收費也頗驚人，入讀學生每人每月得繳交四至五元的「書金」。以當時僑胞每月入息多為數十美元計，不可謂不昂貴矣。因此，如古代中國的教育制度一樣，早期北美洲的中文教育亦祇是替那些富家子弟服務罷了。

加拿大的私塾

在加拿大，早期的中文學校亦是以私塾的形式出現。這些在清末同光年間（公元一八六〇年一八七五年）便已開始出現在加拿大西岸的域多利和雲哥華等華僑聚居地的私塾規模很小，校制簡陋，師資淺薄，僅由一些知書識字的掌櫃先生工餘之後，在工作的舖後間或私寓內把自己熟習的記帳、珠算和書信等知識傳授給僑童。中文的教學工作，除了居家日常的感染傳授外，亦在這些有限的條件下得以補充。當時加西較有名的私塾包括水月宮、泰源和泰興等。據一八八四年，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的華僑職業統計，當年在加西各大華人聚居地至少有私塾老師八名。由於華裔兒童的數目與年俱增，入學適齡兒童日長，至光緒二十年（即公元一八九四年）左右，單是西岸的域多利一埠，私塾便增至九家之眾。不過，他們的教學對象還是那些負擔得起書金的富家子弟。

一八九九年，一間由中華會館主持的義學「樂羣義塾」在域多利成立。辦校的宗旨除了教習中文、傳播中國文化外，最重要還是讓那些被拒於豪門私塾外的華人貧苦子弟們享有同樣的中文教育機會。中華會館承担了維持「樂羣義塾」的部份經費，個別僑胞和僑團的鼎力支持也是功不可沒的。

北美洲最早的中文學校

正如大量的華人在北美洲最早的踏足地是美國這事實一樣，三藩市是擁有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學校的城市。遠在一八八四年，一間名為「大清書院」的中文學校在現今三藩市的沙加緬度街（Sacramento St.）七七七號半成立。「大清書院」的程度頗高，與當時國內有名望的私塾相仿。課程包括四書、五經、左傳、幼學故事瓊林等標準讀本。「大清書院」設有教席兩位，由晚清舉人或秀才擔任。學童每周上課總共四十六小時之多，周日上課時間是每天下午四時半至九時，周末更是從上午九時至晚間九時，加上日間就讀公立學校的時間，學童的功課不可謂不吃力了。由於接觸中文教育的機會相應地增多，此輩僑童的中文程度之高，幾迫及當時國內的水平。華僑子弟戀棧當時國內的仕途，回國趕科場亦大有人在。

外來的催化力量

清末民初，兩點外來的因素引起中文教育在北美洲轉入了一個新的方向並得以蓬勃。首先是國內的政治運動伸展至海外的華僑社區，使北美洲的中文教育首次與國內的政治有了明顯的接觸和聯繫。

光緒十六年（即公元一八九〇年）維新會會員為了響應國內鼓吹的革新運動，從教育着手，於加西的溫哥華和域多利兩埠創辦了「愛國學堂」，是為加拿大畧有規制的中文學校的開始。「愛國學堂」最初設在溫哥華一間名為「三記」的店舖樓上。開辦數年後，遷往保皇會會址頂樓，在教授中文之餘亦向僑童貫輸康、梁等人的學說。其後，維新會和保皇會在國內漸受時代的摒棄，間接影響「愛國學堂」的校務，授課亦漸無定期，時開時閉，影響兒童學習情緒不少。在當時為數不少，由華人社團主持的私塾較穩定的校制的競爭下，「愛國學堂」終於停止開辦。

戊戌政變後，康有為和梁啟超逃亡海外，相繼於一九〇三年後抵北美洲，進行組織保皇會，企圖展延滿清的殘喘統治時期，在北美洲各地倡辦學校，用以培植海外勢力。這期間（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保皇會在美國各地開辦的中文學校計有三藩市的「尚武學堂」和「全門兩等小學堂」。在斐士那（Fresno）亦有保皇會人士主持中文學校。一九〇八年，康有為抵美，羅省僑胞響應他的革新口號，創辦「干城學堂」，以軍訓教學方法，鼓吹維新派的主張。沙加緬度的華僑亦在該市埃街（I Street）的保皇會址設置「僑立華文學堂」。

一九一〇年三月，孫中山先生在夏威夷改組興中會成為同盟會的活動促成了當地中文學校的初現。孫中山在海外為革命運動奔走多年，深知教育的重要，在改組興中會的任務完成並離開夏威夷之前囑咐革命同志務必主辦中文學校，教育當地日漸眾多的華裔兒童。夏威夷第一間中文學校「華文學校」便在這情形下於次年開辦。同年，另一間名為「明倫兩等小學校」亦在夏威夷的華人社區出現。後者校務最鼎盛的時候，學生人數多逾千人，創下了北美洲中文學校規模最大的中文學校。

美國和加拿大政府在本世紀初期對華人排斥的偏激政策曾經在北美洲中文學校的發展史扮演過間接的催化角色。加拿大第一間採用統一校務兼備規範的中文學校的開辦便是在「黃白分校」的歧視行為下促成的。一九〇七年，英屬哥倫比亞省政府宣佈不准華裔兒童到白人兒童就讀的公立學校上課。此一倡議如風捲席，受到種族主義者的吹噓，一時間蔚成風氣。華僑有見於此，於是籌辦「中華學堂」於城市的唐人街。準備期間，適藉清朝官員梁慶桂抵北美洲各地執行開設「大清僑民小學」的計劃，答允以清廷學部的名義津貼「中華學堂」的維持經費。事實上，該校的費用多由加西僑胞熱烈捐集的。

「中華學堂」除了是加國第一間設備完善，學制統一的中文學校之外，它也是加國華人在爭取平等機會的衆多運動上一個良好先例。首先，它是在被歧視的環境下作出拒絕向壓迫低頭的實際行動表現。「中華學堂」開課的同年，由於它代表着華人不為時勢所屈的英勇行為，卒使英屬哥倫比亞省的把政者改變態度，把「黃白分校」的法令撤銷，恢復華裔兒童入讀公

立學校的機會。第二，「中華學堂」採取當時比較上先進的教學方法，統一了當時各自為政，各授所有的參差不齊的個別中文私塾或中文學校的課程，後者在加拿大中文教育的遠景上看來有着先範的作用。

辛亥革命後，北美洲各地華人社區的中文學校如雨後春筍，此起彼繼，間或滯舛不前，大多數是與當地的華人團體和政治環境改變有關。中文學校由校制完備，授課時間甚多的「學校」形式回復到早期如私塾般的小型、課餘的中文識字班，這與新一代的華人底心態有很大的關聯。從縱的、歷史的角度來看，北美洲的中文學校由早期的私塾形式轉向較統一、規範較大的僑校再回復至近年的小型、課餘的中文班。橫的方面，越是接近中國本土的華人社區，其中文教育也就更有歷史經驗和辦得更好，即是說，北美洲西岸各大華人聚居地，如夏威夷、羅省、三藩市和溫哥華等的中文教育較諸美、加其它各地華人社區的中文教育更蓬勃。★

爭取中文教育機會的先例

瑞蓮·三藩市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十三個來自不懂英語的美籍中國家庭的子弟們代表三千名三藩市使用中文為溝通語言的華裔學生聯名入稟美國聯邦地方法院，控告三藩市的教育局，指控該局忽視那些祇能以中文為首要語文的學生們接受教育的權利。三藩市的學校在授課的時候並沒有對這些學生們提供任何別的幫助。學生的家長們認為，由於對英語講解的領悟能力不足，他們的子弟在上課的時候發生極大的困難。這情形繼續下去的話，他們的子女勢將被迫退學。在找尋工作的時候沒有足夠的學歷，他們將會走上失業的蹊途。

代表三千多名學生的原告，要求美國地區法院指令三藩市的教育局，必需聘請能夠使用中、英兩種語文的教員來教導這些不懂英語的學生，提出訴訟的學生們認為老師沒能使用兩種語文而祇是採取英語來教授英文課程是無效的；它祇不過是要求學生的鸚鵡學舌般的模仿過程而非學習。

這便是轟動整個美國少數民族的「劉與尼哥斯案」（Lau vs Nichols）。劉是指十三個原告中的首位，一個六歲的一年級學生，劉健民（譯音，Kinmon Lau），尼哥斯（Nichols）則是當時三藩市教育局的主席。

上文提及原告指控三藩市教育局忽視了華裔學生接受教育的權利。也許有人提出異議，這些學生不是在學校裏上課接受教育嗎？原告們的指控豈非荒謬無稽？若是如此，美國地方法院為甚麼還接受仲裁而最後還纏訟到美國最高法院？這件案件又為甚麼要經過差不多四年的時間才於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宣判原告得直呢？

我們祇要看看七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美國最高法院的宣判詞，便不難找出答案。它說：「（在美國，筆者按）學生們如果不懂得英語，他們根本上是不可能接受有意義的教育。」學校教育不是要求學生在成績報告表上取得高分便已經達到目的，它也不是把學生養成如鸚鵡學舌般背誦教員傳授或書寫在課本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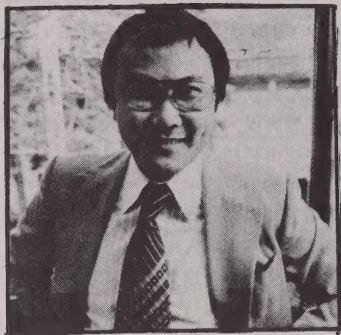
的知識的地方。它是使學生們發展身心，培養獨立思考的場所。因此，語文的認識和使用便成為達到這境地的最基本條件。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美國最高法院在宣判「劉與尼哥斯」一案時裁定三藩市教育局非法地歧視美籍華裔學生，扼殺這些學生們參與公眾教育的機會。最高法院同時指出：「向不同背景的學生提供同樣的教育設置、課本、教員和課程並不表示這便是平等地對待學生。學員們如不懂得英語，他們根本上是不可能接受有意義的教育」。還沒有入學之前便希望不諳英語的兒童流暢地使用英語這一看法簡直是與公立教育開玩笑。

「劉與尼哥斯」案的裁定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承認對不懂英語的學生提供額外的教學幫助是必要的。最高法院宣判後，該案瞬即在美國各地引起廣泛的注目，其中尤以非英語的少數民族聚居的社區為甚。有人以為祇有新移民的子女們才會遭遇言語不通的困難。其實非然。三藩市進行的一個研究調查顯示不僅土生的華裔兒童入學時英語的駁御能力不足，就是在市立學院、三藩市州立大學與及柏克萊大學就讀的部份華裔學生也有着同樣的語言問題。當然，新移民更增加了這個問題的尖銳化。

「劉」案的勝利使美籍華僑對中國文化的傳播帶來新的衝擊和指出了新的路向，並且更能證明從前認為不大可能實現的情形，祇要齊心合力地去爭取是可以使之成為事實的。「劉」案的得直最明顯的後果便是使華僑子弟們獲得較為公平的教育機會。更重要的一點是自此之後，政府比較能夠主動地對少數民族本土的文化予以「合法化」地承認，並且在公立學校內開設課程，讓兒童在「被承認」的環境中學習祖國的文化 and 語言。從前在公眾地方用中文交談而被藐視或恥笑的心理壓力也因此減少，孩子們以較健康的心理來認識自己祖國的文化，中文教育更能有效地推廣。但是僑胞們不應該以此而滿足，還是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進的。★

關於新移民法案



(訪問簡家聰律師)

的 幾 點 問 題

訪問、整理：海外述林編輯委員會

日期：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八日

問：可否請簡律師告訴我們新移民法例的內容？

簡律師：大家都知道，這個新移民法例是最近由移民部長在下議院裏提出的。但我首先向大家解釋一下究竟移民法例是什麼一回事。移民法例有兩個部分，第一個是移民法案（Act），這移民法案假若在議院里獲得通過，那政府（現在來說即曹度內閣）便有權頒佈移民法則（Regulation）。所以將來移民措施怎樣，現在是未知的，因為法則還未頒佈。事實上兩天前我才被邀請對某部分法則表示意見，可見法則還未定。現在只能就移民法則裏的幾點概念和大家討論。關於目前的新移民法案裏，首次提到了「移民法例的目標」的問題。如在第三段裏即提及所謂「人口分佈目標」這字眼。政府從未說到什麼「人口分佈目標」這類東西，或許政府會想及如何增加或減少某一省的人口，但從不正式鼓勵或制止人們去某一省或別省居住。人們要去那一地區居住，在加拿大是不受限制的。究竟政府現在是不是打算這樣做，我們不知道，不過最低限度「人口分佈目標」是寫進了新移民法案裏，即是說在如何達到「人口分佈目標」方面，移民政策是有關的。除了這點外，還有以下幾點也被列入為「移民法例的目標」之內：①為了增強及豐富加拿大的文化及社會結構，應把加拿大的「兩種官方語文」和「聯邦」的性質列為考慮點。我可以明白「兩種官方語文」的性質是什麼，因為既然承認加拿大是英、法兩種官方語文，這兩種語文的文化是重要的，應該被注意的，但什麼「聯邦」的性質則是明顯的語病。大家知道加拿大是一個多元文化，多元民族的國家，所以「聯邦

」這兩字應改為「多元文化」才恰當。②關於家庭團聚問題。其實加拿大政府在這方面已經做得很好，雖然或許有些人仍未覺得滿意，但比較其他國家，特別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辦家庭團聚的工作罷，我相信任何明理的人都不會厚非。③「省政府與聯邦政府之間對移民進入加拿大後的生活、教育等問題，應有更緊密的合作，我想這點是對的。在加拿大憲法裏，關於移民方面的立法權力，聯邦政府和省議會兩者都有權立法，但同時指出省議會立下的法例不能與聯邦議會定下的法例有所抵觸，可是在移民入境之後，他們的生活、教育等却是在省議會的立法權力之下，所以這裏指出只有在聯邦政府與省政府之間更好的合作下，才會達到美滿的效果。④新移民法案希望使非移民入境更為容易。其實現在已經相當放寬，我相信未來不會加緊，特別是加拿大想發展對外貿易的話，這點是非常重要的。譬如說現在加拿大沒有「多次入境簽證，但美國已經有了，我想在這方面或許會發展到設立「多次入境簽證」也未定。⑤「保障加拿大在社會衛生及社會安全」，這是無可厚非的。新移民法案想在這方面加以嚴密的控制，特別是防止某些顛覆份子利用加拿大作為基地，進行騎劫飛機等活動。以上便是有史以來加拿大首次定下的移民政策目標的主要內容；這些目標很難不同意，但令我最注意的是所謂「人口分佈目標」的問題，究竟政府怎樣處理呢？是不是只針對移民，限制移民呢？還是政府定下法例時，有意同時限制加拿大境內人士的活動呢？這個我們不知道。不過移民的數量不多，不會因為移民而使城市出現擠迫的現象，或使某地區因為移民而失去吸引力，移民是微不足道的因素。

問：據你看來，政府會不會只是採用譬如說把某些人口過少地區的稅額減低，以求吸引移民？政府會不會用這一類的人口分佈辦法？

簡律師：這是未知的。我們當然希望只是用刺激投資式減低稅額這一類方法，但最重要的，這是政府首次提出「人口分佈目標」，我們希望政府把這目標說出來，讓人民知道。

問：這所謂「人口分佈目標」，有沒有可能表示政府將會限制移民往它認為人口已達飽和點的地區？

簡律師：可能性當然有，但正如我剛才說，城市擠迫並不是移民造成的，譬如說多倫多人口增長，是其他省份的人覺得多倫多有發展機會，而紛紛湧來的。

問：這樣說，我們現在當然不能猜測政府一定會限制移民往那些人口過多的地區，但萬一政府確是這樣，豈不是不大合理？

簡律師：是的，但我要說的重點是這樣，①從來沒有聽說過政府說什麼「人口分佈目標」，現在是第一次。第二個事實是，移民對這方面是微不足道的。第三點是如果政府搞「人口分佈」，那它一定會採取某些措施，例如每人發出一張電腦咭，那才會有紀錄可查，我相信政

府也許就是這樣做。因為新移民法案裏提及需要移民打手指模，以前是不需要的，而這是爲了能辨認身份之意。政府若真是要管制人口分佈的話，我懷疑第二步就是發出電腦咭，要登記，這才可能追查人口的流動。這樣一步一步下來，首先要電腦咭，然後能去這兒，不能去那兒，諸如此類，那恐怕社會結構會受到影響。當然，或許我是過慮的。

問：先不談政府會否限制移民申請往人口過多的地區了，因為實在大家也只能猜測。就談移民入境之後，譬如說你是申請來多倫多的，之後想轉往其他地區謀生，政府會不會有所限制？

簡律師：政府一定會限制的。新移民法案裏就有提到。一向移民申請來加，申請書上說是來多倫多的，但事實上來到後往其他地方，或甚至離開加拿大，政府也不限制，亦不會知道。但新措施將不再容許。新措施將會指定某些入境處，而一旦入境之後，譬如說在申請書內寫明投資的，移民局會根據申請書上說的，給你六個月時間履行投資的諾言；六個月後移民局認為滿意了，才批准你爲移民。

問：這新措施開始執行沒有？

簡律師：現在還未實施。

問：據我所知，現時申請移民的，假若當初說是投資，也需要先匯錢來。

簡律師：是，但你可以來了之後再寄回去的，新的措施就是防止這些流弊，起碼你要存打算投資的錢入銀行六個月。到時如果不是真的投資，仍會被拒絕作爲移民。

問：回到「人口分佈目標」那一點，新移民法案把「人口分佈目標」寫進去，會不會對批准移民方面縮緊？

簡律師：這個現在不知，要等法則定了才清楚，不過現在已經是相當緊的了。

問：但假若移民法則是根據法案的原則而定的話，會不會邏輯地得到縮緊移民的結論。

簡律師：無可否認一定會縮緊的，但從好方面看，也可以說是政府幫助移民，安置移民，使移民能夠達到當初申請來加的目的。現在是不管這些的，移民入了境就和移民局沒有接觸。

問：那麼對於那些所謂「報到移民」豈不是有問題？

簡律師：這一定有抵觸的。在二十四段裏就有所說明。所以我們說新移民法案其中一點，便是要召集那些報到移民歸隊。以前的移民法例從沒有提及移民未成爲公民前出入加拿大境的問題。新移民法案對此下了一個「永久居留」的定義；移民是擁有永久居留權的，但這永久居留權可以喪失，當移民離開加拿大半年多一天時，法案裏說明，移民局便假定那移民放棄了永久居留權；有權拒絕那移民入境。這樣，那些報到式的移民將不符合這個新的規定。除非另外申請「回加證」，是「回加證」，不是「回港證」。有「回加證」才可以回來。

問：不過現在持英國護照的移民是不用蓋出入境印的。

簡律師：是的，但如果新措施一旦執行的話，那每一個人都要蓋出入境印。這對報到式的移民是一個打擊，他們要是不在新措施實施之前歸隊，以後便不用回來了。

問：這新措施對一些做生意的不是很不方便？

簡律師：這些人一定要申請「回加證」，向移民局官員解釋需要離開加拿大超過半年的原因，而且一定要理由充份，才會獲得批准。

問：除了以上所說的之外，簡律師還認爲新移民法案裏那些問題值得注意？

簡律師：還有一點比較特別的。一向加拿大移民局有「特別調查組」的設立。特別調查組的工作就是假若任何移民觸犯了移民法例，便會經過特別的調查、審訊，然後決定遞解出境與否。關於這個特別調查組，有一點是非常特殊的。特別調查員兼數職於一身，他既有權調查，又是主控官、又是法官，這樣的情形一不小心，便可能有偏頗。現在新移民法案替代這特別調查組的是正式法庭，不屬於移民局，被控訴的移民與主控的移民局雙方都要派代表出庭，這可以避免特別調查員兼數職於一身的弊端，但雖然差不多每一個人都認爲特別調查組的制度是不好，我認爲有一點好處應該保留。很多時候在法律來說，「法無可恕，情有可原」，不一定因爲某移民觸犯了移民法例，就要被遞解出境。某些情形下應該是可以輕判的。特別調查組制度的優點，在於移民被控告之時或會得到移民局長的特赦，這樣的彈性在未來的措施下很可能不再存在。要知道，在法庭裏是沒什麼有彈性的。當然，在執行上是妥當，但恐怕會太嚴厲了，而且到時一定要聘請律師上庭，現在則朋友代表談情還可以。大致上最重要的是以上說的幾點。至於細則方面，反對種族主義委員會（Committee Against Racism）特別留意打手指模的問題。可能黑人對這方面比較敏感一些，因爲我和許多華僑討論過，如那天和葉求鐸律師談起，他便認爲打手指模沒有什麼不妥，香港也需要打手



等候入境的旅客

加拿大新移民法案

本刊記者

加拿大新移民法案已於去年十一月間在國會上首讀，總括而言，新法案對加國公民或移民申請他們的直系親屬來加團聚的一項，將仍維持過往的方便；但新法案却明確地給予移民官員更大的權力，包括拘捕及扣留被懷疑是「非法居民」的人士，及遞解永久居民離境等。

對移民官員額外權力的條款，當這法案在進行二讀時，相信將會進行一番劇烈的辯論，新法案是要經二讀的辯論及特別研究小組作有關的修訂後，方作循例性的三讀，在三關通過後，方案才正式的成為法例。

新法案計劃授權加國人力及移民部，在與各省政府進行商討後，按加國人力市場的需求而每年定下一接納新移民的限額（如何將人數分配至世界各地的申請者，及如何將新移民分配至加國各省，將是兩個大問題）。據非官方的估計這個限額每年為十四萬人人左右。

根據官方的聲明謂，這新法案定出了加拿大的基本移民目的，方便家庭團聚，關心難民問題，及絕無歧視地為促進加拿大經濟、社會、人口分佈及增長，與文化目標而接納移民（讀者應要注意的是最後一點，這明顯表示加國願意接納移民，主要是為其本身的發展，換句話說，如加國經濟不景，新移民的數字便會大減）。

在新法案中，加籍人士在申請他們的父母或祖父母來加時，是不用受必須年逾六十歲的限制，而對永久居民則仍有這限制，於申請其他依賴親屬如子女，配偶，未婚夫或婦等，兩者皆可獲過往的同樣優待，對於非依賴親屬如年超過廿一歲的兄弟姊妹等，被申請者本身必須能通過移民當局的「計分方式」（雖然他們的分數可獲優待）。

新法案將明文規定以旅行簽證抵加的人士，不可以有加國內工作，或更改他們旅行證件上的簽證（如改為學生或移民），否則將會馬上被扣留及遞解出境。

對永久居民最不公平的一條款為新法案第廿四項第二點，任何永久居民（即未入加籍的人士）在任何十二個月期間，在加國以外居住上一百八十三天，即表示他已自願放棄其永久居民資格，除非他在返加時，能向一名移民官員及一名公證人提出令他們感到滿意的解釋，新法案第廿五項第一及第二點規定永久居民在離加前必須申請類似香港「回港證」般的證件（這大為扼殺永久居民（移民）的行動自由）。

移民官員在新法案中獲得莫大權力，特別是在遞解永久居民出境權力方面，其中一項是移民官可以於一永久居民離境後，不作預先的通知，而拒絕他重返加國國境。

人力及移民局長在提新法案時，一再將接納新移民的問題與失業問題並論，有意及無意地造成一種錯覺，使加國居民認為新移民的到來，搶走了他們不少工作機會，而據國際反種族歧視會表示，這實為做成歧視問題的起源，加國政府一再強調公民與永久居民的分別，暗示出移民實在是加國的二等公民。該會並表示：擴大移民官員遞解永久居民出境的權力，對未入籍的永久居民而言，是一極大的精神威脅。

指模的，但黑人前車可鑑，像南非一定要黑人攜帶證件，否則捉去坐牢；黑人可能恐怕他日會管制到此程度，他們對「人口分佈」的問題看得嚴重，不像我們那麼樣輕鬆。

問：不過事實上不少華人也同樣感到這種威脅。譬如說：Doug Collins在週末雜誌裏寫了一篇東西，大肆攻擊華人移民怎樣搶去工作，怎樣炒高樓價，這一類的攻擊令到有些人感到有問題存在，甚至有人認為是種族主義的傾向，不知簡律師的看法如何？

簡律師：無可否認，當一個國家的經濟走下坡時，移民往往是代罪羔羊。我在加拿大十八年，今年（簡律師相信是指七六年——編者）的經濟最差，很多人失業，更大的問題是加拿大本身有些如「西方衛團」（Western Guards）一類的團體，鼓吹種族歧視；現在甚至有武力攻擊有色人種的情形發生，像威美頓有一女生被人強姦，引起許多打鬥。這些都是存在的，雖然還不普遍。

問：最後一個問題是，假若新移民法案獲得通過，對華人社會有沒有影響？對打算申請移民來加的人又會有什麼影響？

簡律師：我看不出對華人社會有什麼影響。對於打算申請移民來加的，影響則是他們再不能信口開河，而要切切實實履行申請時許下的諾言，這是和現在不同的。

（訪問稿經簡律師過目）



歐亞旅行社
EUPD-AIR TRAVEL SERVICE LTD., INC.

返港探親

順遊歐洲



專營來往香港倫敦包機業務，隨機人員經驗豐富，服務最佳。
經辦歐洲亞洲各地觀光業務，華籍導遊，專業服務。
并代理世界各地廉價機票。

辦事處

加拿大	美國	荷蘭	英國	香港
多滿	紐波	三羅	阿倫	中元
倫地	約士	薩省	曼格	區朗
多可	斯頓	姆省	伯明	、
		斯頓	敦拉	九上
		特丹	斯哥	龍水
				埔

多倫多
ROOM 206
210 SPADINA AV.
TORONTO.
TEL: 416-361-0900

滿地可
1107 CLARK ST.
MONTREAL
QUEBEC.
TEL: 514-861-3497/8

編者按：

去年十一月廿二日，加拿大人力和移民部部長的辦公室發放一份有關新移民法案資料的中譯本。本書依據譯本原文全部照登，以供關心這個法案的人士參考。值得一提的是譯文聲明它不是一份法律文件，一切應以英文本為準（請參看附圖一）。

新移民立法最重要的部份

結構

新移民法令結合一九五二年移民法令，一九六七年移民上訴庭法令以及主要的新規定。

目的

該法令含有目標聲明，強調加拿大對下列移民事務的移民政策的實施。

家庭重聚。

絕無歧視的選擇標準。

對難民的人道同情和關懷。

通過移民促進加拿大的社會和經濟目標。

保護衛生健康、安全以及加拿大社會的良好秩序。

此外，新規定亦明確承認下列各項：

移民對於達致全國及區域人口統計目標的重要性。

在移民事務上，對聯邦政府和各省的合作與以活力。

有資格入境的等級

該法令規定有資格入境的三等級：

家庭等級，符合現行的保證等級，擴大包括由加拿大公民保證不拘歲數的父母。

難民

其他申請人，包括根據評分制度所選擇的人士。

在新法令規定下，目前對提薦等級實行的評分制度仍須保留。現在具有資格被提薦的親屬將獲得與現行規定同樣的優先考慮。

難民

在加拿大法律上，新法案首次證實了加拿大為聯合國難民協約一成員所應負擔的義務。新法令制訂了決定難民身份的程序，同時保證將於那些能確證為難民者，根據協約規定給予保護。

新法令亦制訂特別選擇標準以選擇難民。我們可以設想到這些新規定可能緩和對普通移民所實施的原則，甚至在加拿大境內給予移民特別幫助，使難民能成功定居。

准許政府對一些不在聯合國協約規定範圍的難民，可基於人道理由應付特殊的情況（註一）。新法令授權隨時依據選擇準則決定特別資格等級，並擬制選擇原則以應付這種情況。

無資格入境等級

無資格入境等級的定義予以修正，以反映目前的情況和標準。絕對禁止癲癇病者移入的規定予以取消。禁止白痴、低能者的規定亦屬過時。健康準則僅基於對公共健康衛生，安全的危害，或者有過份衛生與社會服務的需求。關於犯罪不准入境，法案亦擬具了新的客觀標準。這個新準則是以加拿大法律認為相等可施行的判處為基礎。新法令規定亦包括對付恐怖份子以及秘密社團罪行的威脅。

		Office of the Minister Manpower and Immigration	Cabinet du ministre Main-d'œuvre et Immigration
		For Release	Pour publication
Date Subject	November 22, 1976 Chinese Translation	Date Sujet	1e 22 novembre 1976 Traduction en chinois
(This is not a legal document)		(Ceci n'est pas un document lég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IMMIGRATION BILL		RENSEIGNEMENTS SUR LE PROJET DE LOI SUR L'IMMIGRATION	

附圖一：由人力和移民部發放出的新移民法案中譯本的封面

保障個人權利

新提呈的法案擴大保障，使那些被拒入境者有權要求給予全面公正的移民審查。審查將在特別規定的情況下讓公眾參加。法案規定於審查進行時保留與法律顧問進行商議的權利。新法案亦規定對受訊者的家屬的利益保障。

一項重要的革新是以特別訓練的新官員「評判官」取代原來的特別調查官，「評判官」的職權與原來的特別調查官的職權顯有不同。「評判官」將不參加引證的程序。他的職務只是負責考慮全部提供給他的情況證據，並根據法律，裁決一個人有否資格入境。

該新法案維護移民上訴庭現在擁有的獨立性和裁判權。最重要的一點是同樣類目的人士現在可就驅逐出境令向上訴庭提出上訴，並能在建議中的立法規定下繼續享有上訴權。

法案提議驅逐出境令的替換。現行法令規定不需得到部長同意可強迫一個人離境，並終身被禁再入境。

若一個人沒有資格入境，理由並非永久被禁入境（例如：暫時疾病、證件不足），排除令可在入境站發給，迫其離開，並禁止入境一年。

離境通知可發給旅客，因他於入境後被發現違犯了法令或規則。

最後，新法令提議保證在移民法下被扣留者，能根據保障改革法受到合理的待遇。

旅客的入境與居留

爲了應付非法移民問題，新法案規定所有旅客要來加拿大求學或暫時工作，均須在國外事先申請核准。入境以後，訪客平常不准改換身份。例如一個人以訪客身份入境，不准工作，不准成爲學生或永久居民、暫時工人更換工作或學生更換課程，未經當局核准，或旅客居留逾期，均將被令移出。

改善行政

在新法令規定之下，人力移民部長須與各省以及有關機構進行諮詢，然後每年代表政府宣佈在某段時期內移民的水平與數額。

新法令亦規定鼓勵移民定居在他們在國外申請書受處理時所選擇的目的地。法令將授予權力，採取措施，鼓勵移民在需要他們的地區定居。經聯邦與各省諮詢後，若認爲某些地區需其技能，就盡力設法便利那些移民到有關地方工作。新法令規定如果一個居民因爲選擇在特指地區定居而獲得便利入境，如有必要，將需要他在指定地區定居至六個月。

聯邦與各省合作

根據英屬北美洲法令，聯邦政府在移民事務上擁有卓越權力，但與各省分享移民事務上所扮演的角色，並且保證新規定是響應加拿大各部份的需要。如前所述，新法令規定部長應先與各省商議有關移民限額、分佈以及定居各項問題。該新法案亦規定聯邦政府與各省必須達致正式同意，特別是有關省方極爲關注的移民問題。

在建議中移民法案下

親屬提薦與依靠者之保證

人力移民部長今日代表加拿大政府證實按照新移民法計劃的規定，將制訂出有關親近家人和非依靠親屬入境的條款。

親近的家人

1. 現行制度

任何超過十八歲的加拿大公民或合法移民均可保證下列親

屬只須身體健康，品行良好，而不需要保證人或親戚的經濟評估：

丈夫和妻子。

未婚夫和未婚妻以及他們的二十一歲以下的未婚兒女未滿二十一歲的未婚子女。

年逾六十歲的父母和祖父母；或年紀未到六十，但不能工作者；喪偶者以及他們的直系家人。

無父母的哥弟、姊妹、侄甥、侄甥女和孫，他們均在十八歲以下。

收養的兒女，須在他們十八歲生日以前被收養，而且是未婚，未滿二十一歲。

將被收養不到十三歲的孤兒或遭遺棄的孩子。

如果一位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留的移民沒有具有資格的丈夫、妻子、兒女、父母、祖父母、哥弟、姊妹、伯叔、伯母姑母、侄甥、侄甥女可予保證，他就可以保證任何一個其他的親戚，不拘其年齡或關係。⁽¹⁾

2. 將來制度

此項制度建議新的「家庭等級」將與上述者相同，但將予以擴大，包括由一個加拿大公民保證的任何年齡的父母和祖父母。

非依靠的親屬

1. 現行制度

一個十八歲或十八歲以上的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留移民可以提薦下列一項目的親屬移入加拿大（註二）。

二十一歲以上的兒女。

二十一歲以下已婚的兒女。

已婚或未婚的哥弟或姐妹。

年齡不到六十歲的父母或祖父母。

侄甥、侄甥女、伯叔、伯母姑母或和孫。

提薦人應能證明他或她具有足夠穩定經濟能力供給入境親戚的基本需求。

一名居住外國而被提薦的親戚必須遵照選擇規定和原則，以反映他或她有能力在居住這個國家提薦人協助下在加拿大成功地定居下來。

2. 將來制度

新法令開始生效以後，政府將制訂規章，使具有資格被提薦的親屬們能繼續享受與現行規定的同樣優先權。

（註一）任何人有理由確證恐懼遭受迫害，因爲其種族、宗教、國籍，或者爲了是某社會或政治團體的會員。

A他是在原籍國家之外，不能或因恐懼理由不願接受那國的保護。

B無具國籍，在原居地之外，不能或因恐懼不願返回那個國家。

（註二）另加配偶以及隨同的年齡在二十一歲以下未婚兒女。

種族不和



天

二三事

一月六日晚，一名圭亞拿籍的非法移民廚師在大多市西邊一地車站內，遭三名白人青年無故毆打，傷者事後報案，警方捕獲行兇者。

元旦前夕一羣青年在多倫多市一地車車廂內騷擾及毆打兩名身體孱弱的棕色皮膚居民，同車的一名見義勇為的搭客於出口相助時，亦遭是幫青年毆打，結果仗義者被打折鼻骨，而被毆者則低聲忍氣地離去了事。在同一晚上還有別一宗毆打事件，傷者事後沒有報案。

去年十一月十七日晚，四名就讀於安大略省威爾遜市麥馬士達大學的中國學生，於半小時之內，分別在該校校園週圍，無故遭數名白人青年圍毆，滋事者在行事時，聲言是專打華籍學生的，並且滿口歧視語句。

去年一月三日晚，一名坦桑尼亞籍移民在宗教集會後，乘地鐵歸家途中，遭兩名青年人在車廂內騷擾，當地車抵達終站後，兩名青年見沒有人干涉進一步地毆打是名受害者，及將他推跌到車軌上，這名棕色皮膚的移民結果雙足折斷，終生殘廢。事後該兩名青年被捕及分別被判入獄兩年及兩年半，審這宗案的法官在宣判時表示：他並不考慮這事件所涉及的種族不和成份，而只當傷者為普通的一個遇害者。他說：「不論他（受害者）是黑、是白、是棕、是黃或是紅，所判的刑期仍是一樣的。」安省總檢察官則認為所判的刑期不足嚇阻類似情況再度發生，而正在進行上訴。

在大多市的若干學校，不同種族的學生間已呈不和現象，學生互用種種歧視語句對罵。同時，教育當局亦發覺某些教員根本上對這些問題採取放縱態度，這使學生間的裂縫更為加深。據云在一些學校內，學生幫派已進展至「武鬥」程度。

在元旦日晚上，美國NBC電視台（第二台）的「週末特輯」中，對安大略省這日趨嚴重的問題有一專題報導，內容談及學生間的不和及一個反對加國接納非白種移民的「納粹型」組織——Western Guards，強調出安大略省這個尚未爆發的危機。而於隔天安省政府馬上半官方方式作了反應，表示該個節目誇大了實在情況及企圖醜化安大略省的形象。

加拿大的人權法案雖然明確表示加國公民及居民（不分種族，信仰及原籍國家）的平等及自由，但公民「歧視」居民（新移民），土生「歧視」移居來的，白膚色的「歧視」非白膚色的却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筆者把歧視一詞加上括號，主要因為這種態度往往不可能馬上可以察覺到的，表面上客氣的應酬敷衍，並不表示內裏的「歧視」態度並不存在，而「歧視」本身亦有深淺之分。

安大略省是加拿大接納移民最多，包含各色人種最繁，各種族居民接觸最密的一個省份，若種族不和事件一旦發展至到處皆可見的情況，這將是這個省的最大社會問題了，迄今毆打事件（因當事人報案而獲悉）雖然只是數宗，但最令人困擾的是這些案件均是於過去一年間內相繼地發生，似乎是一個趨勢。

過去兩年多的經濟不景及失業率日增，使不少加國人士紛紛將矛頭指向新移民，他們認為新移民搶走了他們的工作機會，加上人力及移民部長在公佈新移民法案時，亦把工作機會及接納移民數額兩事連在一起談，更加深了他們的成見。

在地車站內將那名坦桑尼亞籍移民推跌到車軌上的加國青年，亦存有這種「觀念」，於法庭上，當他在接受控方律師盤問時，曾作以下的表示，在他的供詞的字裏行間中，不難看出一陣歪風正在蔓延着。

控方律師：你的「加拿大人」定義是怎樣的？

被控青年：「加拿大人」？

控方律師：是。

被控青年：「加拿大人」的定義？我就是「加拿大人」。

控方律師：好，如何是？詮釋「加拿大人」。

被控青年：我在加拿大出生，在加拿大成長……

控方律師：同時，據你講，所有的工作都遭「外國人」當了，這是你剛才告訴Mr. Rosen（辯方律師）的。

被控青年：不是所有工作，但是大部份的工作，一大部份的工作，對不對？



控方律師：現在，你如何給一個「外國人」下定義呢？你所謂「外國人」是作何解？

被控青年：一個「外國人」就是移居到這個國家而在這裏工作的……

控方律師：而按你的「外國人」定義，是否包括任何非白色膚色的人士？

被控青年：這當然是，這就是個「外國人」。一個「外國人」就是一個「外國人」。

雖然在其他的證供中顯示出，行兇的兩名青年在犯事前曾在酒吧內狂飲，而在出手時仍醉意甚濃，但他們為什麼偏要對付一名棕色皮膚的「外國人」呢？這是不難尋出理由來的。

安省政府仍然深信(?)該省是各種族各文化的大熔爐，廣泛性的種族不和問題是不會在這裏發生的。按筆者的意見，目前的磨擦只是大危機的頂部，一方面是由於「加拿大人」對「外國人」的敵視因失業率增加而日益加深，另一方面則是新移民及非白膚色居民不再容忍以前被視為「閒事」的「歧視」，除非安省政府對這些問題加以正視，不再採取「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態度，這個問題將會變為日趨嚴重。

最後消息：多倫多市議會主席保羅高富利已下令成立一個名為「人際關係特種部隊」，就多市內種族不和問題進行調查，負責處理這任務的是理雅遜工藝學院院長獲達必文。

高富利在多市市議會上表示，市議會是有責任去對付種族歧視問題的，但目前却未知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到達那一地步，他謂：他相信這個特種部隊的工作足以顯示出市議會是不會容忍多市某些居民的和平生活受到騷擾的。

他說：「如我們不能保證多市所有市民的安寧，及使他們

可以安全地每天工作，他們對政府將會失却信心。」

高富利謂：過去數次的種族不和事件只是一些為非作歹之徒所為，並不代表多市大部份居民的意思。

必文本人一度是安省新民主黨的二號人物，他表示：他對種族間關係問題並沒有什麼特別學識或專門研究，但他於担上這任務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決定多倫多市是否是一個「沒有暴力及愛好和平的社會」，而如果種族不和問題真的存在，他將判定其程度及質素。

「基本上，我希望能尋出一些模範——研究這些事件是否與失業問題有關？這些事件是否集中發生在地車線上？和是否只涉及某一小數民族？」

他表示：如種族歧視問題在多市真的是一廣泛性的現象，解決的辦法就是在學校內及利用各種大眾傳播媒介去宣揚了解，向大多數居民解釋少數民族的不同生活方式及不同習慣，他不相信可以根絕種族歧視，而只希望喜歡欺壓少數民族的人士，經過教導後，於出口或出手時，皆事先想過。

這「人際關係特種部隊」將於春、夏兩季作一連串的公開會議，並定於在秋季時提出報告。★

今年的經濟展望

■于仁■

七六年的所謂經濟復甦，按照現有的統計數字而言，全不理想，而寄望明年能有所改變的人士，相信將會再一次地感到失望，多倫多環球郵報經濟評論員表示：加國在七七年的經濟只能有呆滯的增長，失業人數將繼續增加，而通貨膨脹亦只能有輕微的改善。

經濟專家預測，加國在今年的真正國民總生產（包括通貨膨脹率在內），只有有百分之三點五的上升，較去年百分之五的增長低，遑論符合長遠的潛力增長率，這個預測是基於假定美國政府將注入一百五十億元以刺激美國的經濟（刺激包括減稅及製造就業機會），使美國的真正國民總生意在七七年間，能有百分之五的增長，直接及間接地使其國內市場更能接納加國出產的貨品。

這預測同時亦假定加國政府將採取類同但較為和緩的刺激經濟計劃（包括減稅等），以扶長因利率減低而引致的經濟活動。因為刺激行動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可以影響及整體的經濟，如政府在這各季能主動地工作，這將使今年的真正國民總生產能多加百分之點五的增長。

一九七七年是經七四至七五年間經濟衰退後，步向經濟復甦的第二年，雖然預料將有若干刺激經濟的計劃，但國民總生產的所有組成部份（除建築業及生產的資本投資外）於比較起對上五次經濟復甦情況而言，只能表現出較緩慢的增長。按經濟的盛衰循環，在經過首年的經濟復甦後，於第二年間建築業將會呆滯，而要待第三年（即一九七八年），才能帶來資本投資額的增加。

今年國民總生產（簡單一句即是加國所產貨品及所作服務之總和）不能大幅度上升，將放緩僱用工人的增長率，而在同時期加國的勞工數目正不斷地增加，這使到失業率繼續上升。今年的工作機會額將作百分之點五上升（七六年的增長為二點四），而勞工隊伍則作百分之二的增加（去年的增加為百分之三）。

七七年的失業率將會徘徊在百分之七點五至八之間（去年的失業率為百分之七至七點五），換句話說：失業人數將超過七十五萬人而工作空位則只在十萬個以下。

別一方面由於食物價格及燃料價格日升，加上工資的增加，所以今年的通貨膨脹率亦只能有輕微的改進，消費者價格指數預料將上升百分之七（去年的上升為百分之七點五），國民總生產的價格指數估計亦作百分之七點五上升（去年的上升為百分之九點二）。

就實際情況而言，消費者開支在今年將上升百分之三點五（去年上升百分之六），政府開支將上升百分之三點五（去年上升百分之二），貨品外銷及服務費將上升百分之五（去年上升百分之十），屋宇建設將下跌百分之六（去年增長百分之二十），資本投資將沒有起跌（去年稍微下跌）。

加國市場的需求條件微弱，所以貨品輸入及服務費的開支將只增長百分之二（去年的增長為百分之八），由於入口增長量減低，另外加上外銷貨品價格的增加量超過入口貨品價格的增長量，今年將形成二十億元的出超（去年的出超為十二億元）。但由於服務費用赤字急速增長（今年預料達六十億元），所以在往來帳目上的赤字將沒有多大改進，去年的赤字為四十五億元。

稅前公司溢利估計在今年將增加百分之十一（去年只增加百分之二），由於利潤增加及工作量增加，勢將刺激明年於資本投資量上的增升，製造工業的生產在去年第三季的開工量為百分之八十六，比起七三至七四年的全盛時期（開工量達百分之九十六），相差很遠。

經濟專家估計利率在夏季將減百分之點五至一，但美國的利率在春季將稍為上升，而加拿大方面的利率則要隔六個月後，才作適當的調整，當利率在最低點時，在特許銀行的生意貸款的最佳利率為八厘五，而按揭利率則為一分。★

華人地產事業問題

訪問嘉年地產公司陳慶之先生

訪問、整理：海外述林編輯委員會

日期：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八日

地點：嘉年地產公司會客室



問：陳先生，你們的公司是華資地產業中比較新的一間，可否告訴我們是什麼原因促使你們選擇了多倫多作為發展地產事業的一個基地？你們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陳慶之：我們是去年（七六）四月正式開始營業的。選擇多倫多作為發展基地，是經過相當的調查、研究得出來的結論。在此之前，我們曾經花了不少時間，到過美國、加拿大各大城市，對地產事業的形勢做過多少研究工作。加拿大的情形則是這樣，一般說香港、東南亞、南美洲以至西印度羣島來的華人，多集中在溫哥華、多倫多或滿地可。經過分析後，我們覺得在這些城市中，多倫多比較上來說較有發展潛力。當然，這樣說究竟對不對，將來便會知道，不過從過去種種發展傾向看，我們認為如此。我本人認為溫哥華最多華人集中。主要原因，由於地理的因素，溫哥華屬於太平洋區域，從東南亞來的，第一站多是溫哥華，但溫哥華有着它的發展的限制。第一，溫哥華的人口等於多倫多一半，或小過一半。第二、加拿大的經濟中心，據我看來，是安大略省。溫哥華工業的基礎稍為狹隘，它主要的工業是木材、造紙、漁業，缺乏重工業，而這些工業又是季候性的，以天然資源為主的。相反，安大略省的工業範圍廣泛；譬如說若以多倫多為中心，則鋼鐵業在威美頓、汽車業在奧莎華（Oshawa），還有如許重工業集中在安大略省南部地區。這便使多倫多有一個工商業發展的基礎，因為當有數門重要的重工業集中時，便會產生許多連帶性的副工業，同時金融企業自然亦相應地得到提供服務的機會。這樣，就業機會多了，人口增加了，更多的服務性行業亦隨之而來，就好像一個累積的循環系統一樣，這個地區因而繁盛。地產業在這樣的情形下，發展的基礎自然比較其他地區（如溫哥華）高。還有一點是，我手頭一時沒有統計數字，但我曾經看過某些關於人口分佈的報導，指出安大略省的年輕人較多。譬如以華人為例，一些從香港來的學生，即使不是在安省畢業的，畢業後仍大多搬到多倫多謀求發展機會。種種因素使我們得出多倫多較有發展潛力的結論。

問：有人認為溫哥華的地產事業已經發展到飽和點，你們是去年才開始的，據你看多倫多地產業現在發展到那一個階段？

陳慶之：我認為多倫多地產業從許多角度看還是可以發展的。許多關於地產的概念，比方說分層出售這種購買方式在香港是相當長久、普遍的，但在多倫多只是近四、五年間才流行和被公眾接受。在香港曾經採用過的一些地產買賣方式，在多倫多仍然是相當新的概念。簡單說，多倫多地產市場的活動過程，倘若和香港比較，可以說差不多等於香港六十年代初期的起點階段。

問：你們公司的顧客對象以什麼國籍為主？是不是以華人居多？

陳慶之：這要分開來說，站在以商言商的立場，我們當然沒有任何國籍上的排外性，否則安省人權協會也不會放過我們……（笑）。但以我們兩個主要部門（物業投資和住宅樓宇）說，大形性的物業投資和香港，東南亞財團的聯絡較為緊密，住宅樓宇則各國人士都有，不過目前為止，華人仍佔最大比重。

問：你們對一般有意投資者，通常是怎樣提供意見？

陳慶之：首先我們會向他們分析多倫多地產業的特性。這裏和香港是不同的。香港地產投資有時可以一夜暴富，投機性很大，俗語所謂炒地皮。這現象多倫多不是完全沒有，但非常少見，通常上漲或下跌幅度不大。另外在香港投資地產，一般可望在三、五年內套回資本，術語謂「回籠」，屬於短線投資。加拿大的情形有別，是長遠性的；投資者可以期望穩定的收益，像香港那樣短期回籠的情形很少。所以一般在加拿大投資的，都側重於穩定的長期收益；換句話說，差不多是買保險的性質。這與加拿大的政治局勢有關，加拿大的政治局勢比東南亞國家穩定，在地產業上就有這樣的表現。當投資者側重穩定的長期收益方法時，我們通常建議他們購買現成的建築物無需經過建築等步驟，當然，這樣得回來的利潤不會太高。另外一種收益比較大的，是先買地皮，再興建上蓋。這類投資方式我們亦有建議給一些財團。不過要收益大，付出的投資額以及冒的風險自然相當大地，外來投資的，未必願意這樣做。甚麼是風險呢？因為第一，對這裏的環境不熟悉；第二，對這裏的建築法等程序認識不夠；第三，未知的因素多，頗有不知從何着手之感。對這樣的投資者，我們不但給予意見上的幫助，而且我們

公司本身擁有各類專門人材，如建築師、工程師、會計師、法律顧問等，提供服務，比較起長期收益的投資方法，這類投資者是少一點，原因在於外來投資的對現成建築物業較有信心，只要驗過建築物的結構、建築材料，差不多便算一切妥當。買地皮與建上蓋的則不同，譬如說由於加拿大社會的民主性質，如某投資者要在某地興建建築物，有關部門除了檢核應有的申請條件外，還會徵求附近居民的意見；有時即使符合了興建樓宇的各種法例上的規定，也有可能由於附近居民的反對而不獲批准。這就是所謂未知的因素。就算最後獲得批准，時間上也是一個損失。另外一個例子，是年來的市中心市政府對准許興建上蓋的面積，曾有過反覆的政策上的變化，若對這類情形不熟悉的，很容易「損手」；以前市政局准許舊唐人街興建上蓋的面積是十二倍，現在在建議的條例中，只許建兩倍半。在投資者的眼光裏，這個變化，是截然不同的。

問：過去數年來，多倫多住宅樓宇價格的上漲率幾達百分之百，據你看是什麼原因導致的？

陳慶之：這個問題我只能粗畧回答，因為就是許多經濟專家也有許多不同的看法，據我看原因主要是那幾年間加拿大的經濟還算好境，通貨膨脹是存在，但一般人的收入增加也是事實。加拿大和香港不同，購買樓宇的按揭相當大，付出的首期不多，使有意購買樓宇的人能夠靠賴在未來收入的預算裏分期付款，若果把未來可能增加的收入也計算在內，收入增加的比率，使在購買樓宇時的價格變得更低，刺激人們購買。這種購買產生的連鎖反應刺激更多的人們搶購，遂導致樓宇價格暴漲，造成搶購浪潮。這情形越來越嚴重，市政府不得不在七四年四月九日發出外來投資稅來限制這無休止的暴漲。另外補充一點，通貨膨脹使幣值貶低，但正是由於幣值下跌，人們便會興起購買物業之念，因為這也是一種保值的方法，數年前的搶購潮與此不無關係。

問：這數年來移民的增加會不會也是因素之一？譬如說，七一、七二年期間，移民政策還是相當寬鬆的。

陳慶之：這個因素是相當重要的，加拿大地產業的外來投資一向佔頗大比重，另外歐洲（如西德、瑞士）的游離資本亦同時轉進，他們也擔當了一個角色。這些跨國財團因往往在某些國家經濟好境之時進入市場，不好境時則移離。像香港七十年代初期的股票市場一樣，那時外國的游資也很多。

問：剛才你說過多倫多地產業有很高的發展潛力，那麼據你看樓宇價格現在是踏入穩定期還是怎樣？未來又如何？

陳慶之：從過去一年的觀察看，樓宇價格將會趨向穩定，起碼在未來一年仍會如此。因為樓宇價格上漲與否受按揭付出的利益影響很大；去年頭號按揭付出的利率會經達12%，甚至12.4%。利率高之時，一定會影響到人們購買樓宇的處理，一般人往往不是關心首期付出多少，而是每月要付出若干，利率高了，自然影響市場。在「薪金」價格限制(Wage and Price Control)

法例仍然生效的情形下，穩定是更可能的，搶購潮很難會再出現。除非政局有什麼特別重大的變化。例如卡特執掌美國政壇後，若推出某些政策，短期內推動美國經濟好轉；那以美國和加拿大關係之密切，一定受到影響，這樣或許地產業會有變化，但這類的因素是相當難預測的。

問：陳先生，你們公司好像對政治局勢的變化非常留意，這是否與一般華資公司不同？因為我發覺這裏的華人往往不大注意政局的變化的。

陳慶之：是的，許多香港或東南亞的投資者一向都不大注意政治；我們認為在北美辦地產業不能忽視這問題。因為地產業與政局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無論在城市層面，省的層面以至到聯邦的層面，每一政策上的改變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地產業。

問：陳先生的意見是不是認為海外華人不應該再像以往那樣對外界事漠不關心，而應該注意與華人社會發展有關的政策？

陳慶之：是的，以本地華人來說，很多仍有「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心理，對政治更有敬而遠之的習慣，要知道這裏是民主國家，不會有什麼問題的。但華人仍不夠關注。如市政府要減低登打街興建樓宇的上蓋面積，假若大家覺得這政策與大家的利益有直接損害的話，應該組織起來，向有關方面表示我們的態度。無論成功與否，起碼向政府反映我們的意見。我曾經和有關部門人員非正式談過這問題，站在地產業的原則，我們是反對這政策的，但那官員認為由於其他人無所表示，自然當他們不反對論了。事實上却可能是相反的。可見以後大家應該對於大家利益有關的事多點關心，應該同心協力。

問：這方面猶太人好像做得較好？

陳慶之：是的，他們團結。

問：現在有一種說法，是新移民法案若一旦通過，可能會縮緊申請移民的數目。假若此事屬實，對地產業發展會不會有影響？

陳慶之：這在一定程度上會有影響。就說七四年四月發出的外來投資加20%稅額的例子罷，那次的影響就相當大。

問：提到外來投資，令我想起數十年前的人往往在北美洲工作儲蓄，然後回港購買物業，現在有沒有相反的情形出現？即不打算移民來加，而只是投資生利？

陳慶之：這情形相當普遍。現在新一代和數十前的老華僑不同的，是從前老華僑多有落葉還是要歸根的想法，新一代的想法則有長居的傾向。身在香港而投資在加拿大的，有以備不時之需或留給下一代有發展機會的意思。因為如我在訪問開始時所說，在加拿大投資地產業的像買保險一樣，長期穩定收益。

問：近來由於美金幣值回昇，影響加幣稍跌，這情形你看會不會繼續下去？會不會影響投資者的投資信心？

陳慶之：這個我不會。據一些經濟學家表示，以往加拿大幣值比美國高，是一時的人為現象，因為加國的經濟不比美國強，加幣比美金低是自然的，以前加幣比美金稍高，部份由於加國政府那時採取高利的政策，吸收外資湧入，套取利息。但其實這不是好現象，影響出

入口業務，現在加幣畧低於美金，對地產業不會有影響，甚至可以說是正常的，會刺激外來投資。

問：你可否提供一點意見，談談辦地產業與其他行業的分別。換句話說，地產業的特性？

陳慶之：投資地產業和投資其他行業不同之處很多。但假若以一個剛剛投資的人來說，地產業是一門相當穩定，而所費的精神較少，所需要對專門技能認識不一定要太精的行業。另外地產業是現存經濟制度裏一方面最敏感又最穩定的，因為在社會經濟繁榮之時人們會找更好的居住環境，但最壞時仍然要住屋，可以說假若地產業全面崩潰的話，一定是那個社會的經濟已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了！

問：最後一個問題，陳先生認為現時海外華人處理商場的方法怎樣？應否有所改變？

陳慶之：我認為我們應該多採用些新式的工商業管理方法，試圖更有效地打入整個加拿大的經濟市場，而不應只局限於華人社會，不再封閉。同時提高華人在多倫多的社會地位，華人傳統的經商方法當然有它的優點，但不應墨守成規，應與新方法結合。華人在多倫多的人口比率約佔百分之四或五，那麼嘗試爭取另外95%的市場，擴大我們的對象，增廣我們的市場，讓華人在每一行業中也有一定的立足點。★

(本文整理後曾經陳慶之先生過目)



- (一) 本刊為一公開園地，歡迎各地讀者來稿。
(二) 本刊選稿的原則：凡不作人身攻訐的文章均一律歡迎。
(三) 來稿請以原稿紙書寫，切勿一紙兩面；除專題特約稿外，以不超過三千字為佳。來稿請附上真實姓名和地址，惟可用筆名發表。文章不願刪改請註明；如欲退稿請附上回郵信封。
(四) 本刊因經濟關係，暫不設稿費，來稿一經刊載，即致送該期本刊二份。
(五) 來稿請寄

P. O. Box 53
STATION P.
TORONTO,
ONTARIO,
CANADA.



徵文



奇華餅家

券餅華奇美精備特
用通華哥溫多倫多

社團茶會
特別優待

生日蛋糕
新鮮麵飽



龍鳳禮餅
中秋月餅

各式西餅
結婚蛋糕

地 址

多倫多 正店 261 Spadina Ave., Toronto
分店 56-58 Centre Ave., Toronto
溫哥華 271 Keefer Street, Vancouver

Tel: 368-2960/2969
Tel: 598-0238/0239
Tel: 685-2117



第二章 剝削及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

上一章跟大家談過價格的作用，得到了幾個結論：

- 一、在個人入息平等的情况下，供求價格對產品起了一種「自然分配」的作用，讓不同喜好的消費者，可以各適其式，在不損害他人利益的原則下，購買自己最喜歡的消費品。
- 二、在同樣的情况下，供求價格給企業顯示出各生產資料的社會代價（Social Cost），讓企業在生產過程中選用代價較低的原料，不致產生浪費。
- 三、在同樣的情况下，供求價格會隨着消費者的喜好的變動而變動，使資源的分配可以隨時反映人們的需求。
- 四、即使個人入息不平等，只要每人的購買力跟他的生產值成正比——即是不佔取多於自己生產值的購買力的時候——仍不會做成剝削。上述的價格作用，在一定程度下，仍得發揮其積極意義。

現在要跟大家討論的，首先是剝削的本質，然後再談資本主義下的剝削問題。第三章將討論社會主義下的剝削問題。

剝削的本質

剝削跟不平等（指權益上的不平等）是相同的：社會上有剝削的現象，就有不平等；社會上沒有不平等的現象，就會沒剝削。

這裏指的不平等，不是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工作本身不會做成不平等。即使收入不同的工作，本身也不會做成不平等。做成不平等的，是特權——那些不是由自己的工作換來、而別人又不能享用的權益。

在杜絕了特權階級的社會裏，剝削是不可思議、沒有意義的。剝削的先決條件，就是特權的存在。剝削的具體內容，就是特權的運用於損人利己的事情。

這不是說沒有剝削存在的社會，就已經是完美的社會。一個平等的社會，可能仍有欺詐、偷竊等現象，但我不叫這些做剝削。一個制度上已完全杜絕了剝削的社會，仍需要每一個人不斷在思想的戰線上作長遠的鬥爭。我們不可能等待每人變成大公無私的，才去杜絕剝削，去防止個人憑藉特權，來損人利己。

資本主義下的剝削

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着剝削，而且，資本主義社會因保障了剝削階級的利益、認許和鼓勵了利己思想的發展，以致很多的剝削行為，變成了天經地義的事。資本主義社會裏，利益衝突的事件比比皆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階級鬥爭」。

馬克斯等共產主義者認為，自從人類社會脫離了原始部落的階段，就一直存在着剝削：奴隸主剝削奴隸；地主剝削農奴；資本家剝削無產者。奴隸主剝削的憑藉是兵力和權勢；地主剝削的憑藉是土地的擁有權；資本家剝削的憑藉是生產資料的壟斷。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階級鬥爭是一切利益衝突的主流，也推動着歷史的前進。直至階級社會消滅、無階級社會代之而起，階級鬥爭將會持續。

這本來是頗精闢的見解，但是馬克斯對剝削的闡釋並不完善。當然，每個人免不了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在十九世紀後期，馬克斯對剝削現象的解釋，是頗恰當的。不過，世異時移，馬克斯對剝削的理論，已有重新商榷的必要。

馬克斯指出，資本家擁有生產機器，是工業革命以來至十九世紀末的主要剝削成因。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稱：「無產階級是由於產業革命而產生的，這一革命在十八世紀下半年發生於英國，後來，相繼發生於各文明國家。產業革命是由蒸汽機、各種紡織機、織布機和一系列其他機械裝備的發明而引起的。這些價錢很貴，只有大資本家才買得起的機器，改變了以前的整個生產方式，擠掉了原來的工人。……於是從前的中層等級，特別是小手工業者，日益破產，勞動者的狀況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產生了兩個漸漸併吞所有其他階級的新階級。這兩個階級就是：

- 一、大資本家階級，現在他們在所有文明國家裏幾乎是一切生活資料以及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必需的原料和工具（機器、工廠）的獨佔者。這就是資產者或資產階級。
- 二、完全沒有財產的階級，他們為了獲得維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只得把自己的勞動出賣給資產者。這一階級叫做無產者階級或無產階級。」

資本主義下的剝削，共產主義人士認為關鍵在於「剩餘價值」的榨取，所謂「剩餘價值」，就是勞動所產生的、扣除了工資之後，「剩餘」的「價值」。勞動的商品價格（工資），相等於該勞動——作為商品——的生產費用，就是「糊口所必需的最低額」。資本家付出工資（「可變資本」）和生產資料的代價（「不變資本」），經過生產過程，賺取利潤。而這利潤，就是剩餘價值。

這些理論，描述了資本主義初期的一個現象，但對剝削的本質，仍未抓着重點；對現代資本主義下的剝削現象，有相當距離。

為了引證這說法，讓我引親共的朝陽出版社的「政治經濟學小辭典」。

對「剝削」，「小辭典」作了如下的解釋：

「剝削」是指社會上一部分人或集團憑藉他們對生產資料的壟斷，無償地佔有另一部份人或集團的剩餘勞動。……

剝削的產生，必須具有以下兩個條件：（一）生產力的發展達到使人們的勞動能提供剩餘產品的水平；（二）私有制的出現以及隨之而來的財產不平等現象的發生。……

資本主義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發達的也是最後的一種剝削制度。』

本來，對「剝削」這名詞，任何人都可以下自己的定義，這全看下定義者的目的而定。上文我下的剝削的定義比「小辭典」的來得廣，也較適合致力爭取平等合理的社會的人士的要求。我覺得，任何一個社會，只要還容忍小撮人利用自己的特權去做損人利己的事，這社會仍是有待改革的。所以，不論這特權是基於對生產資料的壟斷、還是基於政治地位、或是基於別的權力，剝削的本質是依然的。「小辭典」的解釋是基於馬克斯理論的。它容易使人忽視社會主義社會裏的剝削，同時對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剝削，也欠完滿的描繪。

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不單是勞動人民生產成果的被榨取，而且包括了經濟和政治權益的不均等。

經濟和政治權益的不均等，全賴私有財產和政治權力的世襲或私相授受而得到延續。

財產和權力的世襲和私相授受，是充滿封建色彩的制度。它否定了人生下來就應該平等這個理想，是維護「階級利益」最強的堡壘。

僱傭制度之所以成為剝削的工具，就是因為這個封建的階級特權。這特權保證不同階級的人在身心的發展方面會得到不同的待遇。

一切生產資料是過去勞動的積累。繼承權和私受權是讓一些人取得別人的生產積累。廢除了繼承和私受，就廢除了「資產階級」的特權，迫使他們跟別人一樣，要經過生產才可以得到生產積累。那個時候，僱傭制度將變成非剝削的制度，讓人們可以在平等的基礎下，選擇適合自己的職業。當然，國家仍可以用抽稅的方式使人們的收入趨向平等。廢除私相授受和財產繼承，將導致土地、房屋或其他不動產只可租賃，不得私有現象。

現在，讓我們列舉資本主義下的種種剝削情形：

一、貧富漸趨懸殊。財產的繼承必然導致財產的集中。財產的集中，使前章所論及的價格功能破產。由於窮人無力付出較高的價錢購買所需品，這些物品的利潤率不會很高，而富人却有能力購置奢侈品，這就是如何做成奢侈品的生產有利可圖。生死攸關的糧食問題，至今仍待解決。當富人駕駛名牌跑車的時候，他有意無意間就把一些窮人推向死亡邊沿。

二、不動產的增值。孫中山先生很早便提出過「土地漲價歸公」的綱領，就是針對私人攫取不動產的增值而設的。不動產的增值，一般是由大量的社會投資（譬如交通水電等）或需求激增所導致的。私人攫取不動產的增值就是不勞而獲，利用自己對該物業的擁有權，窃取社會上其他人的勞動果實，所以是一種剝削。有不少例子，是當社會需要某地皮以作發展的時候，若干業主體察機會，待鄰近地皮已賣至七七八八的時候，要求巨款，否則不予賣出。這無異是敲詐勒索。但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這是合法的。倘若不動產不得擁有，只可租賃，這種現象便可消滅。

三、貪污舞弊和罪惡企業化的私相授受在資本社會裏一般是合法的，因為財產的擁有權包括對它的處置。所以在此等社會裏，貪污舞弊的事件經常發生，很難消滅。尤其是利益關係重大的「交易」，當事人往往冒一些風險——何況冒風險是「企業家」理應擔當的責任！（這是資本主義的邏輯）。於是美國有尼克遜、艾格紐等事件；香港有葛柏、華探長事件；加拿大有加航、洛依德事件；日本有田中閣榮事件等新聞出現。很多罪惡事業，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能夠「發揚光大」，也是因為它們的頭頭資本雄厚，有人包庇。

四、虛假的平等。循着歷史的發展，人類對平等的需要空前高漲，所以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或是資本主義國家，甚至行種族主義的南非，都要口頭上講平等（Vorster說的：All men are Equal Before God）在上帝的面前，人是平等的。）不過，資本主義推崇的「機會均等」，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是不存在的。當子女繼承着父母的貧富、當有能力置業的人攫取了物業的增值、當財團控制了輿論的大部份、當貪污事件無日無之的時候，誰會相信加拿大、美國、香港等是「機會均等」的社會？在美國初期，「機會均等」仍可勉強說得過去（黑人及小數民族除外），因為財產仍未十分集中。從現在貧富懸殊的情形，各利益集團推出種種法寶去維護自己的利益的時候，「民主自由」只是有偏頗的民主自由，不是真的民主自由。小數的財團把持着國家的政治經濟，他們的剝削行爲，又何止「剩餘價值」的榨取？

五、戰爭。一切的戰爭，基本上都是由利益衝突所導致的。就算是所謂「宗教戰爭」，我們不難找出其中的利益衝突的因素。資本主義鼓吹了利益衝突、認許了巧爭豪奪，這就導致帝國主義的對外擴張和戰爭，及藉此而來的剝削。

上述是比較突出的剝削情形。有一些人會認為它們是「無可避免」的事情，因為人「天性」貪婪、自私。他們又會指出，像我們說的「真正的自由民主」，在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又有一些人以為競爭是一切進步的動力，算是號稱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中國、南斯拉夫，始終仍不能避免一定的「物質刺激」。

人類的社會是前進的。人類的社會是需要前進的。因此我們正是須要實現人類歷史未出現過的事情。至於人的「天性」問題，我們無需討論。我們無需否認人「貪婪、自私」的弱點，也用不着等待洗清了這些弱點才去改革社會。正是因為我們知道人往往是貪婪、自私的，所以我們要在制度上限制這些「人性」的弱點，使它不能發揮作用。我們也用不着完全廢除「物質刺激」——我同意工作多、快、好、省的人的收穫比工作少、慢、劣、花的人多。但是平等的發展機會——包括廢除財物的繼承和私相授受，只會把國家的經濟搞得更好。原因是：平等的發展機會讓我們可以選出更能幹更適合每工作崗位的人才。對個人來說，可以得到更充份的個性和潛能的發揮；對國家來說，可以得到更好的經濟效果。

（待續）

寓言一則——悼某君

窗外鑼鼓喧天，人聲沸騰，使我好奇起來。

哦，原來是一支人馬，浩浩蕩蕩，舉着各色旗幟，大搖大擺，呼呼喝喝，好不熱鬧地沿街而上。

大隊前端，樹着一幟高大而鮮紅的大纛，纛下端端正正的坐了一個活佛，被人羣簇擁着前進。活佛的面容嚴肅而冷峻，但掩不了內心慈祥底實質；他是孤獨的，四周喧鬧情形對他如沙漠風聲。然而他看來並不寂寞——他的心靈早已和背後的人羣連結起來。

趁熱鬧的、加入隊伍的、混水摸魚的被大隊聲勢吸引著，紛紛加入行列。活佛帶領着家人，左指右點，時快時慢，或亂或齊，居然行了好一段路，而且陣容越來越大。

來到一個十字路口，有些趁熱鬧的停了下來，不再前進了；又有些留戀過往鄉土的，開小差掉頭去了；更有些混水摸魚的，趁機製做混亂，煽動一部份人打橫街陋巷而去。事後證明，這些沒有耐性，一知半解，營利結黨的傢伙，不是被洪流淹沒，便被豺狼吃掉。

活佛繼續帶領着家人趕路。道路曲折危險，障礙重重，虎狼四伏；然而他深深的知道，只要大隊堅持下去，必然會到達目的地。

又行了一段路，活佛累了疲了，只見他在嘈吵聲中兩眼一瞋，沉沉睡去，從此一覺不起。

沒有人知道他「超度」去了那裏，也許是去見他期待已久的「上帝」，也許是找他的老朋友們算賬去了。但無論如何，活佛再不能親自帶領大隊啦！

路仍然有！而且大隊堅持着要行下去，不到不休。只見家人抬着活佛的軀體，一些先行的揮動着活佛的旗號，浩浩蕩蕩的繼續前進。

我所看到的只是這麼多了，以後的情形怎樣，只能憑空臆度。但可以肯定的說，以前趁熱鬧、混水摸魚、一知半解，營黨結私，如今還混在大隊裏的一小撮，遲早會被本性所限，自動跳出來搗亂，這樣一來，他們一定逃不出同類先前的命運！

也可以肯定的說，道路是漫長而艱險的，要是有人企圖走捷徑、行小路、不跟大隊、不辨方向，一定得到悲劇收場。

至於人們如何處置活佛的遺體，簡直不須我們去擔憂嘛。他是不怕被人鞭屍的，而且早準備「跌得粉身碎骨」。事實上，要是大隊能跨越活佛的死屍，繼續前進，老佛爺的理想目標已是達到了。

窗外蚊蚋爭鳴，狼嚎虎吼，使我的心如鉛墜。★

向東

無望的禱告

「我要——！我要——！」

他遽然驚醒，雙目圓睜，眼前却漆黑一片。額角有兩行汗珠滑下，掛在口角上。

「我要什麼？」他呆呆地想，心裏茫然一片。

他心裏厭煩起來，起了床，扭亮了床頭燈，赤着腳從床腳的電冰箱裏拿出一瓶牛奶，一面喝着，一面翻着寫字枱上的舊雜誌及草稿紙。

無意中他看到了早已跟他斷了交的女朋友的照片。他細心地欣賞着，彷彿是第一次見的一樣；（其實，他不知道已看了多少遍。）現在的她，已經結了婚，孩子也有了。他覺得照片裏的人是可愛的，雖然以前他曾為她不太出眾的客貌而有點那個。他對她思戀和回憶，祇是出於一種莫名的傷感和慨歎。

他又看到了父親的來信。

「……為父的這番說話，並非怪責汝，實是為汝前途着想，汝須慎重考慮，好自為之，勿令為父的失望和難過。……」

他的眼圈濕潤了。他感到自己對不起父親，但他却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他的頭感到一陣陣的暈眩。

「我要什麼？」他又茫然了。

我要投入？我要脫離？我要平靜？我要瘋狂？我要繼續？我要安歇？我要飛揚？我要固守？我要自新？我要回歸？我要反叛？我要開朗？我要「我要」？……

上帝啊！我是多末軟弱，又是那末的倔強和驕傲！我是多麼須要依賴，又掙扎着要獨立！我拖着疲乏的步伐找尋安息之所，又打算闖到風暴中去，作激流拼鬥，我是多末的無知，又想解決世界上任何大難題！

天是灰色的，雷聲是低沉的，電光令我驚悸，濕土令我腳軟。雨點濕透了我的衣服，荆棘劃破了我的皮膚。我被絆倒了，仍然無力地爬着，我畏縮，仍然無望地前進。

上帝啊！是否祢替我安排了一個厄運，還是對我的命運無動於衷，任由我消沉湮沒？上帝啊，祢聽到我的呼喚嗎？我在高聲疾呼，已力竭聲嘶，而祢像這黑夜一樣的隱晦無聲！是我避開了祢，還是祢離棄了我？

「篤篤篤」是一陣敲門聲，在靜夜裏顯得神秘詭異。

他細心地聆聽。

「蕭先生！」是房東的聲音，「你半夜三更在房裏踱來踱去，鬧嚷嚷的，把別人都吵醒，真太不像話了。你的行為，已引起許多房客向我投訴，我也已經告誡過你多次了……，請你明天收拾好，離開這裏罷。」★

方生

給你的一封信

今夜在燈下讀着你的信，我覺得溫馨而又悲哀，這些日子以來，我已經不再是你熟悉的我了。你充滿溫情的信，還是這樣無拘無束的，使我想起了昔日，但昔日的那種會使我激動的人和情懷，現在却彷彿只是別人的感觸，在我的感覺中已無法再重現起來。你無需驚訝我的感覺，人就是那樣無可奈何的存在，我們的生命、時間、感情、不是每一刻的在失去嗎？更何況是年輕人的幻想和熱情？

生活，我是熱烈地讚美過的。我說我喜歡它豐盛的一面，也欣賞它孤獨的存在，但現在看來，這只是一種年輕人的夢囈，一個溫室裏的樂觀主義者。其實，對於生活，我們都不過是一個旁觀者嗎？我們眼睜睜的看着每一件事的到來，也看着它的離去，我們每天看着朝霞，也看着夕陽，我們的感情悄悄的來，也悄悄的走了，多少會使我們感動的事，然後又給忘了。我們，又可曾留下點什麼？

離開了年輕人那一股熱情和理想，我現在內面空洞洞的，什麼都沒有了，我的心死了，死得就跟那些成功的人的心一樣，所不同的，他們是把它出賣去，而我則是把它割開了，我越是認真的看，可以拋棄的東西越多，最初我痛苦，漸漸地麻木，到現在剩下的，只是一個軀殼，隨着地球，在這太空中，漫無目的的狂奔。

我們的生命就如一條條的獨木舟，向着大海走去，毫無目的而又無邊無際，起初我們還可以看到同伴，越向這大海走去就越孤獨，偶而你還會發現一兩個在你身旁的人，你愛上他們。但你總會發現，共同的只不過是一段旅程，你看到他們在這茫茫的生命海中沉下去，他們掙扎、呼喚，你却只可以看着他們痛苦，你瘋狂、你叫喊，但聲音在這世界上只是空洞的。直至你平靜、直至你自己生命的獨木舟也沉下去的一天……。

你問我，在做些什麼？在想些什麼？在我這樣干澀的時候，還可以對你說些什麼呢？從一個年輕人的沉重的夢醒來後，我可以看到、嘴嚙到的只是陰暗、冷酷和寒冷，而生命回應我們的却是漫無意義。作為一個成人，我艱澀的把這些咽下去，在我的心中再也描繪不出一個有意義的世界，而就是當這些詛語、當這些可憐的理想世界都成為現實的時候，於我們又何干呢？難道我們現在就應該吞嚥下這些寒冷，陰險和冷酷嗎？

你會說我太悲觀、但這世界的本身就是悲觀的，而我，只是在道出真實。

在校園的草地上，對着茫茫的星空，曾對你說：我震懾於宇宙的浩瀚，現在震懾於我面前的：是生命的漫無目的，和生活的寒冷。★

金帛

並不存在的第四度

朋友，收到你底來信的時候，我告訴自己，難道又是新的失望？

你是一個風雨中長大的人，掙扎過，自然珍惜生命裏頭可貴的事物。對於世間一切紛爭、喜愛、虛偽、厭惡、狡猾、奸詐、逢迎和真摯，你不是比別人辨別得更分明嗎？認識以來，一直以爲你會堅持走自己的道路。雖然祇是短短的兩次會談，從你那思維緊密、談吐平穩的對白中，我看到你這方面的性格，至少自以爲是。那不一定是自己觀察入微，倒是由於交雖淺、言却深吧。

我無權過問你近日交上怎麼樣的朋友。人到了一定的年歲，社會底接觸面必然是廣泛的。兩個心靈相遇在一起，任何思想上的交流總會產生或多或少的沖擊。這是無需怪異，也用不着迴避。強的一面發出較大的影響，弱的一方亦有其反射的條件，互相沖擊而已。思想上的斗爭好比疫苗一樣，有着激發抗生體的功能。健康強壯的人絕不會懼怕注射疫苗的；思想正確的人大抵也是如此。

你怎麼會開始追求那個虛無的、不可知的形體，來信中沒

有提及。但從自己底未經深思的理解中，我看到如下的可能性：人開始對那位不可見、不能捉摸的形體崇拜起來的一刻，是他對人類（包括他自己）失去信心的時候；而他對那死後並不存在的世界開始憧憬，亦是他不敢面向現實的起端。

朋友，請原諒我又像是要說教了；自己亦無意說下去，否則，我們勢必陷落那無可爭論的老問題上去。然而，還是希望你能繼續給我來信。

世界上沒有東西比自己的同類更值得人們去關懷了。明乎此，你是會放棄那虛無底追求的。

× × ×

人們總冀望狗口可以長出象牙。因此，狗才會猶猶而吠。它們對指出「狗口長不出象牙」的人尤其憎恨，但却甘心舐舔主人的痔瘡。

狗有一套自圓其說的戲法，把那些整天在思想上的象牙塔內自詡爲「我是真理，我是革命」的人玩弄得如三歲的孩子。不，不能說它們耍弄，更不許說它們把人矇閉。「我被欺騙了」聽得太多罷？他們必還再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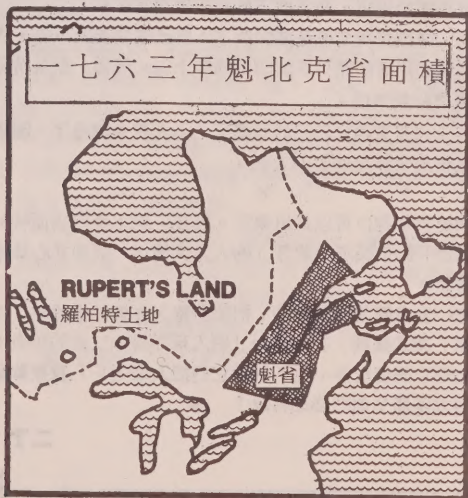
「魁北克國」的面積該多大？ 仁。

自從魁北克人黨在去年十一月十五日大選獲勝後，魁北克省是否會脫離加拿大聯邦政府而獨立便成爲一熱門的話題。據多倫多的一名律師發表在「多倫多星報」的一篇文章謂：如魁北克省真的成爲了「魁北克國」，它的版圖是不應像目前的那般大，因爲魁北克人（法裔加人）的原有聚居地只是該省目前面積的一小部份，該省現在所包括的面積有一大部份是獲加國聯邦政府所「頒贈」的，而聯邦政府在劃分這些土地予該省時，是基於魁北克省是加國聯邦政府的一個省份，而絕不預知該省目前的執政黨派是一個希望將魁北克省變爲「魁北克國」的內閣。

據歷史指出，法裔居民的起初居處僅是聖羅蘭斯山谷一帶，按一七六三年的「巴黎條約」（立於英國殖民地軍隊在魁北克省戰勝法國的殖民地軍隊後），魁北克省的大致省界爲，北至拉布拉多的聖約翰河，由該河之源頭經過聖約翰湖到南面的納必勝湖（Lake Nipissing），再從那裏直線地向東南伸展至於平湖（Lake Champlain），然後沿聖羅蘭斯河兩岸直出大西洋至聖羅蘭斯灣。這個範圍雖然廣闊，但與目前的魁省面積則大有出入。

一七七四年的「英國魁北克法例」將魁省的面積直伸至美國的俄亥俄山谷一帶，因英國希望可以藉此遏止美國的叛變殖民地向西發展，而在北面則把省界擴展至赫遜灣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所擁有的區域以南，該公司所擁有的土地名爲「羅伯特土地」（Rupert's Land）。在是項法例中魁省並從紐芬蘭省的區域中，取得拉布拉多及一些島嶼。

美國獨立戰爭完結後使英國失去了五大湖以南的一切土地，而在一七九一年，魁省（或應該按當時的稱呼：魁北克殖民地）於沿着渥太華河被劃分爲「上加拿大」及「下加拿大」兩部份，而拉布拉多及安迪葛士迪島亦被撥回到紐芬蘭省的範圍之內。



一九四一年的「聯合法例」將「上加拿大」及「下加拿大」合二爲一，及定名爲「加拿大省」。到一八六七年當加拿大獲得自治權而組成聯邦政府後，「上加拿大」被正式定名爲「安大略省」，而「下加拿大」則爲「魁北克省」，這兩個省份的北面省界止於「羅伯特土地」的南面界限，這個情形一直維持至一八七〇年，當「羅伯特土地」及西北區歸入加拿大聯邦爲止。

到一九一二年時，魁北克的省界在聯邦政府的安排下擴展至赫遜灣及赫遜河峽（這幅土地原屬西北區的）。於是時魁省又與拉布拉多因區域界限而發生問題，這糾紛一直鬧至一九二七年由合議庭決定劃下現時的省界，及判決拉布拉多永遠歸屬紐芬蘭省管轄。

加拿大的歷史指出了魁省省界的發展，而魁北克人如在要獨立時，不能以任何歷史理由來把目前的省界當作日後的國界，應該被減去的地方包括該省龐大的占姆士灣發電計劃在內；又因該省把紐芬蘭省與加國其他省份分開了及包含着通往五大



魁北克省目前的面積

湖的聖羅蘭斯海道，所以在該省未成爲「國」之前，加拿大基於國家安全及交通問題，必會事先爭取安排一些「特區」及交通走廊。這幾點將會是日後的爭論點。

按很多政論家於事發及事後的觀察，魁北克人黨黨魁雷域克對自己這次大選得勝亦頗感到意外，於出掌大權後，他和他的內閣亦已開始感到要把魁省脫離加國而獨立，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因爲在處理這問題的前面，有着無數的逼切問題等着他們去處理，這些問題包括如何減低龐大的失業人數？如何應付面對的十億元赤字？如何穩定投資界對「魁國」前境的信心？及如何處理他們日常的事務？

有關「魁國」的國界是否就是目前「魁省」的省界當然不是這個新政府急需研究的問題了。★

發生經過

一九一八年那次世界性的流行性感胃（下簡稱流感）取去了二千萬人的性命。直至今日為止，科學家們還是不大清楚那次「瘟疫」到底是毒菌首先侵襲人類然後再傳染給豬隻，還是後者首先被染後再傳給人。不管真相如何，一九一九年以後，豬型流行性感胃毒菌便一度在人類的世界裏失去踪影，却一直還在騷擾著豬隻。

去年二月十三日，美國疾病控制中心證實了從新澤西州狄斯堡軍事基地四名士兵身上抽驗出的流感毒菌為新的品種，它與豬型流胃有着極相似的地方。四名患病的士兵之一隨後逝世，死因是流感桿菌性肺炎。毒菌類型被證實後，疾病控制中心隨即於三月十四日舉行聯席會議，出席的包括有美國國防部，生物學局(The Bureau of Biologics)，國立敏感症和傳染病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等政府部門的代表。美國軍方亦隨即在狄斯堡進行調查，找出毒菌傳播的廣度。疾病控制中心和國立敏感症和傳染病研究院也在美國各地同時設立偵察系統，追蹤毒菌可能流傳的路線和範圍。二月二十日，生物學局再度召開會議，檢討當前情況。軍方在狄斯堡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該堡至少有五百名左右的士兵的血液內流傳着與豬型流感毒菌有關的抗原。在同一會議上，美國政府把從患病的士兵身上獲得的流感菌分別送交四間製造疫苗的藥劑公司，開始生產一種新的A／新澤西／七六藥苗。三月廿四日，美國總統福特在助理衛生部長，公共衛生服務和科學顧問的諮商下宣佈了「全國流感免疫計劃」，由政府供應新的A／新澤西／七六疫苗，使每一個美國人在今年春季流感高漲時期來臨之前均有機會接受注射此種免疫疫苗。四月十五日，福特還簽署了一項一億三千五百萬美元的新預算案作為防疫計劃之用。四月廿一日，第一劑豬型流感防疫藥苗在有關部門的贊助下開始臨床試驗。其後約兩個月間，大約有四千名成年人和一千二百位小童接受了疫苗注射，作為日後大量注射的先鋒試驗。

從以上種種跡象看來，去年在美國開始的豬型流感免疫運動可以說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花費人力、物力最大的一次地區性保健運動。並且是在最短的時間內決定一個關乎整個公民健康以至生命的防疫計劃。由二月十三日證實了為害狄斯堡是一種新的流感毒菌之後的一個半月內，美國總統便下令推出這個全國流感免疫計劃，美國人不可謂不關心自己的性命了。然而，計劃是否如此順利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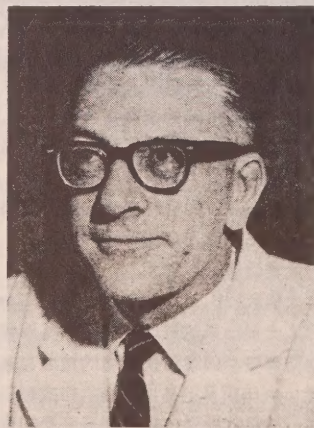
一波三折 困難重重

事實上，美國去年十月開始並且花費了一億三千五百萬美元的全國防流感運動的遭遇可以說是一波三折。加拿大政府一向唯美國馬首是瞻，在這方面亦有着相似的際遇。首先，四間製造流感藥苗的公司之一的柏加·戴維士公司錯誤地生產了大約三百萬劑不能使用的疫苗，原由至今不明。今年一月七日，加拿大政府也宣佈了大約二百萬劑由歐洲輸入的疫苗是暫時不能夠使用的。其它幾間製苗公司也興波助瀾，要求聯邦政府承

担病人在注射疫苗後所生任何損害的賠償責任，否則它們便停止製造疫苗。木利國營實驗所的總裁伊凡·克索夫斯基說，倘若在七月初，賠償金的問題還得不到解決，該公司在沒有保障的情況下是不會繼續生產大量的疫苗。美國保險業聯會主席積克(L. Cheek)在國會小組委員會上宣稱保險商人不僅無意，亦無法支付這種新而沒有限度的保險賠償。這種種責任問題使原初計劃於去年八月初便實施的防疫計劃一直拖延至去年十月才執行。那還是在美國國會通過了一個新法案，指定於去年九月三十日至今年八月一日期間，任何美國公民倘若由於接受豬型感冒注射後引起損害，聯邦政府均需依法賠償後的事。

部份科學家也反對這個防疫計劃。美國著名的病毒學家阿爾拔·沙賓(A. Sabin)於去年七月改變他原先支持防疫計劃的初衷。他說由於沒有明顯的跡象顯示豬型流行性傳染病的來臨，防疫注射計劃也就無需一定要執行。多倫多大學的二位研究人員，微生物學系的菲力·史超域(Philip Stewart)和疾病流行學的雷哈定利茲(W. Harding le Riche)教授也對這次防止豬型流感注射運動提出懷疑的眼光。雷哈定利茲認為主持計劃的人像玩撲克牌一樣，是靠運氣來決定防疫的功能，而對於豬型感冒會否在今春降臨是毫無把握的。去年五月史超域在接受訪問時說那時科學家還沒有弄清楚究竟狄斯堡事件的實際原因，因為同一時期，美國正在流行另一類型A型的流行性感胃。美國政府是在避免錯過及時製造疫苗的情況下作出倉猝的決定。這不一定是個明智的抉擇。

直至去年九月為止，美國的衛生部門還沒有決定兒童注射疫苗的具體計劃。這是由於食物與藥物管理局要等待九月底的診所試驗報告後才可以作出決定。試驗結果拖延得如此緩慢是由於美國政府在兒童注射時使用反應注射和加強注射的雙重步驟。



Dr. Harding le Riche

多倫多大學教授雷哈定利茲

防疫運動
口號

INFLUENZA
VACCINATION
NOW URGENT

疫苗份量

疫苗份量分二類實施注射。年齡較大的（六十五歲以上）與及患有心臟病的人接受由豬型和維多利亞A型兩種疫苗混合組成的二元疫苗注射。這是由於維多利亞A型流行性感冒較為普遍，並且在發生和傳染起來的時候，引起較高的死亡率。雖然年齡在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在一九一八年的時疫中安然無恙，年事日久却導致遺留在他們身體內的抗生體標度減低至喪失殺菌的能力。老年人因此被列為容易染上豬型流行性感冒的一類。倘若他們不幸染上這種流行症，死亡的機會是相當高的。米勒指出由於二元性疫苗的供應有限，容易染上豬型感冒的一類人士便有接受疫苗注射的優先權利。據統計數字顯示，直至去年七月為止，祇有一成人在接受注射後引起反應。除非接受注射的人對任何物體均會產生過度敏感症，否則，豬型流感疫苗是相當安全的。離心過程抽除那些足以引起敏感的蛋白質是被公認為藥苗製造的安全措施。

一般人民對防疫運動的反應

美國疾病控制中心服務科的主事人唐納·米勒宣稱是次防疫運動是美國史無前例的一次「羣象」運動。它的目標是設法於去年十月至年底期間使每一個美國人均可以接受疫苗注射。美國政府為了推行這次防疫運動，不惜花了众多的人力和物力來宣傳。電視、電影、廣告、傳單、小冊子等傳播媒介紛紛被使用，甚至在去年九月開始，將防疫計劃的傳單附加在寄發給退休人士的退休福利紙內，使甚少與外間接觸的老年人也知道運動的存在。儘管落力宣傳，效果並不一定是預期般的好。去年年末，普洛和疾病控制中心主持的兩個不同的調查統計均同時顯示百份之九十三的美國人是知道豬型流行性感冒這件事的，可是願意接受疫苗注射的祇佔百份之五十三；百份之二十六的人對這次運動存着懷疑的態度而百份之十三的美國人却拒絕接受注射豬型流感疫苗。

結語

這篇文章刊出的時候亦正是部份科學家預測豬型流感毒菌要大肆橫掃北美洲（為什麼從來沒有人去關心一下第三世界的人民？）的當兒。究竟閣下該否前往診所接受疫苗注射，連「專家」也莫衷一是，意見紛紜，筆者是半個門外漢，自然更不宜向閣下提供意見了。

我們究竟對這個防疫運動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今次眾說紛紜，一波三折的保健計劃，給人类的教訓又是甚麼呢？筆者認為整個計劃遭遇困阻重重正是反映了人類到今天為止，在關乎自己生命安存的問題上也還戰不過一些微細到連肉眼也看不見的毒菌，却在足以毀滅全人类的軍備上作着瘋狂的研究和競賽，誠非是人為的悲劇乎？★

經過這些一連串在決策和試驗期間的重重困難後，大幅度的注射終於在去年十月開始實行。可是幸運之神却不曾降臨。注射運動進行後不久，三位美國人曾經在匹茲堡相同的一間診所接受豬型感冒疫苗後相繼地死去，引至公眾開始懷疑防疫注射的安全性。十二月中整個注射計劃又遇上也許促使它流產的致命打擊。接到有關五十一名注射過疫苗的人在差不多同一時期內患上七種神秘的（Guillain-Barre 氏微候簇）癱瘓症而其中四名患者死去的資料後，美國聯邦政府隨即宣佈全國停止施行疫苗注射，直至進一步調查清楚後再作出新的安排。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衛生部門亦跟著作出同樣的防禦措施。直至截稿的時候為止，有關的科學部門還沒有肯定豬型流感疫苗是否促成引發固寧·巴里氏微候簇的因子。美國每年平均便有四千多宗這些病症，加上每十五萬名接受過疫苗注射的人中才有一名染上這種癱瘓症；因此，疾病控制中心的科學家認為這點「意外」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上述的事實已足以使那些一開始便對這個防疫計劃提出質疑的人更為鼓舞。美國參議院衛生小組委員會主席愛德華·甘迺迪宣稱：「從任何實際的行動上看來，豬型流感防疫運動正好因此而收場罷。」

人、豬型流感毒菌之爭論

養豬界人士對部份科學家認為人類是受着豬的流行性感冒毒菌威脅的看法不以為然。去年四月中旬美國農業部舉行了一個會議，討論人和豬的流感細菌間的關係。部份專家宣稱狄斯堡豬型流感細菌的抗原結構與近年在豬隻身上發現的十分相似，但二者的抗原結構均與一九一八年間發現的毒菌則大同小異。為數不少的毒菌專家認為在過去數拾年間，流行性感冒毒菌不斷地在人和豬之間往來侵襲。明顯的例子是一九六八年的香港型流感毒菌除了大肆橫行人間外，也侵入了豬的世界去。這些科學家的論據是由於經常與豬隻接觸的人士；如屠夫、養豬工人和獸醫等，體內的流行性感冒抗生體標度較其他人為高。加拿大安大略省葛符（Guelph）的安省獸醫聯會（Ontario Veterinary Association）却宣稱豬的流行性感冒毒菌對人類是沒有害的。美國全國畜牧業和肉類商人理事會更指示人的流感毒菌傳染給豬隻的肯定證據較豬的流感毒菌傳染給人的為多。他們甚至抗議將狄斯堡隔離出來新的毒菌品種稱為豬型流感毒菌，認為這是侮辱了豬的名聲！應該像以往的慣例，如香港型、歐洲型、亞洲型一樣，以首先發現毒菌的地方名來稱謂狄斯堡的新毒菌品種，那該是新澤西型流行性感冒毒菌。可是新澤西州執政當局却對此雅號敬謝不敏。

可是威士康辛大學教授B.C. 復活日（B.C. Easterday）的發現却給豬業界人士提出新的難題。復活日是美國首屈一指的獸醫學專家，他從實驗中觀察到狄斯堡的流感毒菌可以傳染到豬的身上。因此，去年四月七日世界衛生組織舉行了一個為期兩天的研討會議，討論狄斯堡流行性感冒突發的意義。專家們在會議完結後提供了五項建議。其中的一項便是與其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要將危害人類社會的豬型流感毒菌徹底地從豬的身上滅絕。給豬隻注射疫苗的想法根源於豬隻是毒菌的潛伏媒介，那麼這些毒菌總有一天會向人類進行侵襲。



讀者來函

編輯先生：

關於「四人幫」上台的經過，垮台的始末，與及他們在掌權期間所犯下的種種罪行，衆多的親中共刊物在過去三個月來已刊載了不少的文章。其中有比較教育性的，說理的（如「七十年代」月刊十一、十二月份齊辛君的兩篇長文）；有以聲討、攻擊為「首要任務」的（如新知識 月刊十二月份的「四人幫罪行錄」）。但是儘管方式不同，他們之間有一共同態度，即完全以當前中共中央發表過的觀點、論據為藍本，或則加以發揮，或則予以演繹。持深入探討態度，持懷疑態度的，則迄今仍未讀到。

這樣的現象反映了什麼呢？於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是好的，還是壞的呢？

在未分析以上的問題之前，我想說明一下這種現象出現的條件。

七十年代開始的「認同祖國、認識祖國」運動的蓬勃發展，無可懷疑，提高了國外僑胞對祖國的認同感情。中國從過去的「一窮二白」發展到今天的相對的富強，從以往國民黨統治時代的仰外人鼻息走到今日的「自力更生」，使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大大提高，國外僑胞以祖國為驕傲，以身為「黃面孔的中國人」為榮。台灣來的僑胞，過去受盡了國民黨的反共八股宣傳；香港來的，聽慣了殖民地政府的愚民言論，鼓吹什麼「香港人」的調調——這一切都隨著對祖國的認同而逐漸地被認清了本來面目。我們可以肯定說，對代表八億人民的祖國的認同，是一股歷史發展中必然出現的進步潮流！

然而正是由於這股潮流太大了；運動的隊伍大了，自然就湧現了各種不同傾向的「認同派」。當前批判「四人幫」出現的現象，便是各種「認同」傾向中的一種。

如文章開頭指出，從此次批判「四人幫」的各種刊物中，我們看到了一種盲目「追隨中共中央決議」的傾向。

然則不盲目追隨中央決議是不是便是懷疑主義？是不是便是不愛祖國？甚至說，是不是便是反共？

我認為不是的。相反，鸚鵡學舌才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

的唯心主義的態度。例如「新知識」十二月份的「四人幫罪行錄」便犯了這樣的毛病。以下是「四人幫」罪行錄裏其中一段抄家式的聲討：「文痞姚文元，是叛徒姚蓬子的「飄零子弟」，這個傢伙承繼了他父親舞文弄墨、搗鬼放毒的衣鉢，對黨，對人民，對革命懷有刻骨的階級仇恨」（見「新知識」月刊十二月份第五十六頁）；「野心家、陰謀家張春橋，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老右派，在三十年代，當他初露頭角的時候，就是一個圍攻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魯迅的小丑。此人還寫過黑文、黑詩，大肆吹捧人民公敵蔣介石」（見「新知識」同期同頁）；「大野心家江青，同樣有著一段為國民黨反動派和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效勞的臭史，（「新知識」同期同頁）；「政治流氓王洪文，按捺不住他那狂妄的野心，儼然以一個「國家元首」的架勢出現，恬不知恥地把他在上海「發迹」的地方，作為「革命聖地」，要人們去「瞻仰」，甚至聽着別人用英語喊他「萬歲」。」。「新知識」以如此的態度批判「四人幫」，實際上只會使人困惑，只會使人搖頭，不明所以。怎麼扯上姚蓬子的「舞文弄墨、搗鬼放毒」呢？這不是明明白白的「唯成份論」嗎？「唯成份論」早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澤東批為「反革命」的了！再者，如果要翻張春橋「寫過黑文、黑詩，大肆吹捧人民公敵蔣介石」的舊賬，那起碼也應該同時結合抗日戰爭時期中共的「抗日統一戰線」的路線來談，指出張春橋如何「投降」則才會有政治上的教育意義；否則人們可以引證毛澤東本人在「論新階段」一書裏寫過的「全力擁護以蔣委員長為首的國民黨」，來證明毛氏本人才是更大的投降派。脫離時代背景中的獨特政治路線來指責「投降派」是沒有政治上的教育意義的！最後，假若姚文元、張春橋、江青等「對黨、對人民、對革命懷有刻骨的仇恨」，是「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老右派，有著一段為國民黨反動派和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效勞的臭史」；那麼，他們為何能夠在中國政壇上、在黨內「到處煽風點火，製造混亂，挑動武鬥，分裂革命隊伍」數十年之久？王洪文這個「政治流氓」又如何能夠瞞過這許多中共領導人，爬上了中共黨第二副主席的崇高地位？「新知識」對這些問題完全沒有提出回答！

「七十年代」齊辛君的兩篇長文（十一、十二月份）在態度上遠為說理。例如齊辛君在分析「四人幫」上台的經過一節裏，刻劃了他們上台時的局勢，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說明了「四人幫」「懷著不同的動機」參加了文化大革命（「七十年代」十二月份第五頁），這樣的態度是比較有教育意義的。但是在一些問題上，我認為齊辛君仍是不夠深入。譬如在說明「四人幫」利用他們在黨內的地位「控制輿論工具，不斷扣帽子」等罪行之時，他並沒有指出是什麼的社會條件使他們的罪行成為可能，沒有指出是什麼制度上的漏洞給予他們這種條件、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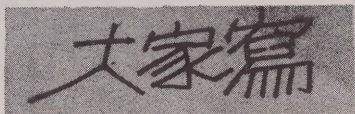
我們知道，中國在過去十多年間出現過多次黨內鬥爭。而自劉少奇、鄧小平到陳伯達，陳伯達到林彪、黃永勝，以至鄧小平從復出至垮台等鬥爭事件中，每次都嚴重地涉及中共黨內最高層的變化。這些「走資派」「復辟派」都是位極人權的最高層人士，都在掌權期間擁有無上權力。其中劉少奇、林彪更曾一度被毛澤東指定為繼承人。然而事實上他們的一切罪行之所以成為可能，他們之擁有令「中國變色」的條件，却正是由

於他們在中共黨內的崇高地位，正是由於他們擁有特權之故！今次「四人幫」企圖「篡黨奪權」，情形也是一樣。難道這一切都是偶然的嗎？難道一句「潛伏黨內」，「趁機竄上台」便可以解釋過去嗎？

我以為，熱愛祖國，擁護祖國的社會制度是一回事；持什麼的態度觀察以至評論國內發生的大事是另一回事！我們儘可以無條件擁護祖國的革命成果，保衛財產國有制度，反擊一切資產階級的別有用心之反共宣傳（事實上也應該這樣），但絕不等於是盲目「追隨中共的一切決議」，絕不等於做應聲蟲！假若我們只懂得背誦中央決議，毫無懷疑精神；那在劉少奇操縱中央的時期，我們便只能盲目支持他那後來被批為修正主義的路線；數個月前便只能拾被「四人幫」把持的宣傳機關的餘沫！試想想，這是多麼危險的一回事啊！

「四人幫」的被打下來，絕對不表示「走資派還在走」，「新生資產階級就在黨內」，「資本主義復辟」等問題已獲得解決。我們應該一方面懷著對祖國的社會制度的愛護，一方面帶有批判性的眼光注視國內一切大事，特別是政治上的發展；只有這樣，才是真正關懷祖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正確態度！祝編安

溫哥華讀者 國上



編輯先生：

讀了「海外述林」創刊號之後，我覺得十分滿意。「海外述林」可算是加拿大一份很好的雜誌。希望你們以後還繼續辦好它。

我對惠可君的「中國政治鬥爭的實質」一篇文章不敢苟同。評價一個歷史人物的時候，最好是從他的言行上着手。現附上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發表的「關於民主集中制問題的講話」，希望貴刊能予以轉載，在另一個角度上大家也許對問題有新的不同看法。

祝

編安

華盛頓一讀者上

關於民主集中制問題的講話

看起來，我們有些同志，對於馬克思、列寧的民主集中制，還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經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什麼式的，總之已經作了幾十年共產黨員，但他們還不懂得這個問題。他們怕羣衆，怕羣衆講話，怕羣衆批評。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怕羣衆的道理呢？有了錯誤，自己不講，又怕羣衆講。愈怕就愈有鬼。我看不應當怕，有什麼可怕的呢？我們的態度是：堅持真理，隨時準備修正錯誤。我們工作中的是和非的

問題，正確與錯誤的問題，這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咒罵；也不能用拳頭，更不能用刀槍，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讓羣衆講話的方法。

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要羣衆講話，那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這項工作了，降到下級機關去工作，或調到別的地方去工作，那有什麼不可以的呢？一個人為什麼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麼只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的地方去呢？我認為這種下降與調動，無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

現在有些同志很怕羣衆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不同的意見。討論問題就壓抑羣衆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惡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們黨章的，上了我們憲法的，他們就是不實行。同志們，我們是幹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錯誤」，這種錯誤是不利於黨的事業，不利於人民利益的，就應當徵求人民羣衆和同志們的意見，並且自己作檢討。這種檢討，有的時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滿意，再來第二次，還是不滿意，再來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沒有意見了，才不再作檢討……不管是主動的，被動的，早作檢討，自己作檢討，只有正視錯誤，肯承認錯誤，肯改正錯誤，肯聽羣衆批評，只要採取了這種態度，都應當歡迎。

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一種方法，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方法。但是如果沒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沒有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種方法。

我們現在不是有許多困難嗎？不依靠羣衆，不發動羣衆幹部的積極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難。但是如果向幹部和羣衆說明情況，不向羣衆和幹部交心，不讓他們說出自己的意見，他們還會對你感到害怕，不敢講話，就不可能發動他們的積極性。我在一九五七年這樣說過：要造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黨內黨外都應有這樣的政治局面。沒有這種政治局面，羣衆的積極性是不能發動起來的。克服困難，沒有民主不行。當然沒有集中又不行，但是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

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大家意見分歧，沒有統一的認識，集中制就建立不起來，什麼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確的意見。在集中正確意見的基礎上，做到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叫做集中統一。如果大家對問題還不了解，有意見沒有發表，有氣沒有出，你這個集中統一怎麼建立得起來呢？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羣衆中來，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線、政策、方針和方法，這一方面來說，只是一個加工廠，大家知道，工廠沒有原料，就不能進行加工。沒有數量上充分和質量上適當的原料，就不可能製造出好的成品來。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收集各方面的意見，不能上下通氣，只由上級領導機關，憑着片面的或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就不可能達到統一的認識，統一的行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集中。我們這次會議上的主要議題，不是要反分散主義，加強統一嗎？如果離

開充分發揚民主，這種集中，這種統一是真的還是假的？是實的，還是虛的？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當然只能是假的，虛的，錯誤的。

我們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無產階級的集中，是廣泛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各級黨委是執行集中領導的機關。但是，黨委的領導是集體的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在黨委會內部，只應當實行民主集中制。……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中討論，認真地聽取不同意見，不斷地對於複雜的情況和不同的意見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幾種可能，估計情況的幾面。好的，積極的，順利的，困難的，可能遇到的和不可能碰到的，盡可能地慎重些，周到一些。……從前有個項羽叫西楚霸王，他就不愛聽別人的意見，他那里有個范增，給他出過主意，可是項羽不聽范增的話。另外一個人叫劉邦，就是漢高祖，他比較能夠採納不同的意見。有個知識分子叫酈食其，去見劉邦，初一見，說是讀書人，孔夫子這一派的，回答說：「現在軍事時期不見儒生。」這個酈食其就發火了、他向管門房的說：「你給我滾進去報告是高陽酒徒，不是儒生。」管門房的進去照樣報告一遍。好，請。請了進去。劉邦正在洗腳，趕忙起來勸酒。酈食其因為劉邦不見儒生事，心中還有火，批評了劉邦一頓。他說：「你究竟要不要爭取天下，你為什麼輕視長者？」這時候，酈食其已經六十多歲了，劉邦比他年輕所以他自稱長者，此事見「史記」酈食其和朱紹佚。劉邦是封建時代歷史學家稱之為「豁達大度，從容強項」的英雄人物。劉邦同項羽打了幾年仗結果劉邦勝利了，項羽失敗了，不是偶然的。

我們有些同志聽不得相反意見，批評不得，這是很不對的……有了錯誤，一定要攬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我們的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直到區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既然做了第一書記，對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就要担起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採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的，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真的摸不得嗎？偏要摸。

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集中制。沒有高度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麼狀況呢？就會變成南斯拉夫那樣的國家，變成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是反動的法西斯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

沒有民主集中制，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能鞏固。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對人民的敵人實行專政。這兩個方面是分不開的，把這兩個方面綜合起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或叫人民民主專政。我們的口號是無產階級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怎麼實行領導呢？經過共產黨來領導。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無產階級團結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階級和階層。對反動階級或者說對反動階級殘餘，實行專政。在我們國內，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現在反動階級已沒有那麼厲害了，已沒有一九五七年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時那麼厲害，比如說，已經沒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國建立的時候那麼厲害，所以我們說是反動階級殘餘。但是對於這個殘餘，千萬不可輕視，必須繼續同他們作鬥爭。已被推翻的階級企圖復辟，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

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整個社會主義社會階段，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激烈的。我們的專政工具不能削弱，反應當加強。……對於反動階級實行專政，這並不是說，把一切反動分子統統消滅掉，而是改造他們，用適當的方法改造他們，使他們成為新人。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鞏固，政權就不穩。沒有民主，沒有把羣衆發動起來，沒有羣衆的監督，就不可能對反動分子實行有效的專政。也不可能對他們實行有效的改造，他們就會繼續搗亂，還有復辟的可能。這個問題應當警惕，也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

要發揚民主，要啓發人家批評，要聽人家的批評，自己要經得起批評，應當採取行動，首先作自我批評，有什麼就檢討什麼，一個鐘頭，頂多兩個鐘頭。傾箱倒篋而出，無非那麼多。如果人家認為不夠，請他提出來，如果認為對，我就接受。讓人家講話，是採取主動好，還是被動好？當然是主動的好。已經處在被動地位怎麼辦？過去不民主，現在陷於被動。那也不要緊，就請大家批評吧。白天出去，晚上不看戲，白天晚上都請你們批評。這時候，我坐下來，冷靜地想一想，兩三天晚上睡不着覺，想好想通了，然後做篇檢討，這不就好了嗎？總之，讓人家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台。不讓人家講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台。……

毛澤東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偉倫公司

JAMES IMPORTS

124-130 DUNDAS STREET WEST, TORONTO, M5G 1C3
TEL. (416) 368-1562

常備
無核嘉應子
旅行話梅
陳皮梅
舊露羌
椰汁羌
舊檸檬
杏脯
應有盡有

批發零沽

無任歡迎

手工藝品
象牙雕刻
江西花瓶
漆器磁碟
柚木傢俬
屏風掛畫
順繡銀畫
大小宮燈
金銀首飾
翠玉寶石
絲綢衣服
抽紗檯布
文房玩具
各類玩具
聖誕禮品
款式齊備

專營

總代理

香港北辰
原真貨味美
每週運到
保證新鮮

資源、人口、制度

由諾貝爾獎金得獎人利昂蒂夫領導的一個聯合國研究小組，化了三年的功夫，搜集了巨大的資料，最近找到了如下的結論：世界的資源，是足夠應付人口增長的需求的，而且還可以在不傷害自然環境的情況下，支持人類達到更高的生活水平。

這結論推翻了十八世紀末期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人口論認為人類社會人口是以幾何級數增長（如一、二、四、八、十六……），而生活資料却是以算術級數增長（如一、二、三、四、五……），所以，除非人們實施「道德抑制」——即無力養育子女的人不要結婚——人口的增長必會導致生活的惡化，而生活的惡化將再約束人口的增長。馬爾薩斯的理論沒有針對社會制度作出分析，忽視了社會和人為的因素。一九七二年一家私人研究社「羅馬會」（Club of Rome）出版了「經濟增長的極限」一書，同樣地把重點放在物質條件上，向人類打出了經濟增長已接近極限的警報，也是忽視了社會人為的因素。

聯合國的報告書題名「世界經濟遠景」（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它指出了政治和制度的因素才是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對第三世界來說，報告書支持了它們對「新經濟體系」（New Economic Order）的要求。它聲稱：「加速經濟發展需要兩個先決條件：一是發展中國家內部的對社會、政治和制度的巨大變化；一是世界經濟體系的重大轉變。」

「消除國家之間貧富的懸殊全賴這兩項條件以促進發展。很明顯的，兩項條件中，缺一不可。它們要同時實現，才可以產生預期的效果」。

報告書並不否定物質條件的局限性，只是指出，在二十世紀內物質條件的局限性，遠較政治制度人為條件的局限性為低。譬如迫切的糧食問題，可以藉開闢新的耕地和提高產量的辦法去解決。這些都是技術和物質條件容許的。不過，往往因為制度上的限制，未能實施。

加速經濟發展需要大量的節約和投資。這並不容易辦得到。國家得重新制定稅收和借貸辦法，在社會投資方面佔一個新的角色。國民收入方面須要漸趨平均。這都要求巨大的社會改革。

國際間的關係也需要重大改變。礦藏貧乏的國家需要相當的國際支持以補本國之不足。發展中國家需要大量的外匯用作投資，就要促進本國的製造工業和減少工業製成品的輸入，顯示輕工業將更形重要和外國對此等製品不採取入口管制。此外，國際間資金的流動也要重新調整。

大致來說，聯合國這報告書可算把握住了目前國際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重點，提醒了我們對人為因素的重視，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信心。



一九七五年十月底，加拿大統計局發表有關數字，指出是年加人平均入息較諸一九七四年時增高了百份之十。可是這個好消息却為通貨膨脹所掩蓋，加人的荷包並沒因此而腫厚了。

從圖表一的比較數字我們不難發現過去的五年間，各行業的薪酬平均增高了百份之五十左右。在一片通貨膨脹的聲浪中，一般人祇是注意幣值和百份率的數字，而忽略了真正影響生活程度的却是在購買物品的時候，個人需要工作多久才能付得起該價錢這一事實。舉個簡單的例子，在一九七一年最低薪酬的人只需做三十一分鐘的工作便買到一瓶三夸脫的牛奶，而在一九七六年却要工作多一分鐘才能買到同樣的東西。

過去五年間，薪酬增長率最高的要算中、下級的公務員。安省省警察由每小時的四元八毛半加至八元五毛的薪酬；即增加了百份之七十五。一般的手作公務員亦加了百份之七十一人工。但是，請不要被這些數字遊戲欺騙了。高級行政人員的薪酬誠然祇是加了百份之三十六，而最低薪酬的却加了百份之六十一。其實，高級行政人員的時薪却比最低入息者高於八倍有多。所謂「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便是這個道理了。

表面看來，物價也沒有高漲到那裏，因為在一九七一年，購買一架四門的房車要工作四十八個星期另三十小時，而在一九七六年却祇需三十九個星期另三十小時便可以買一部車了。即是說，少做九小時的工作。以時薪計，一九七一年車價是三千二百元左右，而在一九七六年則要四千二百元，實即漲了一千元的價錢。而日常食品如牛奶却由每瓶八毛半加至一元四角，漲了百份之六十呢。因此，去年增加薪酬的最大得益者，恐怕是中、上的收入者；入息低微的祇有吃苦自家知了。

六年來加拿大安省的薪金和物

價增加比較表

	最低薪金收入者		手作工人（政府職位）	
	1971	1976	1971	1976
年 薪	\$3,432	\$5,512	\$3,611	\$10,248
時 薪	\$1.65	\$2.65	\$2.89	\$4.93
需要工作多久才可以買三夸脫牛奶一瓶	31分鐘	32分鐘	17分鐘	17分鐘
啤酒一盒（24瓶庄）	2小時 52分鐘	2小時 24分鐘	1小時 38分鐘	1小時 17分鐘
十三呎無霜雪櫃一個	181小時 49分鐘	150小時 56分鐘	103小時 48分鐘	81小時 8分鐘
每月供屋金	130小時 18分鐘	193小時 35分鐘	74小時 23分鐘	104小時 4分鐘
四門房車一架	48星期 30小時	39星期 30小時	27星期 33小時	21星期 15小時

嘉年地產公司



專門代理住宅商業樓宇
買賣、地產按揭、發展、投資
有關改建及新發展



TONY CHAN

陳慶之



FRANK CHAU

周厚明



嘉年地產實業公司
Goldyear Realty Inc.
MEMBER OF TORONTO REAL ESTATE BOARD

Head Office: **LuCliff Place 700 Bay Street, 23rd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G 1Z6

電話: 595-0377

秘書 (政府職位)		超級市場 收銀員		鋼鐵工人		安省警察 督察		中學教員		大學教授		安省政府 副部長		高級行政 人員	
1971	1976	1971	1976	1971	1976	1971	1976	1971	1976	1971	1976	1971	1976	1971	1976
\$6,366	\$ 9,894	\$7,134	\$10,186	\$8,444	\$14,252	\$10,044	\$17,625	\$12,041	\$17,416	\$18,600	\$27,000	\$39,700	\$48,000	\$45,100	\$61,158
\$3.06	\$ 4.76	\$3.43	\$5.02	\$4.06	\$6.85	\$4.83	\$8.47	\$5.79	\$8.37	\$8.94	\$12.98	\$15.27	\$18.46	\$17.35	\$23.52
16分鐘	18分鐘	15分鐘	17分鐘	13分鐘	13分鐘	11分鐘	10分鐘	9分鐘	10分鐘	5分鐘	7分鐘	4分鐘	4分鐘	3分鐘	4分鐘
1小時 33分鐘	1小時 20分鐘	1小時 23分鐘	1小時 16分鐘	1小時 10分鐘	56分鐘	59分鐘	45分鐘	49分鐘	46分鐘	32分鐘	29分鐘	19分鐘	20分鐘	16分鐘	16分鐘
98小時 2分鐘	84小時 2分鐘	87小時 28分鐘	79小時 38分鐘	73小時 33分鐘	58小時 23分鐘	62小時 7分鐘	47小時 13分鐘	51小時 49分鐘	47小時 47分鐘	33小時 34分鐘	30小時 49分鐘	19小時 38分鐘	21小時 40分鐘	17小時 17分鐘	17小時
70小時 26分鐘	107小時 46分鐘	62小時 41分鐘	102小時 8分鐘	52小時 58分鐘	74小時 53分鐘	44小時 31分鐘	60小時 34分鐘	37小時 8分鐘	61小時 17分鐘	24小時 3分鐘	39小時 31分鐘	14小時 4分鐘	27小時 47分鐘	12小時 23分鐘	21小時 49分鐘
26星期 10小時	22星期 5小時	23期星 18小時	21星期	19星期 32小時	15星期 15小時	16星期 24小時	12星期 17小時	13星期 36小時	12星期 24小時	9星期	8星期 5小時	4星期 10小時	4星期 28小時	3星期 35小時	3星期 29小時

續上表



「四人幫」座談會紀錄

主席：李懷敏

主 催：海外述林編輯委員會

地 點：思雅書舍

時 間：一九七七年一月五日晚上八時

出席者：李懷國、方資求、岑建勳、李鏡明、
梅美田、何澤生、何偉能、陳錦祥、
李月好。

整 理：陳錦祥

主席：「四人幫」的歷史，是在那一個時候變質的，
還是一直潛伏在黨內的「走資派」？

生：地球郵報引述華國鋒的話，認為「四人幫」一直以來潛伏在黨內，在四九年以前已是反革命，是一貫的。事實上「四人幫」已不是三、四年間的事，如在文革時已壓制了很多現在批准發行的電影。

陳：我覺得我們不必執着於中國宣傳機構的說話，他們總是喜歡批判一個人時，就說他是歷史上一貫反動，其實這是唯心的。一個人的行為當然與以往歷史有關，但把他們說成是潛伏的反動派則是一個笑話，這種攻擊是沒證據的。「四人幫」是由於文化大革命後這個客觀形勢下，一些權利慾使他們成為「反動」的。

岑：我們還是回到「四人幫」在文革的歷史，才可以分析他們推行過什麼路線？有什麼錯誤，令到他們走向「反動」。

陳：文化大革命從毛澤東組織姚文元寫文章，批評北京市委，由於在北京受到抵制，於是在上海，由張春橋所主持的文匯報登載。接着爆發了文化大革命，在上海的工人分裂成兩派，一派是王洪文領導的工總司，另一派是赤衛隊；跟着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後，造反派奪了權，成了新市委。張春橋是第一書記，姚文元是第二書記，而王洪文是其中的一個書記。王洪文後來升了黨的副主席。但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最後垮台的就是這「四人幫」。其他的都早垮了台了，如戚本禹、關鋒、王力、陳伯達等。

梅：可否談一下文革中的派系，他們之間有什麼矛盾和關係。

陳：在中央可以分為三個派系，一個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文革派，一個是國務院的派系，另一個是林彪的四野軍人實力。

岑：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搶先的第一個文革小組是彭真，提出了「二月提綱」，但後來被打倒。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十六條，派出一個新的文革小組，組長是陳伯達，副組長是江青，組員關鋒、王力、姚文元等。「一月奪權」是分野，在之前的反工作組是造反派，不反的是老保（保守派）。「一月風暴」後則以奪不奪當權派的權作為造反派的標誌。最先奪權的是上海，然後各地都發生了。這個奪權主要是奪劉少奇的系統，在奪權中，解放軍是靠邊站。直至二月譚震林的反撲「二月逆流」，中央文革小組是抗拒這一反撲的。羣衆運動是一方面，而究竟誰是造反派，則是由中央文革小組和周恩來等黨中央決定的。「二月逆流」封閉很多紅衛兵、造反派組織，這又是兩個不同派系鬥爭的表現。中央文革小組相當程度代表了毛澤東的意見。「二月逆流」後造反派又漸漸回升，直至「武漢兵變」事件是另一個鬥爭的高峯，是實力軍人向中央文革的又一個反撲，當時陳再道逮捕了謝富治、王力。江青等「四人幫」唯一的本錢就是文革小組，他們的擢升就是在文革。而從文革中他們所受到的抵拒，可以理解到後來他們的失敗。「武漢兵變」後中央文革提出要撤出軍中一小撮走資派，立刻受到反擊，導至王、關、戚的倒台。劉少奇一系有實力軍人的支持，這在九大中軍人佔的比例很大可以看出來。可以這樣說：劉少奇、彭真一系倒下，但他們的支持者，軍人則有足夠的實力可以回擊，在中國，政軍合一是一是紅軍的傳統。

生：可否談一下現在的當權派如華國鋒、紀登奎等在文革時扮演的角色？

岑：他們本來一些不很高級的幹部，是支持文革的，但在極左的組織中也認為他們是新的當權派，他們在革委會中是有職位的。

國：剛才有人提出的所謂文革派，國務院派，四野軍人派別只是在中央的，却忽略了提出地方省委組織和十大軍區的負責人，但反撲的主要角色不在中央，而在地方的省委、軍區的當權派。現在中央政治局的人物，在當時大多是省委書記，如華國清、紀登奎、華國鋒等。

岑：現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包括「四人幫」在內，已經全

部倒台了，其實這兩系的鬥爭，在文革中是一直不斷的，一直鬥到現在「四人幫」倒台。在「楊成武事件」後，軍人直接介入，所以在九大中軍人佔的比例那樣大。「九·五」指示後，各個派系到中央開會，決定誰是造反派，誰是保守派，周恩來在這個時候擔當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但這鬥爭並沒有完結，只是軍人開入穩定了局面。

生：照你的看法，至毛澤東死之前，文革派是否一直在倒台？

岑：是的，文革所代表的那一種政治傾向是在一直的被削弱，雖然他們推出各種的運動，如反潮流，批評「三項指示」為綱，都是文革的延續。所以說：「四人幫」的倒台是由於攪陰謀，我是不同意的，除非有充足的證據，我倒認為是兩種不同政治派別的鬥爭，而一派打倒了另外一派，不是由於個人的野心。至於說是政變也是不可能的，因為以「四人幫」的軍力，是不足以實行政變的，他們所謂的實力——民兵的武器是授於軍隊的，另一個傳說毛遠新在遼寧調裝甲兵團，也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只是政委，不是司令員，而且遼寧軍區是不可以調軍至北京軍區的，一定要中央知道，但中央軍委的指揮是葉劍英，所以是不可能的。離開槍桿子是不可能攪政變的。

主席：如果我們肯定文革在中國的社會是需要的，「四人幫」在文革是擔當過一個積極的角色，那末，是在文革後那一個時候開始走向一個「反動」的角色的呢？

岑：要說他們是否走歪路，還要有更多的前提才可以下結論的。我們只可以說，他們走跟現在當權派不同的道路，而這個最明顯的分歧是在王、關、戚要撤軍內一小撮開始，現在攻擊他們在「九·五」指令後，還要「文攻武衛」是搗亂，這要看你在什麼立場看奪權，要達到拉下劉少奇派的，這是手段，後來放棄了，那些舊當權派現在則一個個的再冒出來，事實上文革那時的要求是沒達到的，否則文革以後的運動是沒意義的了。而且他們在六九年才入政治局，而「文攻武衛」是在六七年的九月提出，王洪文是在一九七三年才擢升的，所以說這些是罪行，則他們是在犯了這些罪行以後，才獲得升職的。

主席：可否談一下「四人幫」跟劉鄧派間路線的分歧和矛盾？

國：我認為兩個派系之間的分歧在乎對中國社會發展的看法。劉鄧派是「唯生產力」論，而我覺得文革派是要又紅又專，他們沒有反對科技、經濟發展，只是在突出政治。這個分歧是從四九年以來，一直就存在的，不是單只這次「四人幫」事件才有的。

岑：另外還有其他的分歧，如認為「四人幫」扼殺文藝路線，現在則要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以後還會有其他政策上的改變，都是同「四人幫」當政時不同的。文革派的路線跟劉鄧路線的分歧主要從大躍進開始，毛害怕太重視專家、唯生產力會走上修正主義，文革派路線要把政治放在第一位。

國：「四人幫」倒台後，新當政者是不是一定就是鄧小平路線，否則就一定是「四人幫」路線，難道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陳：我認為看問題不單是看華國鋒担上了主席職位一件事，就可以決定一條路線，決定一條路線是取決於當政的大多數人的意向。任何人在任何職位都是受到其他人所制肘和影響的。我們可以看一下現在的領導班子，中央人物跟文革前分別不大，除了老、死的之外，另一部份是從地方省委等升上來的，如吳德、紀登奎、華國鋒等，所以華國鋒可以改變劉鄧路線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岑：另一點可以指出的是：當時支持鄧小平路線的中央人物，現在都支持華國鋒，為什麼他們支持華國鋒，一定是華國鋒符合他們的政治傾向，才會支持的，否則他們為什麼不支持江青一派，而華在這派幹部的壓力之下，也一定要走鄧小平的路線的。如文革前的文藝路線物質刺激都會在另一種不同的形式下再表現出來。

國：我不同意這一個看法。因為如你們上述，認為毛澤東、江青是同一路線的話，為什麼毛會選擇華國鋒——一個反對他的路線的人做代總理和第一副主席，我覺得中國四九年以來的政治人物，一向都不是一個一面倒的人，而往往是一個走中間路線的人，所以我不認為華是一個一面倒的右派或左派，而且現在中委會已經出現了矛盾的現象，這表示了華跟鄧路線是着有明顯的不同的。

岑：毛澤東跟江青一派在路線上是相同的，但在策畧上有明顯的不同。如江青在「九·五」提出文攻武衛，但毛澤東在「九·五」指示中就提出要交出武器。毛澤東為什麼要選華國鋒，因為如他選江青一派，在中委會內鄧派是大多數，當然是不願意的，而毛澤東是不同意鄧小平的路線的，所以最適當，沒那樣明顯的人自然是華國鋒，但我們要注意：現在中委會內支持鄧的路線是絕大多數的。

國：我認為沒有看到華的真正政策，是不可以作出判斷華究竟是走什麼的路線的。我以為中間派就是毛派，要又紅又專，劉鄧派的「唯生產力」，中間派一定要批判的；江青一派突出政治，階級鬥爭而忽略了經濟，我所認為的中間派也要批評的。我不同意支持劉鄧的路線現在仍是大多數，舊的當權派是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衝擊的，文革派在文革前是沒有力量的，但現在却有了羣衆基礎，以至到在天安門事件中，政治局要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的黨內外職務，此外也可以看到政治局並不是大多數支持鄧小平的，否則為什麼會通過這個決定？

岑：支持鄧小平的路線未必就等於支持鄧小平在天安門事件中所担任的角色。天安門事件是很嚴重的「反革命」事件，沒有人敢在這件事上包庇他。舉一個例文革時要打倒劉少奇，後來通過了，但他的路線却一直被文革派認為是還在走。支持一條路線不等於支持他的每一個方式。

主席：在「四人幫」事件後，我們應該吸收一些什麼樣的教訓？

生：我覺得中國無論走那一條路線，一定是要走羣衆的路線。當中國的當政者脫離羣衆，羣衆是有能力去加以批評，而

藉着批評，當政者是可以依此改變，去符合多數人的要求。

陳：我很同意這個意見。在「四人幫」被捕後公佈了很多「四人幫」所做的壞事和腐化的生活。問題的要點在，他們為什麼可以做一些這樣反革命的事呢？我們也不同意他們僵化的文藝政策，教育、經濟政策，甚至私生活的腐化，問題在他們為什麼可以這樣做，主要是缺乏了人民的監督，缺乏了黨內的監督，這是很嚴重的問題，他們之所以有特權，可以脫離人民的監督，說明了中國的制度是存在着問題的，這個會嚴重的拖中國現代化的後腿，我們在「四人幫」的事件中是要正視這個問題。

岑：在「四人幫」事件中，我們看到「四人幫」犯了很多的錯誤，他們是不得人心的。但我們要注意一個問題，很多運動如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都是「四人幫」等發起的，我們不能因為這是「四人幫」提出的，就不再繼續這些運動。這次「四人幫」之所以犯這樣多的錯誤，就是缺乏人民的監督。李一哲大字報有幾句話說得很好：他說王洪文提出五不怕，但問題是我們根本就沒有地方去表達自己的想法，所以真正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絕對不是在上層打倒這一個壞頭頭，那一個壞頭頭，主要是要接受人民的監督，人民不敢表達自己的想法，走資派就永遠在走，如江青可以用專機拿自己的相機。我絕不同意中共的宣傳「四人幫」是竄上去的，人民的監督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最好方法。

何：我覺得如中國能多一些反潮流的人物，多揭露當政者的黑暗面，中國就無需那樣多長期的鬥爭。

陳：我不認為要求更多的人反潮流是主要的，如李春光的事件，如不是打倒「四人幫」，他恐怕還是在坐牢、勞改、甚至永遠都沒有人知道這件事。主要是「四人幫」為什麼能有這個權力，人民能否去監督這個權力。這個牽涉到法治這一個問題，如杜魯多就不能夠隨便逮捕反對他的人，中國很缺乏法治。民主和法治好像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名詞，我不否認，但我不認為這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不應有的東西。社會從資本主義發展到社會主義是一個進步，它應當打倒資本主義社會剝削、腐朽的一面，但也應該繼承它好的一面，如在這次「四人幫」的事件中，揭露江青可以因小事拘禁她的軍醫。假如這是屬實的話，中國國家機構竟不能去保障這些民權，去制裁江青，說明了廿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國，在這方面是相當落後的。

國：文革反對的就是那些資產階級法權，那種腐朽的生活，這不單是「四人幫」的行為，是整個官僚層在社會上的反映，現在就是要通過羣衆運動把人民的這種意識形態來提高。我絕不同意中國沒有民主、審核。如大鳴大放、文革就是最好的說明。只不過不是資產階級那種形式的自由和民主。

岑：中國當然不會有資本主義式的民主。但是現在的中國是否就有着社會主義社會中所應有的民主和法制呢？我認為不是的。例如王洪文是怎樣擢升的呢？沒有人知道。這說明除了黨要打倒某一個人，人民是無權撤換一個幹部的。在

紙傳播的人數和範圍可以大得多，但無可避免一定控制在一部份人的手裏。憲法上是規定了有言論自由，集會的自由，但為什麼我們總是覺得中國沒民主呢？問題出在那裏呢？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陳：我想指出大字報是一個自由表達的方式的問題。但問題是大字報提出後，是否有一個制度去保障它。如李一哲、李春光提出的大字報後果又如何呢？這些不能算做自由。自由一定要有一種制度保障提出它的人不受到損害，這才是自由。離開這個保障之外的所謂自由、反潮流只是空想。正如一羣老鼠說要繫一個鈴在貓的頸上的故事一樣。一個人提出反對的意見就會被拉去勞改，怎可以想像有別人再反潮流，這只是虛假的自由，就是贊成當政者的政策才被接受，反對者就不被容許。

國：有人提出中國沒有民主，我想問他們是：中國的民主應當是怎樣的？而且這種民主跟西方的民主有什麼的分別？中國又有沒有條件攬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呢？而且剛才你們提出的不民主都只是政治上的，但在經濟上，中國的生產建設、五年計劃，都是一方面由中央的策劃，另一方面也是由各工廠、各公社所訂立的，這就是生產上的民主，難道民主就只是到投票站投票嗎？

陳：世界上沒一處地方是完全沒有民主的，但問題是：中國現有的民主，是不是就是足夠，我們就應該滿足的呢？我們應否提出鞭鞭，要求更多的民主呢？我們需要向前走，我們就需要向歷史看，曾有過什麼樣的民主要去繼承；就應該向別的國家看他們的制度，有什麼樣的民主值得我們去借鏡。至於中國應有什麼樣的民主，這個問題太大，我沒能力回答，這要由中國在歷史上的實踐，才可以提出中國需要的是什麼樣的民主，而不是我提不出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民主，中國就不需要民主。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中國要有更大的民主，這就是我們的方向。

何：比較是最好的認識方法。我們可以比較一下中國和西方式的民主，才可以認清誰有更好的民主方式，才可以探求更好的民主方式。



岑：中國是有經濟上的民主，但缺乏政治上的民主。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有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呢？中國是不是缺乏這個條件呢？如果說有這民主，地、富、右會反撲，中國建國二十七年，資產階級已經消失了。現有的資產階級只是現在有特權的官僚，中國的文革，要打倒的不是社會上的資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中國現在沒有資產階級，有的只是未來的資產階級，和培養這些資產階級的土壤。正是要防止這種復辟，我們才強調要有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如果說：中國現有的資產階級的人數和力量可以壓倒無產階級，這是荒謬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是最好的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中國現在要怎樣做：恢復人民代

每一個政策，讓羣象公開充份討論，決定，中央才再決定這個政策，這方面中國實行得還是很少。其次現在批評「四人幫」，主要是他們犯了什麼樣的錯誤，但現在問題不是因為這四人才攪出這些錯誤來，而是由於制度本身，如果制度不改變，還會有其他的「四人幫」、「五人幫」等等。為什麼「四人幫」可以上台了十年這樣久，禍國殃民，為什麼十年後才被揭發？這說明現制度是容許他們在脫離羣象的監督下，做一些禍國殃民的事情的。現在的錯不應單是歸咎在這四人身上，主要在制度上沒能力揭發他們所犯的錯誤，否則他們也不會有這樣大的錯誤。有人認為「四人幫」之可以遺毒十年之久，是中國的民衆反潮流的覺悟不夠。但反潮流一定要有制度上的支持，如制度不支持甚至鎮壓，則反潮流是很難會出現的。在大鳴大放這一點上，一定是要社會主義而不能夠是資本主義的，因為要專資產階級的政。但問題是對任何的反對言論都可以套上資產階級言論，如「四人幫」就是這樣到處扣人帽子。唯一防止的方法，就是讓政策在羣象中充份的討論，限制資產階級只能依賴於人民的監督。

方：中國不是沒有一個制度，如人民代表大會，是一個很好的監督機構。在民主方面，大字報是一個最直接的方式，報表大會所應有的代表性的權力，不受共產黨內的黨爭所影響。

生：怎樣是社會主義的民主，最基本的一點是沒有偏頗的，平等的。我們可以先看看西方的民主，資本家可以掌握一切宣傳機構，沒有錢就沒可能宣傳，這就是有偏頗的自由。社會主義的民主就是每個人的機會都是相等的，不獨是經濟上，而且政治上也一樣，就和西方式的民主劃清了界限。

編者按：「四人幫」事件發生後，許多朋友提出了不同的意見，「海外述林」編輯部遂決定召集一次座談會，讓各方面的意見有溝通的機會。由於話盒子易開難關，整理者被迫在不影響談話者原意的範圍內畧加刪改，使我們這份篇幅極之有限的小雜誌能夠容納。



文革中揭露的，如工廠的廠委都有特權，使每一個人都不敢表達自己的意見，以防不利。我同意提高人民的意識、大辯論。但是如大字報，得到的反應是怎樣的呢？有沒有力量呢？人民沒能力決定幹部的任命、撤職。如北京市長，人民有沒有選舉過呢？沒有。一切由中央決定。國務院是國家機器，共產黨是人民的組織，但現在是黨中央完全決定了國家機器。這情況跟國民黨在台灣的情況一樣，蔣經國控制了嚴家淦的一切。這是一個大問題，混淆了黨和國家的關係。列寧就指出過：黨跟國家是二件事，黨不能夠直接干涉國家的事務的。但這件事現在每個人都忘了，所以說，中國絕對沒有達到社會主義社會應有的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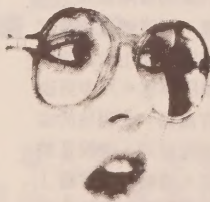
主席：我想提出一點是：大鳴大放、文革都是由上而下的運動，要黨通過才可以發起這一個運動。

生：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不是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不公開討論，不教育羣象就讓羣象盲目投票，中國的民主應當讓

陳氏眼鏡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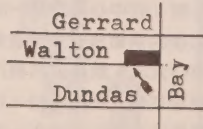
多倫多比街七百號地下

LUCLIFF PLACE



價即驗隱
錢配光形
最即眼眼
平有鏡鏡

特新款品
別舊式質
優顧最
待客多貴



電話 595-1665

談金剛 (KING KONG)

□魯平(溫尼泊)

去年聖誕節多倫多市面上影的西片頗多，其中最惹人注目的荷里活大製作要算是「金剛」(King Kong)一片。「金剛」是新瓶舊酒，重拍一九三三年的經典作「齊天大聖」。這次的製作費用高達二千四百萬美元，是近年來荷里活製作的大型商業片。

「金剛」屬於近年流行的「災難電影」類型，跟以往的電影「大地震」或「大白鯊」(註)一樣，以描寫文明社會災禍降臨和同舟共濟為題材。「金剛」是寫一隻原始巨猿闖入大都市，大量破壞一切，是接近「大白鯊」的災難片。這部片與舊版本在故事情節方面略有出入，但主題意識還是一脈相傳。首先畧提一下舊版本的受歡迎原因及其時代背景。「齊天大聖」上影時正逢三十年大不景氣時期，當時的美國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面臨經濟大蕭條。不景氣的美國社會失業人數日增，人民生活艱難，精神苦悶，動盪不安和焦慮的情緒瀰漫着。荷里活出品的娛樂片擔當了逃避的角色，銀幕下觀眾尋求刺激娛樂的慾望得到滿足。「齊天大聖」及其他類型電影(如音樂片或警匪片)大受歡迎，其賣座原因就是配合了客觀條件。「齊」片在內容上提供了一種兒童性的幻想，借用了「美女與野獸」的童話。這部片在技巧方面十分先進，慢格特技攝影得到充分發揮，是有聲電影面世後最有創作性的電影。「齊」片的貢獻主要是開創災難片及恐怖片類型發展，它成為經典作是受到時間的考驗，如果說「雷電華——通用公司」(R K O—General)對美國電影史的貢獻祇有「齊天大聖」與「大國公民」(Citizen Kane)兩部片，着實不為過。

「金剛」抄襲原版，只把故事改作現代背景，加強巨猿與美女那種性愛傾向主題，大體上來說沒有多大創新。現在畧一比較一下。「齊」片寫一隊電影外景隊出發探險，到達無人地帶，隊中的女明星被巨猿捉去，以後便是一連串森林歷險。巨猿最後被捕，給五花八綁的帶到紐約去展覽。但牠很快逃脫，大肆搗亂，終於要出動空軍，將站在帝國大廈的金剛處死。「金剛」的中心人物是一隊石油公司找尋油源，到達神秘孤島，以後的情節沒有多大改變。今次金剛四出搗亂，爬上世界貿易中心大廈，最後仍然被代表文明機械的飛機所擊落。片中更改原來三個人物的身份。但其中人物刻劃略有漏洞。女明星的描寫最乏可靠性，她在一次意外的遊艇爆炸中逃出來，據說是被一部色情片「深喉」所救，還十分迷信星座。這個叫「當雅」的女明星和舊版的女主角完全相反，因而她與巨猿的關係亦有改變，兩者的性關係頗為明顯。她面對金剛毫不害怕，還說了不少挑逗性的話，編劇又安排金剛替她沐浴(性交的象徵)。

她罵大金剛是「該死的大男人主義者」，這種自覺性的玩笑自然是編導的一廂情願。這部片其實仍然把女人當作玩物，看金剛將「當雅」玩弄牠的巨掌之中，就應該明白荷里活的電影那種潛伏性的性別歧視。至於「美女與野獸」的童話仍然有跡象可尋，即是說野獸愛上美女，而後者把前者(人類獸性的一面)轉變成人性的一面。金剛可以引伸為一種純潔的象徵，反映出人類的虛偽和腐敗。其中的對比有文明與野蠻、理性與狂暴、人性與獸性、秩序與動亂。在七十年代金剛可以說是象徵第三世界的政治覺醒，反抗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及經濟侵略。在舊版「齊天大聖」中有明顯的階級意識存在。菲韋莉是一個無依無靠的孤女，代表不景氣社會的勞苦大眾，被導演看中找去拍電影。羅拔岩斯朗的電影導演是典型的資本家，他利用菲韋莉找工作的弱點，只給以極低的薪金來參加探險隊。到達目的地後，菲韋莉被土人捉去拜祭金剛，她再次成為受害者。羅拔岩斯朗於是改變計劃，設法捉捕金剛用作展覽，金剛成為另一個被剝削的對象。最後金剛被飛機擊倒，資本家不但沒有獲得懲罰，而且把責任推在女演員身上。「金剛」的石油公司領隊以金剛作為石油公司的宣傳對象，還改不了其資本家的特性。最後金剛逃脫，這個資本家被殺，而金剛亦逃不了它的命運。金剛被認為代罪羔羊，它代表第三世界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反抗，只要消滅金剛，一切就會回復正常。另一方面那個資本家亦被殺，表面上看來階級問題似乎解決，觀眾會認為金剛的死是對資本主義社會作出有力的控訴。事實上這是荷里活電影工作者的政治訊息；誤導觀眾，轉離問題核心及提供逃避主義式的娛樂。這部片在有意無意之間低貶有色人種的地位，「齊」片有中國船員，「金剛」有黑人及中國船員同樣扮演不重要的角色。這部片最大弱點是把金剛寫成悲劇英雄，過份做作流於傷感，又要把它捧為代罪羔羊，却掩飾不了其政治立場。

註：本文所用中譯名，以香港中譯名為主。



母親，請你不要震怒，我是知道你如何的關心我們。只是，你太不了解我們，或是太不信任我們。你還以為我們是無知的小孩，總要事事為我們作好安排，不讓我們多點為自己作主；你太固執，只讓少數你的親信為大多數人作主。我要告訴你，若不是由大多數人推舉出來的，怎能保證少數人會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呢？我要問你，既然你常常教導我們要依靠羣衆，相信羣衆，為什麼你總不願意羣衆有同等的發言權利，總不願意羣衆有輿論的自由。你難道不知道一旦當掌權者違背了羣衆的利益時，羣衆需要通過這些自由的行使，對他們批評彈劾的呢？

母親，請你不要震怒，我雖然這樣說，我還是感謝你，因為你教育了我們，對不合理的事情要敢於要求改革。正是因為你這樣教導我們，我才懂得要向你說心中的話。

母親，是你教導了我們，去爭取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讓社會上的人有同等的地位、同等的機會，可是你為什麼又縱容少數人操縱了出版的自由，縱容少數人操縱了音樂、文藝、藝術、電影的自由？

母親，請原諒我說了一些你可能不喜歡聽的話，但我仍是追隨你的教誨的。你教我們要自力更生、關心社會、關心國家、關心世界，養成爲人民服務的精神。你教我們不要以多數人

短篇創作

壓迫少數人，要彼此尊重。可是我覺得你還是對羣衆過份懷疑。雖然你指出了幹部不要脫離羣衆，但是要跟羣衆打成一片就要制度上的支持以得到貫徹。所以，我還是要提出：制度上應該給人民發言的組織的權利，這樣，脫離羣衆的掌權者才會及時被暴白。你何必害怕一旦言論出版的自由確立了，壞的言論和刊物將會應運而生？羣衆的眼睛不是雪亮的嗎？真理不是越辯越明的嗎？

母親，儘管你還是不喜歡聽這些話，我還是要說的。要是我把心中的話壓抑了下去，我就變成一個虛偽的，只懂得爭取你的歡心的人。我知道你不願意見到我成爲這樣可恥的一個人吧？ ●

中國商業貿易公司

CHINA COMMERCE TRADING CO.

860-862 Richmond St. West, Toronto, Ont. 416-869-0645

Mailing Address: Box 50 Stn. "A", Toronto, Ont. Canada

Cable Address: Mei-Cheng Canada

藤，竹，柳，草，製品及祖國工藝品

專營批發 歡迎同業代理 現貨大量供應

司公易貿華中大
Great China Trading Co.

121 DUNDAS ST. WEST.
TORONTO ONT PHONE: 368-1242

經銷：

國產地道藥材，祖國，香港成藥，專人負責配藥，歡迎外埠郵購。祖國工藝品，藤竹、柳草製品，兼營零售批發。

廣東中醫藥專科學校畢業
香港政府中醫藥學院檢定中醫師
趙國材

趙國材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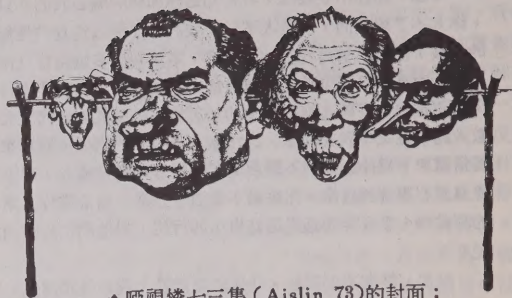
李 一位不喜歡多倫多的漫畫家 落

讀過麥其連雜誌 (Maclean's Canada Magazine)、蒙特里爾星報 (The Montreal Star)、加拿大大學新聞 (Canadian University Press)、笨拙 (Punch Magazine) 和其他一些流行雜誌的人，總會被啞視憐 (Aislin) 底辛辣深刻的卡通吸引着。他下筆無情，絕不喜歡賣賬，更不為權勢所迫嚇。加拿大著名的女作家馬嘉烈·雅芙 (Margaret Atwood) 盛稱啞視憐觀察入微，筆下人物的特徵祇要經他過目，無一能倖免，不用我們多說，自有圖片為證。

數風流人物，還看杜魯多



一九四二年，啞視憐初次墜入這個他筆下一片凌亂污穢的世界，在加拿大首都渥太華出世。計算起來，今年已三十有六了。原名泰利·摩薛勒 (Terry Mosher) 的啞視憐怎麼會改個如此怪異的名字來呢？個中亦有其故事。原來泰利對毫無計劃的物質文明批判不已，患上家庭電器化恐懼症，連電視機也引不起他的興趣，因此索性改名啞視憐 (A. Slin, the initial 'A' Standing for AmerdelaPhobia: the total fear of electric homes)。其實泰利最初本無意於靠畫卡通糊口，興趣實在商業藝術方面。在多倫多的中央工藝學院 (Toronto Central Technical School) 修讀了數年，其後，亦曾在多省藝術學院 (Ontario College of Art) 浮遊了兩週，與其說在該院研習繪畫技術，倒不如解釋為摸藝術學院的浪漫氣氛吧。祇是安省藝術學院不成氣候，泰利失望之餘，終於在一九六四年離開多倫多，開始了為期兩年週遊北美各地的自我流放生涯，決定從此不再跽足在多倫多這塊土地上。



▲啞視憐七三集 (Aislin 73) 的封面：

回抵加國後，泰利認識到整個北美洲也許祇有魁北克省一地比較有文化，並進入魁北克市的美術學院 (Ecole des Beaux Arts, Quebec City) 繼續研究繪畫技術。一九六八年泰利移居蒙特里爾，開始使用他那時出生不久的女兒，Aislin 的名字在報章雜誌上發表他的卡通作品。由於他底作品有着異乎尋常的表現，加上社會性濃厚的內容，作品一經發表，便引起加拿大社會各階層不同的反應，前進激烈的知識份子爭相討論他的諷刺漫畫；一般凡夫走卒又以他的作品之辛酸內容、誇大了的人物特徵為茶餘飯後的談話題材；維持社會正常的有關人員早亦對他另眼相看，在一九六三年時便對他發生興趣了。

如何評價啞視憐的作品，見仁見智，還是讓讀者自己評估吧。馬嘉烈·雅芙曾經提醒大家：啞視憐的漫畫一直使部份加拿大人感到不安。原因是也許有一天閣下的尊容亦會榮獲啞視憐的垂青，成為他筆底下的卡通人物。★



▲啞視憐觀察入微。馬嘉烈·雅芙說他對漫畫中那位大家熟悉的女士最深切的印象是她一雙豬腳般的玉腿。坐在這位女士膝上的「駙馬」，我們不難看出他那雙由於吃慣軟飯，不善持刀羹的一雙手的手指是退化了了的。

多倫多攝影器材

在多倫多攝影器材，我們使用閣下的語言.....不論是攝影界裡的國際語言還是中文！多倫多攝影器材被認為是過去三十年來加拿大最先進的攝影器材公司。價錢相宜、售貨員的豐碩知識替本公司贏得如此美譽。滿足閣下攝影需要，請光臨多倫多攝影器材

TORONTO CAMERA

... because you've got to be good to make it on Yonge Street

340 YONGE

Mon.-Wed. & Sat. 9-6, Thurs. & Fri. 9-9 • 597-1891

We accept Chargex • Master Charge • Trade-Ins • Mail Orders

我們說閣下的語言

Canon

NIKON



加拿大安省多倫多市央街三四〇號

中國藝術印務出版公司

86, DALHOUSIE ST., TORONTO, PHONE. 368-8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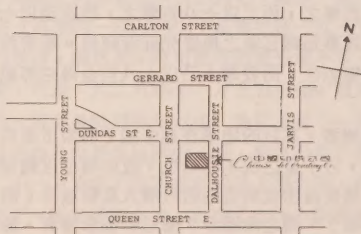
(旦打街東近教堂街)

Chinese Art Printing Co.

艷麗柯式印刷
圖字清晰悅目
精心設計封面
七彩餐牌拾紙
喜慶結婚請帖
中西書報圖章

總經理

司徒佑權



(三) 加拿大限制華工之例

哥倫比亞省亦有限制華工之例。前此每一人登岸，須納稅金一百元（美金），近則增至五百元，合中國通用銀千餘元矣。此案自五年以前，已提出於本省議院，久未通過。今年則提出於加拿大總議院，以四月初一日通過，千九百〇四年正月一日實行。自施以往，吾華工來此地之路又絕矣。一歎。

白人之殖民地，除南亞美利加及南洋海峽羣島以外，幾無一不限制華工。其限制之例種種，以余所知者，則美國及其屬地，皆與中國申明禁約，嚴定法律，一切勞動者，皆不許至（禁約禁例詳下編）。

澳洲之烏修威省徵稅一百鎊（華銀千元）。

澳洲之域多利省、坤錫蘭省，限每船客積五百噸則每次許搭華工一名，每五百噸遞進一名，不許逾額多載。澳洲之西澳、南澳兩省，限能解英語五十句以上者乃可以登陸。

此一千九百年以前之例也。其時澳洲諸省各自分治，華人在甲省上陸者，不許闖入乙省。自千九百年一月澳洲聯邦成，六省合而為一。其已登陸者，各省許通來往，然此後限制之例益苛。今則雖納稅金亦不許至，雖噸位亦不許容，其苛禁殆更甚於美國矣。

紐西蘭島徵稅金三十鎊（華銀三百元）。

夏威夷、古巴、菲律賓，皆皆許華工自由。逮隸美後，一從美例。古巴近已獨立，若當其政府新易時，解此禁自非難。惜我政府恬不以為意，今無及矣。

白人之待華人，惟有兩法：（其一）則既居其地者，一切應守之法律，與彼民平等，惟限制我不許來。（其二）則來去任我自由，惟居其地者設特別法律以相待。其第一法，用之於白種人多他種人少之地，如美洲澳洲是也。其第二法，用之於白種人少他種人多之地。如南洋羣島、安南、暹羅諸地是也，要之不許與彼平等而已。

吾昔在澳洲，聞吾華工每一人至其地者，率須費七八百金，其船位之價，不過百金耳。何以餘費之鉅至於如是，蓋因坤士蘭、域多利兩省噸位，每船率僅能載四五人，而欲往者之數，殆十倍之而未已，故必須報名候補。候補至五六年不得，故競以多金賂船行之司事。甲以三四百得一位，乙以五六百奪之，丙又以七八百奪之，故遂至以七八百為定價也。其事殆與官場之捐儘先班者同矣。尋常西人以三百金得頭等船位，而我華人乃以七八百金得三等船位。可歎。

華人之往澳洲者，其目的地率在烏修威（雪梨市者烏修威之首府也），以千金之稅不易納也，故由噸位以過域多利或坤士蘭，然後復由彼兩省間道以潛入烏修威境（兩省皆烏修威之鄰境），謂之偷過界。偷過界被拿獲者，除照徵稅金百鎊外，仍加罰五十鎊。無費可罰則下獄一年，獄滿仍逐出境。

梁啓超

加拿大屬僑工甚難，而華人來此絡繹不絕者何也，蓋由此偷過界以入美境也。去年一歲上陸於域多利溫哥華兩埠者五千餘人，其入美境者殆十而六七。他歲稱是。

此間華商有專以導人偷過界為業者，每人索賄美金二百餘元，其賄則美境之稅關及駐溫哥華之美領事皆有分潤云。故今日華工之改入美境者，亦須華銀七八百乃得達，蓋加拿大之稅金二百元，入境之賄四五百元，其餘船費車費不過百餘元耳。以祖國數萬里膏腴之地，而使我民無所得食，乃至投如許重金以餬口於外，以受他族之牛馬奴隸，誰之過歟。



本世紀初哥倫比亞省限制華工例證之一——五百元「人頭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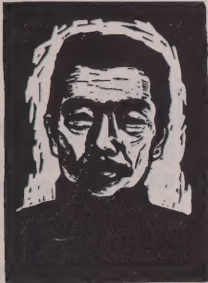
(四) 溫哥華之中國維新會

華人愛國心頗重，海外中國維新會（西名為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實起點於是。自己亥年此會設立以來，至今蒸蒸日上。溫哥華入會者十而六七，域多利則殆過半，紐威士綿士打幾無一人不入會者。會中章程整齊，每來復日必演說，每歲三埠合同大叙集一次。近集數萬金建總會所於溫哥華，儼然一小政府之雛形也。

今歲會事益有進步，效立憲國選舉法，公舉總會之副總理一人，督察一人（其大總理既有定員），域溫紐三埠各出候補者二名，先期一月佈告其名，屆日以匿名投票之法選舉之，三埠同時開票，互以電報報某名得票之多寡。當選舉期以前，競爭殊劇烈，各候補者到處游說運動，演說其所懷抱之政策，儼然與文明國之政黨無異，此誠中國數千年所未有也，他日有著中國政黨史者，其必託始於是矣。余到後四日，為總選舉之期。定章凡會員皆有選舉權，有權者六千餘人，投票之數，不過千數，蓋風氣初開，未知公權之可貴，各國皆如是也。得票最多者為六百七十一票。被選為副總理。明年屆選舉期，則棄權者之數必少於今年矣。

三月廿六為維新會總會所興工建築之期。西例凡有公家建築，必請一有聲望之人，先置一石，且獻祝詞，名曰樹礎之典。諸同志以余適至，因固留數日，使行斯禮。當時中西人士，觀者如堵，余置石獻祝詞後，演說一次，鼓掌之聲雷動，此亦中國前此未有之舉也。





兄弟之間

—魯迅與周作人—

在病中，魯迅仍不廢工作和日常生活，而且於十月三十日買定了阜成門內三條胡同廿一號的舊屋六間，價八百。他並沒有錢買屋，錢都是向朋友借貸來的，這時他的主要收入做僉事的薪金，已積欠半年以上，例如十一月二十二日日記：「下午收奉金二月分者三十一，又三月分者百。」二十三日日記：「下午收三月分奉泉百五十」。至於大學裏面教書收入，不僅為數甚微，而且積欠甚久，例如九月二十九日日記：「上午往師範校取薪水十四元，三月分訖。」十月十九日日記：「收大學四月下半月及五月全月薪水共二十七元」，可見一斑。以後魯迅的收入，主要得靠稿費和版稅。

西三條胡同的房子是一九二四年一月二日接收的，經過幾個月的修理，到五月二十五日才得搬入。據許季弗所說，「這是一所小小的三開間的四合式。北屋的東間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間是朱夫人的房。南屋是他的藏書室。北屋的中間，後面接出一間房子去，魯迅稱它為『老虎尾巴』，乃是他的工作室。它的北窗用玻璃，光線充足」。

魯迅移入新居後，便在八道灣搬取書及器物，六月十一日日記：「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啓孟及其妻突出罵言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啓孟救正之，然終取書器而出。」這不多不少是一齣「鬧劇」，魯迅日記中以後不再有啓孟二字，兄弟的關係永絕：關於此事，他們的共同朋友許季弗有公平的證述：

「魯迅對於兩弟非常友愛，因為居長，所有家務統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煩兩弟。他對於作人的事，比自己的還重要，不惜犧牲自己的名利統統來讓給他。……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些斯里的性的。她對於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忌忌。作人則心地糊塗，輕聽婦人之言，不加體察。我雖竭力解釋開導，竟無效果。致魯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廳而他總不覺悟；魯迅遣工役傳言來談，他又不出來；於是魯迅又搬出而至磚塔胡同了。從此兩人不和，成為參商，一變從前「兄弟怡怡」的情態。這是作人一生的大損失，倘使無此錯誤，始終得到慈兄的指導，何至於後來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說起他的藏書室，我還記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這所小屋既成以後，他就獨自個回到八道灣大宅取書籍去了。據說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電話，喚救兵，欲假外力以抗拒；作人則用一本書遠遠地擲入，魯迅置之不理，專心檢書。一忽兒外賓來了，正欲開口說話，魯迅從容辭却，說這是家裏的事，無煩外賓費心。到者也沒有話可說，只好退了。這在取回書籍的翌日，魯迅說給我聽的。我問他：「你的書全部都已取出了嗎？」他答道：「未必。」我問他我所贈的「越縕堂日記」拿出了嗎？他答道：「不，被沒收了。」」

可是作人對許季弗這種說話，心有不甘，他在「回想錄」上有二篇「不辯解說」，上篇說的許多話，其實只是為余澹心編的「東山談苑卷七」的一則故事作注解，這則話說：

「倪元鎮為張士心所窘辱，絕口不言，或問之，元鎮曰，一說便俗。」

魯迅與作人失和的事，經許季弗在魯迅死後公開一說，作人自然要加以辯解，但他先引用倪元鎮的話「一說便俗」，以此掩蓋他的辯解，其實他的不辯是辯，而且越辯越暴露了他的不氣，和事實上曲在他這一面。

「……關於那個事件，我一向沒有公開的說過，過去如此，將來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記上七月十七日項下，用剪刀剪去了原來所寫的字，大概有十個左右，八月二日記移住磚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衝突，也只簡單的記着衝突，並說徐張二君來，一總都不過十個字。——這裏我要說明，徐是徐耀辰，張是張鳳舉，都是那時的北大教授，並不是什麼「外賓」，如許季弗所說的，許君與徐張二君明白這事件的內容的人，雖然人是比較「老實」，但也何至於造作謠言，和正人君子一轍呢？不過他有一句話却是實在的，這便是魯迅本人在他生前沒有一個字發表，他說這是魯迅的偉大處，這話說得對了。魯迅平素是以直報怨的，併且還更進一步，不但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還說過這樣的話，（原文失記，有錯當改），人有怒目以視者，報之以罵，罵者報之以打，打者報之以殺。其主張的嚴峻有如此，而態度的偉大又如此，我們可不能學他的百分之一，以不辯解報答他的偉大乎？而且這種態度又併不是出於一時的隱忍，我前回說過對於所謂五十自壽的打油詩，那已經是那事件的十多年之後了，當時經胡風輩鬧得滿城風雨，獨他一個人在答曹聚仁楊雲雲的書簡中，能夠主持公論，胸中沒有絲毫芥蒂，這不是尋常人所能做到的了。

或者有人說，書簡所說乃是私人間的說話，不能算什麼。那麼我們來看他所公表的吧。這第一是小說，收在「徬徨」裏邊的一篇「弟兄」，是寫我在一九一七年初次出疹子的事，雖然是小說可是詩的成分並不多，主要的全是事實，可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所作，追寫八年前的往事的。可是最特別的是寫成「弟兄」的十一天以前所作，在魯迅作品中最是難解的一篇，題目乃是「傷逝」，於十月二十一日寫成，也不曾在雜誌上發表過，便一直收在集子裏了。關於這篇小說，我在「魯迅小說裏的人物」裏邊只在地方畧加考證，現在轉錄一部分，併加以補充於下：

「『傷逝』這篇小說大概全是寫的空想，因為事實與人物，我一點也找不出什麼模型或依據。要是說有，那只是

在頭一段裏說：『會館裏被遺忘在偏僻裏的破屋是這樣的寂靜和空虛。時光過得真快，已經快滿一年了，事情又這麼不湊巧，我重來時偏偏空着的又只有這一間屋。依然是這樣的破窗，這樣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樹和老紫藤，這樣的窗前的方桌，這樣的敗壁，這樣的靠壁的板床。』第二段中又說到那窗外的半枯的槐樹的新葉，和掛在鐵似的老幹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我們知道這是南半截胡同的紹興縣館，著者在民國初年曾經住過一時的，最初在北頭的藤花館，後來移在南偏的獨院補樹書屋，這裏所寫的槐樹與藤花，雖然在北京這兩樣東西很是普通，却顯然是在指那會館的舊居，但看上文偏僻裏云云，又可知特別是說那補樹書屋了。當時忘記了說，他從藤花館擺搬到補樹書屋的時候，日記上說明是『避喧』，那麼更可證明會館裏偏僻的地方只是補樹書屋的一處而已。這樣的證明於了解那篇小說有什麼用處呢？『傷逝』這篇小說很是難懂，但如果把這和『弟兄』合起來看時，後者有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實』，而『傷逝』乃是全個是『詩』。詩的成分是空靈的，魯迅照例喜歡用『離騷』的手法來寫詩，這裏又用的不是溫李的詞藻，而是安特來也夫一派的句子，所以結果更似乎很是晦澀了。『傷逝』不是普通戀愛小說，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來哀悼兄弟恩情的斷絕的。我這樣說，或者世人都要以我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覺，深信這是不大會錯的。因為我以不知為不知，聲明自己不懂文學，不敢插嘴來批評，但對於魯迅寫作這些小說的動機，却是能夠懂得。我也痛惜這種斷絕，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人總只有人的力量。我很自幸能夠不俗，對於魯迅研究供給了兩種資料，也可以說對得起他了，關於魯迅以外的人我只有對許季弗一個人，有要訂正的地方，如上邊所說的，至於其他無論什麼樣人要怎麼說，全由他們去說好了。」

我覺得作人雖然這麼說，實際上許季弗究竟造了什麼「謠」，還是沒有具體的說清楚。許季弗所記他們兄弟失和的事，證以魯迅的日記，並無一字造謠，周作人垂老所寫的「回想錄」，說及這事時，竟比許季弗為東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這完全不符事實。至於發明魯迅的小說『傷逝』為哀悼兄弟恩情的斷絕，認為這是「對於魯迅研究供給了資料」，算是「對得起他」，這也無補於魯迅生前所遭受的隱忍的痛苦，「對得起他」與對不起他，都是無關的了。

作人所說的五十自壽詩，附帶在這裏交代一下。由此可見魯迅的胸襟浩曠，批評客觀，對事不對人，確為作人所不及的。

一九三四年，林語堂在上海編人間世，他把作人寄給他的兩首詩加了個知堂五十自壽詩的題目，給登了出來，詩如下：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
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
老去無端玩骨董，閒來隨分種胡麻。
房人若問其中意，且到寒齋吃苦茶。」

半是儒家半釋家，光頭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裏蛇。
徒羨低頭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談狐說鬼尋常事，只欠功夫吃講茶。」

這二首詩登出以後，會做詩的紛紛和作，年青人則多加以批評攻擊，魯迅對於林語堂的提倡閒適，本多不滿，但對於作人的五十自壽詩及和詩，並未公開批評，祇在給楊霽雲和曹聚仁的私人信中畧有談及。



林語堂

致楊霽雲信中談到『人間世』者有云：「……關於近日小品文的流行，我倒並不心痛。以革新或留學獲得名位，生計已漸充裕者，很容易流入這一路。蓋先前原著鬼迷，但因環境所迫，不得不新，一旦得志，不免老病復發，漸玩古董，始見老莊，則驚其奧博，見文選，則驚其典瞻，見佛經，則服其廣大，見宋人語錄，又服其平易超脫，驚服之下，率爾宣揚，這其實還是當初沽名的老手段。有一部分青年是要受點害的，但也原是脾氣相近之故，于大局却無大關係，例如『人間世』出版後，究竟不滿者居多，而第三期已有隨感錄，雖多溫駁話，然已與編輯者所主張的『閒適』相矛盾。……」

……至於周作人之詩，其實是還藏些對於現狀的不平的，但太隱晦，已為一般讀者所不憶，加以吹擂太過，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覺得討厭了。」

致曹聚仁的信則甚至替作人辯解：「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然此種微辭，已為今之青年所不憶，羣公相和，則多近於肉麻，於是火上添油，遽成衆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擊文字，此外近日亦無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近似亦有人覺國之將亡，已在卸責于清流或輿論矣。」

作人對於魯迅的這種批評，亦稱之為「偉大」的，但他對魯迅的批評又如何？他在「老人的胡鬧」中說：「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興佔勢力的意見，不問新舊左右，輒靡然從之，……蓋老不安分，重在投機趨時。」

觀乎此，作人與魯迅二人氣度之相去，簡直不可以道里計了。

× × ×

魯迅雖和作人決裂，但對於建人的太太——三太太仍照舊照顧的，例如：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日記：「得三弟信，屬以泉十交芳子太太，晚往山本醫院視芳子疾，並致泉十，又自致十。」

二十六日，下午往山本醫院看三太太。

六月二十一日，至濱來香食冰酪，並買蒲陶乾，又購餅六枚，持至山本醫院贈孩子食之。

七月七日，午往山本醫院，以黃油餅十枚贈小土步。

八月十三日，往山本醫院視三太太疾，贈以零用錢廿，贈重君蒲陶乾一盒。」

芳子和建人的脫幅始於何時，建人與王蘊如的同居始於何時，在魯迅日記中均無可攷見，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日記：「買布人形一枚贈嘩兒」，嘩兒是建人與王蘊如的孩子，以後日記中常常提及她們，記載語氣與以前談到「小土步」時一樣，可見魯迅對芳子，王蘊如以及她們的孩子一視同仁。

周作人的態度則完全不同，他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致香港友人信云：

「——日前忽忽寄信，關於某女士回憶錄之事忘記答覆，茲轉補述之。她係女師大學生，一直以師弟名義通訊，不會有過意見，其所以對我有不滿者殆因遷怒之故。內人因同情於前夫人朱安之故，對於某女士常有不敬之詞，出自舊家庭之故，其如此看法亦屬難怪，但傳聞到了對方，則為大侮辱矣，其生氣也可以說是難怪也。來書評為婦人之見，可以說是能洞見此中癥結者也。內人之女弟為我之弟婦，亦見遺棄（以係帝國主義分子之故），現依其子在京，其子以抗議故亦為其父所不承認，此係家庭私事，因便中一併說及耳。……」

魯迅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日記：「得許廣平信」；四月十二日日記：「許廣平、林卓鳳來。」這是他們兩人關係的開始，過了二年，他們才在上海同居。這時，魯迅和作人決裂已久，即使作人的太太信子同情朱夫人，有什麼對許廣平不滿之詞傳到上海，也決不會有什麼影響的了，作人說許廣平因此遷怒到他，所以在「魯迅回憶」的文中文中詆毀他，這却是近乎「婦人之見」了。

至於建人與芳子的脫幅，作人說「以係帝國主義分子之故」，參攷國內最近發表的魯迅致章彥琛的信（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七日）：「喬峰將上海情形告之北京，不知何意，他對我亦未言及此事。但常常慨嘆保持飯碗之難，並言八道灣事情之多，一有事情，便呼令北去，勸止兩難，至於失眠云云。……」又，魯迅於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二日致母親信，說建人所得的薪水，好像每月也被八道灣

逼去一大半，生活頗窘，可見建人雖已在上海另組了家庭，對於八道灣的關係，他確是像個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弱小民族」；作人晚年致書香港友人，談到這件事，竟說「……至於王蘊如乃是他的所謂『愛人』，若不客氣的說，照上海話說乃是『姘頭』了，我當初寫信規勸他兒女已長大（在一九三七年），何必納什麼妾，他為此便不同我通訊了。……」這是什麼話？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是怎麼樣的一個女人，魯迅生前從無一言道及，我們不必偏信景宋對她的攻擊，芳子受她姊姊何種影響，我們也無從深究，但建人不是花花公子，那是可以深信的，在過渡時期中，婚姻的始合終離比比皆是，作人是五四前後時代的思想革命家，晚年思想簡陋退化到十足的冬烘了，用「姘頭」、「納妾」這種封建倫理觀念的名詞作為衡量自己兄弟婚姻變化的尺度，一臉孔悻悻之色，可見有人說他「風格清致、思想通達」那種溢美之辭，與他的為人是不相符合的。

★

思雅書舍

提高閣下閱讀水平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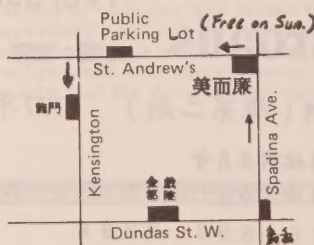
龍門粉麵

DRAGON RESTAURANT
40 KENSINGTON AVENUE
TORONTO, ONTARIO
TEL: 368-0516

Hours:

Sun-Wed 12:00 p.m. - 11:00 p.m.
Fri-Sat 11:30 a.m. - 1:00 a.m.

Closed Thursday



獨家首創
粉麵釀食
正宗潮式
魚旦魚片
零沽批發

編者的話

- 近年中文學校在北美洲各地的唐人社區裏發展得十分蓬勃，得力於很多熱心於此的僑胞。在人力、物力十分短缺的有限條件中，他們仍然不間收穫地將中國文化傳播到北美洲的土地上。他們的毅力和苦心是值得大家敬佩的。今期刊將中文教育在北美洲向大家作縱橫的展視。我們在三藩市的聯絡員給大家提供了當地的僑胞如何替子女們爭取最佳的中文教育機會。溫哥華的李安納君替大家重溫了北美洲中文學校的早期歷史。
- 去年年末，多倫多市發生了一連串少數民族被襲的事件，引起了相當的反應。「種族歧視」這個名詞一直被視為禁諱。其實，懼怕使用這個名詞祇不過是一種掩耳盜鈴的心態罷了。將個人的恩怨際遇擴大為種族歧視固然是不對，但駝鳥式的態度也不是解決問題的良策。「種族不和二三事」僅就過去三個多月以來發生的不幸事件報導給大家。
- 創刊號的文章截稿後，加拿大國會也將移民新法案首讀了。我們把新法案的內容簡畧地向大家敘述一下。並就有關新移民法案對加拿大社會和華人社區的影響訪問了多倫多市的簡家聰律師。



- 去年二月間，美國的衛生部門證實發生了四宗豬型流行性感冒後便推出了一個全國性的防疫注射運動，加拿大政府也跟著效法。注射運動曾經二度中斷，直至截稿為止，還沒有新的進展。究竟整件事情的經過是怎樣的？李懷敏君的「哄動一時的豬型流行性感冒」給大家搜集了一些有關的資料。
- 一年之計在於春。展望今年加拿大的經濟狀況又如何呢？大家自然是希望它好轉的。于仁君的「今年的經濟展望」却提醒大家，今年的經濟狀況也許更糟。可是，事在人為，學生君的「資源、人口、制度」便是這另一個角度來看經濟的問題。
- 七十年代上半期加拿大的地產業相當蓬勃，近況又如何呢？本刊就這個問題訪問了嘉年地產實業公司的陳慶之先生。除了地產買賣的情形外，在華人經商的問題上，陳先生也給了我們寶貴的意見，是值得大家一讀的。

- 多倫多市的市面怎樣？有人喜歡它，因為它目前擁有世界上最高的建築物——詩晏塔。也有人讚賞它，因為它有過曾經一度是世界上設計最新穎的大會堂。可是在一位加拿大的藝術家的眼光裏，多倫多倒不是一個值得留戀的地方。這位藝術家是誰呢？請讀李落君的文章便可知曉。

- 上一期刊登了惠可君的「中國政治鬥爭的實質」之後，引起讀者們的興趣，寄給我們很多來信發表自己的看法。由於今期刊稿，我們祇是選取了華盛頓一位讀者提供給我們的資料。其他讀者的文章，日後有機會我們才發表，謹致謝意。讀者熱烈的反應，我們很是感動，並且希望以後多些來信討論其它更切身的問題。

- 農曆新年又已在望。據我國曆例，是為歲次丁巳，屬蛇年。本刊謹願大家在這個經濟畧不景氣的當兒，不要蛇過蛇年，並祝新春快樂，健康進步。

本刊由下期起，新闢『安省華僑史』一欄，追述華人在安省的歷史。由於編者見聞有限，閱歷不多，歡迎安省各地僑胞惠賜稿件。此外，有關的資料、掌故、軼聞、圖片、文件等均一律歡迎。借出物刊登後定必送還。請與我們聯絡，謝謝。

我們的電話是：416-598-0296

海外述林 The Crossroads

VOL. 1 No. 2
February 1977

定價：加幣 75¢

第一卷第二期（總第二期） 1977年2月號

編輯：海外述林編輯委員會

編輯部地址：加拿大多倫多市登打士西街二〇五號二樓C座

電話：1-416-598-0296

海外述林總發行處：

思雅書舍

加拿大多倫多市登打士西街
二〇五號二樓C座

電話：1-416-598-0296

EDITORIAL

Racism. To most Canadians it's an ugly word, but for thousands of Canada's non-white peoples, it's still part of the Canadian way of life.

Racism, prejudice, discrimination--the singling out of an individual or group for malicious treatment due to skin colour and distinct physical features can be found everywhere -- in the schools, media, police, government, employers as well as on the streets. While these facts are just recently coming to public attention, for most non-whites, they've been around for a long time. What is new perhaps, is the degree of violence and the speed with which they pervade society. To Asians and Blacks, the stereotyping and violence cut deeply, but when it is used to bar them from employment or exercising basic human rights, it becomes the most dangerous kind of racism.

In cities across Canada, the number of race related incidents is rising. Toronto is probably the pulse of what a recent NBC documentary called a 'time bomb' situation. Here the rate of street and subway assaults have increased tenfold over the past year and indications are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It's got Metro Chairman, Paul Godfrey worried enough to appoint a task force to look into racism in the city. The need for such a task force has been spurred by the findings of an inquiry into racial attitudes in Ontario classrooms, where bigoted attitudes were found in sixty-four per cent of the students polled.

At the same time these events are coming to ligh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in the midst of cutting back on its immigration quotas and introducing a more restrictive immigration policy, followed by a stepped up crackdown on illegal immigrants. The government's action has the effect of adding fuel to the myth that immigrants are the cause of social ills like housing shortages, unemployment and urban congestion by diverting attention onto an easy target when the problem lies much deeper. What is needed is to recognize the seriousness and nature of the prob-

lem and take immediate and effective action before it is too late.

In this issue, we present two views on this delicate subject. One, an historical view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the Chinese have encountered since their arrival in British Columbia to the present. The next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hip of racism with immigration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immigration policy at a time when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cut deeply into the country's social fabric.

Eric Walsh's article on the Chinese press in Toronto show the clear differences in approach of the major Chinese dailies. By focusing on the type of news and content of the three major Toronto based newspapers, he suggests that the public benefits as long as a healthy, competitive spirit of news worthiness thrives. Other articles in this issue include a university professor's impressions of the state of education in China,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organizations in Toronto's Chinatown and developing nature of Chinatown as it winds its way westward along Dundas Street to the Spadina district.

Because we see Crossroads as a vehicle for presenting Asian North American views, we have placed a high priority on preserving the form of each of our contributors' writing. In some cases, we have had to edit material because of undue length or simply to avoid repetition. While the variety of opinions and styles presented don'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views of the editor, we hope they suggest the richness and diversity of backgrounds that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Asian North American experience.

CHINESE: A HISTORY OF RACISM IN BRITISH COLUMBIA

By Shur Kang-di

This study shall try to expose two major areas in Canadian history. First we should look at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British Columbia, as well as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Dominion. Secondly, we shall examine in this paper why racism arose at varying moments in our history. Who and what is to blame for the rise of racism against the Chinese-Canadians and who got blamed?

Still today, behind all of what appears at first to be efficient and just government, rests the seed of racism waiting to germinate when the proper conditions are at hand. Nothing much has changed except that today one has to dig even deeper into the camouflage of racism neatly disguised by the government bureaucrats.

The news of the discovery of gold on the Frazer River reached California by one Ah Hong who returned to San Francisco in May 1858 to confirm the news to his Chinese fellow countrymen. A great number of Chinese thus went by boat from San Francisco to Victoria, where they then departed for the Fraser.

The miners for the most part appreciated the Chinese immigrant during this period. While the miners were attracted to the "big strikes" of gold in what seemed like every stream and riverbed in the province, the Chinese took to working in the less glorious and yet more regular paying occupations. Some reworked abandoned claims while for the most part they were occupied in the service industries.

By 1859, Chinese began to emigrate into Victoria, Vancouver and Seattle directly from Hong Kong. By 1861, it was estimated that the entire number of Chinese in the sister Colony (British Columbia mainland) was 2,875. At one time in 1860 there were nearly 4,000 but as many dreaded the winter, they took passage for California early in the fall, and others returned to China. The number therefore, decreased to 2,875 (1). Between 1858 and 1866, strings of Chinese communities were established along the Frazer and its tributaries. Chinese settlements were also found in the Similkameen, the Okanagan, the Boundary country, the Kootenay and the Big Bend of the Upper Columbia. In 1862 the Chinese help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ighway on the west bank of the Frazer River, from Yale to Spuzzum and then aided the construction in the road on the east side of the Frazer River from Spuzzum northward along the Frazer to Lynton. In 1863, Chinese were employed in building the road from Lynton along the Thompson River and up the Bonaparte Valley to join the Tilloet-Alexandria Road (2).

Under the economic boom the gold rush brought to British Columbia, the colony changed significantly in groups of nationality. The people from other parts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 contrasted greatly with the free-spending Americans. The Canadians, unused to gold dust as a means of exchange treated it miserly and with much thrift. Canadian frugality seemed more akin to the Chinese attitude to money and so the expression "North American Chinamen" became common to describe the Canadians (3). Americans began to dominate the B. C. frontier. The American immigrants, along with the Chinese established themselves in commer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was the Americans tended to have more capital backing and thus could dominate the larger industries such as mining companies and newspapers, while the Chinese were content for the most part with smaller and less influential service industries hiring at most only a handful of workers.

From 1858 to the mid-1860's, B. C. 's economy went to an increasingly capital intense situation and also to decreasing use of labour in the mining industry as most of the labour force was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employed in gold production. The value of gold output was rapidly declining. The Chinese involved in this industry adapted to the situation by accepting lower wages and shifting to other types of mining operations, such as coal mining on Vancouver Island. For accepting poor wages, the Chinese received the wrath of organized labou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led to another influx of Chinese from Hong Kong into British Columbia when the extent of labour required to build the railway could not be had within Canada (4). Labour for this project was both uneconomical and also hard to find even within Europe.

Up until the early 1870's, the Chinese who had come to B. C. lived in relative harmony with the other settlers. This situation had suddenly changed. In 1872, the Provincial Legislature brought forth its first anti-Chinese legislation. The Assembly was presented with resolutions calling for a fifty dollar annual tax on all Chinese in the province and for the exclusion from employment on all provincial and federal public works. The Chinese were prevented from assimilating into the Canadian way of life primarily because of the legislation against them. Many Chinese wanted to live apart from "Chinatown", but because of the harassment they would expose themselves to they could not do this. The segregated existence they led caused them to be condemned by white British Columbians and yet they

couldn't lead decent lives outside of their own communities. If they were outside their communities they would be persecuted and mocked for their dress, their pigtails and their own way of life.

It was in the winter of 1886-87 that events came to a head. After a mass meeting at the Victoria city hall on January 11, 1887 a mob of a thousand met a boat containing a hundred Chinese and 'convinced' them not to disembark (5). Similar "persuasion" was exercised for a month to reduce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Victoria.

In 1884,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Victoria totalled 15,000, equal to that of the white population (6). Despite the hostility shown toward them, they built their own school in Victoria on Fisgard street in 1885.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 caused thousands more Chinese to come to Canada. The hostility stirred up by this large influx forc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a head or poll tax. The past bills by the B.C. legislature had up until 1884 been vetoed by the privy council and Governor General. They had disallowed B.C.'s anti-Chinese bills in the name of "Empire" interests (7). Instead of allowing B.C.'s bills to come into effec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ppointed a royal commission to investigate the claims of the B.C. legislature that the Chinese were lawless heathens and should be blocked from entry into Canada.

The commission recommended to regulate rather than to completely stop Chinese immigration. The commission declared that the allegations of bad morals and criminal conduct were unfounded, but suggested that moderate restrictions should be placed on their immigration. As a result the \$50 head tax of 1885 was put into effect. In 1901, the head tax was raised to \$100 and in 1903 raised to \$500.

When the Asiatic Exclusion League called a meeting on September 7, 1907, 2,000 men assembled on Cambie Street Grounds and marched out with banners flying. By the time the procession reached City Hall (adjacent to Chinatown) it contained some 8,000 persons. After the speeches by some of Vancouver's most noted gentlemen, including Church ministers, the crowd had increased to 30,000. Half of them took part in an evening riot down Pender Street in which Chinese stores and residences were wrecked and plundered and Chinese beaten.

The next Monday morning, Vancouver woke up to discover the Chinese community's revenge. Not a single Chinese showed up to work. Not a laundry in town opened most sawmills closed, all shingle mills shut, while the rich in the West-end had to cook breakfast for the first time in years. Hotels, restaurants, railway dining cars ships and logging camps all were forced to shut down as they did not have cooks. It was gradually leaked that no Chinese would show up for work until peace and protection were assur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a North American community was forced to acknowledge how dependent their world was upon a people they had previously poured scorn upon.

The government ordered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iot. It further compensated the Chinese community with \$100,000 for damages done during the rioting. During the 1903 federal election, the Conservative



leader Robert Borden sensed the regional hostility towards Chinese in B.C. and demanded complete exclusion of Oriental immigration. Earl Grey had said to Prime Minister Laurier that no political figure could hope for support in the Pacific Provinces unless he stood for exclusion of Orientals. Despite this, the Liberal leader stood with his ideals which were as Skelton clearly stated:

Sir Wilfred, while convinced that Asiatic immigration must be rigorously restricted, was scrupulously careful to avoid compromising imperial interests by any extreme policy or offensive means. (8)

During World War I, though the racist legislation against Oriental immigration continued, acts of hostility subsided. This is attributed mainly to two factors. First, during this war, British Columbia and Australia were dependent on Japan rather than the Royal Navy for much of their protection. Secondly, much of the hostility subsided because of the increased needs of the labour force. Much of the labour force of B.C. was used to meet the war requirements, while many Chinese in Canada returned to China as allowed by the Chinese Immigration Act.

After the war much of the old racism returned. Even with the \$500 head tax, the Chinese continued to arrive. Now the "Imperial Interest" did not need to be followed, as a resolution of the Imperial War Conference of 1918 declared that:

It is the inherent func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several communities of the British Common-

wealth that each should enjoy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composition of its own population by means of restriction on immigration from any of the other communities. ((9))

In 1923 the Oriental Exclusion Act was passed. Though the Trade Labour Congress in the twenties backed the move by government to exclude Asiatics from Canada, the founder of the C. C. F. party (later N. D. P.) which took on the support of organized labour during the 30's expressed views greatly differing from his colleagues in the Labour movement (10). J. S. Woodsworth's view was that the problem was created in British Columbia by the C. P. R. and other corporations who brought Orientals in for cheap manageable labour. Now that some of the immigrants of the coast had made a little money and were competing with small retailers and in the fishing industry, the exclusion cry was heard more often.

In the meantime, the government had ignored the fact that B. C.'s economy then was almost totally based on the extraction of a single resource--gold. Instead of spending the revenue on diversifying the economy, she was running up huge expenditures in road building. B. C. continued to be an economic colony of outside interests almost totally reliant upon other countries for most of her manufactured and bulky goods.

Six major factors fused together to give racism its rise in the 1880's. The civil war had long since been over and there was now a generally sympathetic view held toward the 'Old South' of the pre-Civil War period or the "Slave" period. Secondly, the gold rush being over caused a depression which the railway construction only temporarily helped to delay. With the railway construction over, men now flocked to the cities looking for work. The government, which had been short-sighted and not planned the economy so it would expand beyond a simple resource extractive economy, had now turned to the Chinese as the prime scapegoats.

This was further aided by those established in the bourgeoisie, who felt themselves threatened by the petite-bourgeois Chinese who were only one peg beneath them at the corner grocery store instead of plant or mine owner (11).

The situation grew even worse when British Columbia, like most other colonial areas, began in her economic growth period to expand only in a few booming urban areas. This caused a dense urban population.

When Chinese could not gain entry into the U. S. because of the Chinese Exclusion Bill, many settled for British Columbia. In these urban centres, Chinese tended to live together not so much because they liked living together, but out of need for a defensive element and a requirement to lead normal lives free from harassment.

These factors all came to a point in the 1880's. The government and bourgeoisie used the Chinese as an excuse for high unemployment, used them to break strikes, used them as the reason why white workers were getting low wages. The proletariat swallowed this line. It was very easy to do as the "yellow skinned demon" was highly visible because of his ra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occupationally much more visible than the mine owner or the lumber contractor.



Because of these factors, unions of the workingman, political parties (even workingmens parties) were drawn into the game of racism. Each grouping and faction tried to outdo one another in racial slanders. The Chinese were caught with no class friends nor social groups sympathetic to them. The Upper class though they publicly held an open hand to them, used them to divide the workers. The merchants, farmers and workers were taught to look upon them as competitors.

Generally, World War II did bring greater liberty to the Chinese, but at the expense of Japanese-Canadians. Twenty-two thousand Japanese-Canadians after December 7, 1941, were resettled by the government program of complete evacuation of Japanese-Canadians from the west coast. This program was carried out even though the federal committee appointed by Prime Minister MacKenzie King in 1940 stated: "the most serious danger in the B. C. situation is the ill-informed attacks against the loyalty and integrity of the Oriental population." The most likely reason why the Liberal government of MacKenzie King carried out the evacuation of Japanese which their own committee said would be wrong was that it would make them politically more popular in B. C. The only defenders of Japanese-Canadians were the Vancouver Consultative Council and the C. C. F. party. Both groups paid the price of unpopularity for their stand.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is essay it was asserted that racism is still very much practiced in this day, only in a more camouflaged way.

One of these is through the immigration laws. In the 1880's the government blamed the Chinese immigrants for the social-economic problems. In the same light, our present Liberal government is doing the same thing--only it's hidden beneath complicated rules and procedures which seem as though they can't be racist. On October 24, 1974, Robert Andras, then Minister of Manpower and Immigration, announced new restrictions on dependent relative regulations. The barrier of education requirements to the Third World had previously been barrier enough. But since then, immigrants had been entering through their relative's status. Andras used the immigrant as a scapegoat for the depe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in Canada in his statement: "...immigrants are applying for entry and arriving in increasing numbers at a time when employment levels may well be uncertain, when housing is scarce and expensive, and many social services are strained to the critical point." (12)

Liberal M. P. Peter Stollery for Spadina Riding was more honest when he said:

"My feeling is that the government is cutting back because we are swamped by applications from non-white countries."

Andrew Brewin, N. D. P. M. P. for Greenwood commented:

"It is because of the failure of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adequate and full employment policies that it has to further restrict the flow of immigrants into Canada."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out of thirty-one foreign immigration offices, only two are located in Asia, the most populous continent.

Robert Andras has failed to raise the wrath of labour as his predecessor did in B. C. Dennis McDermott, Canadian Director of the U. A. W. said "I know of no instance where immigration quotas had any influence whatsoever on unemployment." Immigration and the 'unmanageable world economy' are two factors th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blame for the failure of their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Canada is indeed faced with a crisis, but immigrants play no part in it. One quarter of all Canadians already live in the Montreal, Toronto and Vancouver metropolitan areas. By 1990, it is predicted that ninety per cent of Canadians will live in urban areas. (13)

If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take real measures to reverse urban growth then they may be responsible for destroying the possibility of providing Canadians with any form of good life. The alternatives are numerous, from relocating government building from the cities to de-populated areas to developing Rohmer's mid-Canada Corridor.

In conclusion, we should say that racism has been within Canada since Confederation. In this country, racism rose to power through the economic mismanage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us a need for people to blame. It was aided in its rise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Social Darwinism or the 'we must destroy them or they will destroy us' attitude.

The greatest enemy of racism is social and economic planning and objective study of the real conditions in society.

NOTES

1. British Colonialist, March 28, 1861. p. 2.
2. Pethick, Douglas W. James Douglas: Servant of Two Empires. (Vancouver: The Bitchell Press Ltd. 1969) p. 223.
3. Audain, James. From Coalmine to Castle. New York: The Pageant Press Ltd. 1955) p. 19.
4. Chuen-Yan Lai. The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 in Victoria: Its Origins and Functions. (Vancouver: B. C. Studie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Spring 1972) p. 53.
5. Morley Alan. Vancouver, from Milltown to Metro-
polis. (Vancouver: Mitchell Press Ltd. 1969) p. 94.
6. Gregson, Harry. A History of Victoria 1842-1970. (Victoria: The Victoria Observer Publishing Co. Ltd. 1970) p. 122.
7. Such bills were passed by the government of B. C. and subsequently vetoes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s acts to stop anyone with hair over six inches long from working on the C. P. R., an attempt to block employment of Chinese, as most Chinese at the time wore queues and a law forbidding the exportation of bones, so that Chinese corpses could not be sent back to China in accordance with tradition.
8. Skelton, Oscar Douglas. Life and Letters of Sir Wilfred Laurier.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1) p. 350.
9. Skelton. p. 348.
10. Morton, Desmond. NDP The Dream of Power. (Toronto: A. M. Harkkerf Ltd. 1974) p. 9.
11. The Vancouver Press at that time The British Colonialist was owned by two Americans from San Francisco.
12. Ritch, Dale. "Government Policy Scapegoats Immigrants", Forward, December 1974. p. 8.
13. J. W. MacNeil (Sec. of the Federal Ministry of State for Urban Affairs, as quoted in The Globe and Mail, September 25, 1974) p. 5.



RACE TO RACE

It was like a voice from the past. Here was the president of the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complaining that too many Chinese were getting into medical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and squeezing out qualified Canadians. Right behind her, the establishment medical journal, *The Medical Post* was suggesting that the disproportionate number of Chinese in medicine was undemocratic and a bad ethnic mix. Bringing up the rear was Morton Shulman, MD, crusader of public causes, saying quotas should be enforced to control the number of non-citizens allowed to enter the medical field in Ontario.

The rumbling could be heard all over town. Dr. Daniel Hill, former chairman of the Ontario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called the statements irresponsible and a cheap shot. Civil rights leaders representing groups like the Committee Against Racism came out denouncing them as discriminatory and racist.

Both Dr. Bette Stephenson, now Ontario Minister of Labour and Dr. Shulman have since said they dislike racism, but in Chinatown, their comments had already been taken down and mentally registered. For the older Chinese, the display of hostility took them by surprise, coming at a time when they thought things had changed and the days of exclusion, head taxes and lynchings were behind them. Just when they could begin to forget, they thought, the bad old days were coming back again.

In many ways, this is a wrong way of thinking. The younger ones will tell you that life is much better than it was twenty or thirty years ago. After the immigration law was repealed in 1947 and restrictions on immigration lifted in 1967, the Chinese have been moving

up the socio-economic ladder, maneuvering themselves into position to reach the 'mountain of gold'.

I can assure you that we Chinese are getting into the best of places nowadays. We now have many Chinese doctors, Chinese lawyers, Chinese architects, Chinese politicians, even one or two judges and mayors. This is to show you we Chinese aren't backward and unassimilable, to show you we are in the mainstream of life; even in the upper stream, so to say.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Toronto is estimated to be over 50,000, a figure that has more than doubled in the last ten years. On the one hand, there are the newly arrived immigrant workers, mostly from Hong Kong, who often get caught in the squeeze between two layers of society. They are kept at the bottom of the larger economic system because job skills,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s are credentials they lack to buy their way out of the Chinatown ghetto. Once locked into the Chinatown structure, they are at the mercy of the Chinatown merchants, condemned to sweat out a meagre living in its steaming kitchens and laundr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the new middle class Chinese, who, along with their Horatio Alger aspirations, are making it out of Chinatown into suburban bliss, carving out a comfortable niche in the upper rungs of the socio-economic ladder. For them Chinatown is a nice place to shop, have brunch, see a movie and more importantly, leave.

The situation in cities across Canada like Montreal, Vancouver and Calgary is much the same. Chinatowns all over mirror the larger social structure -- different class backgrounds, cultural values, degrees of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status quo of western society -- all these factors aggrav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town into a unified community, particularly in Toronto, which houses the country's largest Chinese population.

It is hardly surprising, when you consider the mix you're talking about. There are the native-born who frequently speak only English and orient themselves to the western culture. As a result, they get chastised a lot by the Hong Kong and Taiwan born. There are the Hong Kong and Taiwanese who can't understand the dialect of the Toishanese. The native-born disdain both the Hong Kong and Taiwanese crowd for importing their 'colonial' ways. Add to this the various social groups, business groups, sports groups, political groups, social service groups and even non-groups the Chinese engage in and you get the picture. The only time the Chinese are Chinese is when they are compared by whites to other minority groups and usually as the minority other groups should emulate. It is a comparison that makes them uneasy during the best of times, for it hasn't always been a 'success story'. The past treatment of the Chinese in Canada is riddled with hardship, repressive legal action and racism.

More specifically, formal legislation against the Chinese started in 1885 whe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gave in to pressure from British Columbia and imposed a head tax on Chinese immigration which rose from \$50 in 1885 to \$500 in 1903. Four years later, this head tax was extended to other Asian



Courtesy of Bancroft Library

groups. In 1923, the passing of the Chinese Immigration Act almost stopped the entrance of Chinese into Canada, so that by the time the law was repealed twenty-four years later, aside from the Canadian-born, some diplomats, students and merchants, only eight Chinese gained entry into Canada.

At the same time Canada virtually closed its doors to Asians and other non-white groups, it opened them to European and British immigrants. By the later 1950's, when more favourable regulations were introduced to encourage British, U.S. and European immigration to fulfill growing labour demands, the discriminatory policy against Asians and Blacks was maintained to keep out those 'belonging to nationalities unlikely to assimilate.'

However,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oints system in 1967 which abolished national and ethnic quotas, gone was the formal discriminatory factor of previous immigration policie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expansionist policy, Canada's non-white population has mushroomed five, six, seven times over and the sudden influx of people from Asiatic and non-European countries has meant that where nine out of ten immigrants in 1967 were from Europe,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has now been reduced to only four out of ten.

It is this changing character of immigration that is the centre of much discussion on immigration and the basis for a federal re-thinking of existing immigration policy. In the past, two questions have

been crucial in determining immigration patterns-- Does Canada need immigrants, and if so, who should get in? On the first question, it is no secret that the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 vested interest in immigration and past immigration policies have supported business with a ready supply of cheap immigrant labour. Immigration in turn has been dependent on the state of the economy, with the gates open in times of prosperity and closed during periods of deep recession. However, it is this second question which pinpoints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real concern in their proposed immigration bill. That is, with the sudden influx of people from Asia, India and other Third World countries and a downward turn in the economy, was the abandonment of its race and ethnic quotas a good move?

In 1967, when Canada's economy had room for expansion, an open-ended immigration policy made sense, but as the proposed immigration bill called Bill C-24 indicates, not anymore. While the bill acknowledges Canada still needs immigrant labour, Bill C-24 stresses immigration flow will be based on a scheme that would move immigrants into pre-arranged jobs or jobs that continue to remain unfilled in Canada's hinter regions. Apart from relying on the labour market for immigration needs, it will be used to justify a policy of providing work visas for foreign workers to satisfy the demand for cheap, temporary labour.

This policy of restraint hardly comes as a surprise. Gone are the days when an expanding economy provided a ready cushion against moderate rates of un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In its place is a deepening of the economic crisis that is leading to growing uneasiness among workers who have been led to believe immigrants are cutting into the labour market.

Certainly the government planners are concerned about a tight job market facing Canadians and when Canada's poor economic performance set unemployment figures up with no relief in sight, the wheels were set in motion to get tough on immigration quotas. As in the past, immigration is the first place the government looks to take some of the pressure off a tight labour situation. As a result, immigration quotas will be reduced and in the jargon of government bureaucracy, instead of ceilings or levels, 'target levels' will be maintained. (This is already in effect where 'target levels' have dropped from 218,000 in 1974 to 150,000 in 1976).

Meanwhile, those immigrants who get in will be channelled where business needs them-- into regions with labour shortages and low wages, without a choice in where they want to settle. In addition to controlling the flow of immigration, the government has indicated a hard-line approach to illegal immigrants. Foreign students and visa holders who change courses or take jobs without authorization will be subject to deportation. Also, immigration officials will have the authority to conduct searches without warrants and those suspected of engaging in subversive activity, will be kept out, or if here deported.

Suffice it to say that the increased concern for more restraint on the flow of immigration is reciprocated by an equal concern for race and only adds fuel to the myth that non-white groups are

unassimilable. For unlike other immigrant groups, after a couple of generations, Asians and Blacks do not melt into the vast genetic pot. They do not disappear. Colour serves as a stigma in a way language and ethnic background do not. Indeed, skin colour and distinct racial features have taught the non-white a fact that escapes most whites -- that despite the apparent lax attitude toward minorities and the rhetoric of equal rights for all -- below the surface of society lies a layer of racism that emerges when certain conditions are present. Certainly unemployment, rising living costs, housing shortages and urban crowding are some of the problems affecting all members of society, but when they are used by the system as the rationale for cutting back on immigration, they also contribute to a climate of racism. To have people believe the myth that immigrants are the cause of many of our social and economic ills is far easier to convey than an analysis of the market system under capitalism, even though such an analysis when undertaken would reveal that immigrants are incidental to the problem. But the myth will continue to gather strength simply because immigrants are easily identifiable by their distinctive traits (read colour) and lack any mechanism to defend themselves. Besides, if immigrants weren't the cause -- then why would the government move to limit their numbers?



So far, the bulk of racist slurs and attacks have been aimed at the Indopakistanis. Ignorance of their culture and history seems to justify the open scorn and assaults a liberal country can discharge. Part of this ignorance is based on a growing fear -- fear that groups who come from impoverished Third World countries will take away the few jobs and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to native Canadians. It is a fear that divides and weakens a society already afflicted with many ills -- ills caused not by immigrants, but whose roots lie within the built-in deficiencies of the system itself. The government, instead of dealing with basic issues like the economic slump of labour unrest, would rather divert attention onto an identifiable scapegoat -- immigrants.

Bill C-24 then raises important issues to which the Chinese, and here we include Asians, Blacks and other minorities, should address themselves. It reasserts the concept that immigration policy is dependent on economic interests and marks a return to the discriminatory policy of the past. It also contributes to an atmosphere of antagonism between white and non-white peoples and further weakens a society already divided and plagued by rising unemployment, inflation and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quality of life.

To ensure that the concept of a multicultural and equal society does not turn into an empty slogan, the discussion should be re-opened to ensure that immigration policy not be entrusted to business interests and guarantee that an anti-racist position be maintained.

This is the only course available if we are to ensure that skin colour is no more a basis for entering into soci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than hair colour. The immigration policy and its nemesis racism are powerful weapons with which to divide white and non-white groups. Only by revealing them for what they are, can we begin to deal with the really important social and economic issues awaiting us.

By Mei Hua

EDUCATION IN CHINA



'China's Road to Modernization' was the topic discussed in one of the forums held during 'China Week '77', organized by the Chinese Students' Associations of seven Canadian Universities. (1) The guest speaker was Professor Kong Shiu-Loon.

Although the topic scheduled for discussion was a general one, the discussion readily shifted to education, with some digression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so-called 'Gang of Four'.

First, Professor Kong pointed out that education in China was integrated with productive labour and the 'up to the mountains, down to the rural areas' movement. This movement, started wit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1966, sent large masses of youngsters across the country to the rural areas. It served two objectives--national defenc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ince 1949, power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have been watching China carefully to elicit any advantages where possible. Recently, there have been problems along the national boundaries abutting the Soviet Union and India. The question of re-alloc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nd population was, therefore of utmost importance to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The patter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was based on one with many centres as opposed to the 'point line' pattern adop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his was done to reduce the destructive effects of cross continental missiles armed with nuclear warheads. Multi-centred development in China thus took the form of the organization of communes and brigades, which required a strong central government to issue regulatory directives.

With reference to universal education, Professor Kong estimated that about seventy per cent of the total national population had received a basic education. (This is a more conservative estimate than that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This represented a tremendous improvement over the situation of 1949, when this figure stood at four per cent. As a result, many people have begun to use quantitative facts and figures in speculative estimation. As well, national pride and confidence has also grown.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Professor Kong, advanced education in China prospered in the fifties. Teacher-training, research and the learning of more advanced skills and theories saw unprecedented progress, and provided significant input into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During the sixties however, natural disasters coupled with unfavourable human factors forced China's advanced education into a state of standstill and confusion. Not only had crops failed and Russia withdrawn her experts, bu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dded its own disturbing impact. By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dvanced education was entering a period of groping for goals and forms. As long as goals and forms were unclear, advanced education would never realize its full potential. Therefore, the raising of educational standards (e. g. through greater enrollment and funding) would eventually stimulate the general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In the past few years, students have been selected through a four-stage process: application, recommendation by the masses; approval by the Party; and screening by the school. This procedure had some drawbacks. For example, many students who lacked basic knowledge made little progress even with individual tutoring from professors. China was concerned with trying to avoid the creation of elitist experts in the education of her youth. This meant that in structuring the educational system, school curriculum, administra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China would face a different set of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from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Professor Kong pointed out that a sound educational plan geared to national needs of the time and a sound administrative framework were essential to the upgrading of China's education. This however, would not be forthcoming without an environment of stability. In recent year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undergone a re-shuffling of personnel. The people whom the 'Gang of Four' had placed in the ministry was thought to have caused much damag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education. This was evident from the information released recently by the students of Qing Hua University and Peking University.

With the 'Gang of Four' out of power and criticized, education in China would grow afresh. It is likely that new arrangements will be made to enable graduates from overseas universities to return to China to work.

Finally, Professor Kong felt that in a complicated and large country such as China, any analysis of her problems must be careful and devoid of emotion and prejudice. If we confront ourselves with both China's negative and positive points honestly, then the ground will be broken for us to really understand China. ■

By Fong Che-kao

NOTES

1. Consisting of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Ottawa University, Waterloo, McGill, Queen's, Carleton and Algonquin College.

Impressions Of Toronto's Chinese Press

By Eric Walsh

To a non-Chinese, the most remarkable thing about Toronto's Chinese press is the seemingly monumental task of physical production. There is a constant buzz of activity as the typesetters move among the long banks which contain over 10,000 characters, making up or taking apart the galleys for each days edition. As if this feat of skill and memory were not enough, the men who perform this demanding job must be able to recognize each character backwards (the typefaces being backwards from the printed letters). Massive black letterpresses churn away like hoary remnant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verything, even the writing of individual stories, is done by hand.

For someone familiar with the relative ease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typewriters and offset production, the expenditure of all this labour symbolizes the high price which must be paid to ensure the survival of a non-Western culture in a North American environment.

As an English-speaking Canadian who must constantly question the meaning of my own identity, I'm frankly envious. As a journalist, I'm heartened by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press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as a believer in democratic forms of government (whatever their economic basis), I'm happy to see a diversity of opinion and a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both essential to the preservation of an open society.

The press in Chinatown consists largely of two dailies. Shing Wah, a fifty-four year old paper, takes an editorial stand supportive of the Taiwan regime. The Chinese Express is a much more recent addition to the ethnic press and was founded by a former Shing Wah editor, Robert Chow, to escape the whole issue of Asian politics. In some ways, the papers are very similar though. Both are produced six times a week, run to sixteen pages, have circulations of over 5,000 copies each, and maintain offices in Chinatown. (The Express has its printing plant on Wellington Street, just a block away from the back door of The Globe and Mail, where its editor, Chow, works full-time). To a graphically trained eye, the layout and general appearance of the papers is similar.

Both have benefited from the influx of Chinese-speaking immigrants in recent years, a change which has caused the Chinese community to grow from 15,000 in the early 60's to over 50,000 today. They've also done well from the accompanying commercial boom which has taken Chinatown from the point of near extinction and sent it sprawling along Dundas Street to Spadina Avenue.

Not surprisingly, both are typical "booster" or family newspapers, dedicated, in much the same way as The Toronto Star is, to development, and a don't-rock-the-boat and don't-knock-the-advertisers philosophy. Local coverage takes up a fairly small portion of both papers: each has only three or four local reporters and investigative pieces are rare (with the occasional exception in the Express). Much of the content is unabashedly borrowed from the Toronto papers and the wireservices.

The differences are subtle but real. The Express takes a neutral editorial stance on the mainland-Taiwan conflict, an issue still very much alive for many Chinese-Canadians. Editor Chow recognises the fact that for many immigrants and citizens though, the problem is something to be forgotten or at least, de-emphasized in favor of a more balanced, typically Canadian role--simply reporting the news.

"Most Chinese-Canadians don't want to be involved in politics. That's why they came here. Most just want to earn a decent living," says Eddy Sin, the Express's shop manager.

"In Taiwan or Hong Kong, we'd have to adopt a point of view. Here we can simply report the statements of both sides," he adds.

In a sense, the Express is a second generation ethnic paper--geared to keeping alive the language and the community, but not immersed in the struggles which brought many here in the first place. A general comment on ethnic newspapers made by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Mass Media's report, The Uncertain Mirror seems to apply specifically to the Express.

"Ethnic editors conceive their first purpose... to be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heritage of the old land. Paradoxically, their parallel purpose is to facilita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newcomer into the Canadian mainstream."

The same report goes on to talk about the difficulty of reconciling these two apparently contradictory goals. It describes the biggest challenge to ethnic editors as the needs, "to facilitate each group's cultural survival without perpetuating ancient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schisms. Unhappily, for a dwindling minority of ethnic editors that is precisely the name of the game.

Shing Wah appears to belong to this last-named minority of ethnic newspapers. It's arguable, of course, that its editorial stance against communism doesn't differ greatly from those of many other Canadian newspapers on the same subject.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in Canada, the red menace is generally seen in a somewhat different light and that, the military schemes of a few remaining members of the Kuomintang aside, the situation is likely to stay as it is in Asia. It's almost as if a few ancestors of Englishmen who had been forced to leave America after the revolution had got together and founded a newspaper to decry the tragedy and injustic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o muster support for an invasion to put the rebels in their places. It's tragic, it's regressive and it makes its supporters look less like willing Canadians than reluctant exiles. Such views don't create good citizenship (or help the original problem).

No look at the Chinese ethnic press would be complete without a glance at the Chinatown Commercial News, a bi-weekly with a circulation of about 2,000 copies which is, despite its name, not a commercial paper at all. Located in a bookstore on Bathurst Street (it's not even listed in the Yellow pages as a newspaper) which sells left-wing literature, it's run on a voluntary part-time basis by a collective editorship. It was founded ten years ago to fill the need for a strictly community-oriented newspaper (as opposed to one which reports o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vents.) Its goals are not purely the dissemination of left-wing viewpoints (although I'm told it takes an editorial stance supportive of the mainland), but "to increase the Chinese contribution to Canadian life" and to serve the local community, as its editors say.

It seems to be roughly similar to the small papers which serve small towns and suburbs, usually on a weekly basis, with the kind of reporting that is limited to events of a purely local nature. The Mirror papers in Toronto's suburbs are a good example.

It seems to be performing some kind of service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just looking at its longevity (small papers generally don't have an easy time of financial survival, especially ones run by volunteers) and its circulation figures. And if it does take a leftist outlook on local or international issues, then it's fairly unusual among Canadian newspapers of any description, and is valuable for its alternative viewpoint.

One aspect of all the papers which struck me was the somewhat informal approach of reporting. A good deal of the local news comes directly from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Although this technique of news-gathering would probably be looked askance upon by most English-speaking journalists, it shows just how much people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regard their newspapers as important. It also shows how the newspapers serve as a focus for the life of the community.

One other thing mentioned repeatedly by the people in the business is the degree of competition which three papers from New York are presenting to the local press. Since these papers don't offer any local news at all, it must be that they are providing other news, possibly international, which the community feels some need for. This is a complaint common to the readers of many Canadian newspapers--less world coverage than we would like to get.

In closing, I'd like to apologise for the limited scope and somewhat superficial approach of the article. These are only impressions, based on limited research and hindered by a total lack of knowledg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a fairly serious drawback, I confess. But I think I've made the point that the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oronto is reflected, preserved and enhanced to a great degree by the presence of an active and free press. It's hoped that this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case and that new forms of communication (such as Crossroads) will add to the confidence and sense of identity of the Chinese-Canadian community as it struggles to survive in a much vaster and more powerful North American society.



"SHAKING AND DOING"

IN CHINATOWN

Although much has been said and written about the future of Chinatown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social need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Canada, little has been said about how these 'needs' are determined. Are the ways social needs met the result of a real response to real problems such as that of poverty or racism, etc. ? or are the ways social needs are met reflections of management and manipulation by certain classes of people and groups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se questions will come up more and more, as the population continues to expand and competing organizations seek money from outside sources such as th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I propose that instead of going forward in time, we should go backward a bit and see how the 'needs' of the community have been traditionally managed. (Notice that I do not use the word met.)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hort introduction, I will distinguish between four historical periods of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in Toronto's Chinese community: 1870-1911; 1911-1937; 1937-1959; and 1959 to the present.

These are quite rough and yet represent in entirety a certain pattern as follows. From 1870-1911, there was the arrival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working-class after the extension of the railroads and their drift eastward, bringing with them their society and organizations. This was manifest i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political groups, secret societies, merchant-class organizations and gangs for community control. In this period, all of these groups tried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ir respective members who were mostly single labouring men, by providing gambling, hotels for the traveller, classes in literacy, physical education, etc. 'Needs' during this period can be described as being met and managed by traditional urban groups whose contact with the outside society was minimal. These groups were thus responsive to their membership and little

noticed by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Of course, certain activities such as gambling and opium smoking tended to come to the attention of external forces (police). This was tolerated because of the historical tolerance for cheap labour by the external society.

From 1911 to 1937, came the cre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actually political associations existed prior to this, but the party as a recognized entity does not). To all previous needs could now be added the additional one of political fund-raising (or extraction/ extortion as some call it) for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uo-mintang). However, other groups in Chinatown disputed the Nationalists right to supervise all political needs within the community, some in effect arguing that their particular social needs came before the right of one party to decide what should be political priorities.

Then during the period starting with 1937, there took place the political colonization of Chinatown by the Nationalists and the clamping down on groups such as secret societies and traditional small group-oriented associations in favour of dictatorship by one group. The word 'colonization' here means that the Nationalist party had essentially become the only spokesman both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for the whole community, and that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needs of traditional groups and political factions became visible to the outside society only as the Nationalists deemed necessary. It acted as 'boss' and 'spokesman' for the community.

Even at the present time, many want to act as 'spokesmen' for the community, but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hows that those who vie for this position or some other visibility in the 'power structure', are usually trying to do it for their own benefit -- Beware of the 'spokesman'.

The last period is the most important, for it brings us from 1959 to the present day when the migration of new diverse populations and new money brings the emergence of new groups -- professionals and political money-getters who are set upon the road of parasitism: Getting publicity and government recognition instead of first putting down solid roots and trying to help isolated poor people. No wonder many become cynical when these power-games are given out as 'The Way Thing Are'.

For every dedicated social worker, there seem to be two or three bigmouths and publicity hounds who crave such titles as 'the spokesman for the community'. In the 1940's and 50's, the last spokesman for the community was Chiang Tzu-t'ien (Chong Ying, as he was known to most Canadians). Perhaps a name unfamiliar to most young in

the community, but a man who due to his extensive political connections, was able to perpetuate the political silencing and economic suppression of other groups, as well as misrepresentation of the community to the world at large. "How 'peaceful' it all was in those days!"

Many people would like to picture the present period as one of chaos due to the presence of generation and class conflicts in the community.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hows tha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since 1931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ty has been able to breathe in fresh political air, freely.

How long this will be possible depends upon how political life evolves. Perhaps new conditions will arise in which powerful folk can spring up to 'lead' and 'speak' for the community once again.

By Lau Bo

University of Toronto - York University

Joint Centre on Modern East Asia

in cooperation with

Woodsworth Colleg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ents

SUMMER SCHOOL 1977

Courses:	EAS 100	Modern Standard Chinese I
	EAS 200	Modern Standard Chinese II
	EAS 290	Mandarin For Non-Mandarin Speakers
	EAS 332	Modern Standard Chinese III
	EAS 120	Modern Standard Japanese I
	EAS 220	Modern Standard Japanese II

For further details of dates, times, location, eligibility,

Please write: Joint Centre on Modern East Asia
14213 Robarts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Ontario

Or phone:

667-2329 or 978-6820

Act now! Admissions close May 13th, 1977

Letters

Dear Readers:

Recently I read the first issue of Crossroads and found it very informative reading. As this society is a multi-racial one and it is appropriate for journals, periodicals, etc., to be published by the many national groups in our land. Crossroads, like many others can endeavor to expla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here in Canada to the entire community. The English section is of special interest to me and I hope it will be enlarged in due time.

Good luck to all the editorial staff and others putting together the magazine and Happy New Year.

S. P. Segal
York University



The Changing Face

Of Toronto's Chinatown

Ever since there has been an identifiable Chinese community in Toronto, that community has been under siege from the pressures of white dominance, unjust immigration and downtown redevelopment. The Chinese as an ethnic group, small though it is, has a long history in Canada. There has been a Chinese immigrant group living in Canada since the 19th Century and in Toronto, since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 early Chinese immigrants worked as miners in gold mines. When the gold mining industry began to decline, quite a number of the Chinese workers joined the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to build the railway, while the rest worked as servants, farmers, laundry and restaurant workers. These early immigrants usually came from one of eight districts in the province of Kwangtung, southwest of Canton in southern China. Poverty and overpopulation were the main causes for their emigration. The daily wage in China was seven cents a day and they came to Canada with high hopes for betterment. The popular name for Canada was 'Gum San', which meant land of the golden mountain.

Sir John A. MacDonald told the House of Commons, "without their (the Chinese) help, there is no saying when the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and the mines of the east would have been developed." As it was, it was completed in a record five years. Upon completion, however, thousands faced unemployment. Many Chinese did not have enough money for even

the passage home. Many were obliged to change occupations and drifted into such fields as market gardening, domestic service, fish canning or back into mining.

Persecution followed these people from the time of their arrival. In 1875 an act was passed forbidding them to vote in provincial elections. They were barred from entering certain professions such as law and pharmacy and until recently, racial discrimination has limited the choice of residence for many Chinese.

In 1879 and later in 1885, Royal Commissions were appointed to examine the question of Chinese immigration. Evidence showed that not only labour, but also employers, professionals, merchants, farmers and politicians were in favour of total exclusion of Orientals. They felt threatened by their growing numbers. Then on July 20, 1885, the federal government passed the first of many acts to officially restrict Chinese immigration into Canada, by imposing a head tax. Other restrictions were extended to sea-going vessels which could carry no more than one immigrant per thirty tons of cargo. (1) By 1923, the Chinese Immigration Act was passed, which prohibited the ent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with few exception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railroad, jobs became scarce and the competition high for jobs in the fish canning, domestic service, laundry and restaurant fields. The competition came not only from the large numbers of Chinese concentrated on the west coast, but also from the many whites who could no longer find enough work in mining and other related areas to sustain themselves. Many Chinese pushed eastward, establishing communities of Chinatowns in the major urban areas. This move eastward was also an attempt to escape the overt prejudice against them in the west.

When majority and minority groups are in conflict, in general, the minority tends to withdraw from the field of competition in the long run and shifts to more or less non-competitive fields in order to survive. (2)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it was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a hundred Chinese in the city of Toronto. The first known Chinatown area was on York Street between Queen and King. A few Chinese stores were established on Elizabeth near Queen. All were rented quarters. Reverend J. C. Speer, in a chapter from his book *The Story of China in Canada*, refers to Chinatown situated in the heart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cities, a condition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came at a time when the original residents were about to look for new quarters, their dwellings having become too

cramped or too dilapidated for the growth demands of modern times. The result is that while Chinatown is situated in the heart of a city, it is the most unattractive and squalid and forlorn of all places one can find. The most striking fact to an outsider at the time, was the absence of women and children.

By 1910, most of the Chinese in Toronto were males. Many were middle-aged and while some were married,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were in China. Most of the Chinese worked long hours, seven days a week in laundries and restaurants. Because the immigration laws prohibited family migration, the Chinese turned to tongs or associations for fellowship. The tong became a form of social service, offering welfare where necessary. Membership would be based on family surname or affiliation with people born in the same area in China. The high point for the tongs was in the mid 1920's. Then there were tongs of the Lee, Wong, Chin, Lem, Ing and Mark families and also the Lung Gong Brotherhood consisting of the Liu, Quon, Chong and Chu families. The Gee Duck Tong represented the Hum, Tom, Hoy and Tse families. Besides these, there were the regional groups such as the Kwong Chow Society and the Sing Bark Society. There were also numerous political groups, churches and the Benevolent Society.

Since schooling was not compulsory in the early 1900's, the little time left after a busy day at the laundry, restaurant or store was spent around Chinatown, the churches, tongs or the Central YWCA. By 1916,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Chinese in Toronto had reached two thousand, enough to support two churches. By 1920, Chinatown had moved north on York along Queen. Development on York Street had started to take over the lower part of the original Chinatown.

By 1930, Chinatown had spread to Elizabeth from Queen Street and along either side of the south side of Dundas Street in a 'T' shape. To visit Elizabeth Street in its heyday was like taking an excursion to the Orient. Both sides of Elizabeth Street were lined with Chinese establishments of all kinds, including herbalist shops which dispensed an astonishing variety of remedies and nostrums from the Far East. The community supported two daily newspapers, the Shing Wah Daily News, financed by the Kuo Min Tang and Hung Jung Bao, run by the free-masons. To many, the Chinese newspaper represented their link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oronto also supported a Dramatic Society, a popular place frequented by both father and son. Chinese from all over Ontario travelled many miles to attend their performances. Because women were so few, female roles were played by men dressed as women and singing in a falsetto voice.

In 1940 a wave of Chinese joined the Toronto community. Over fifteen hundred Chinese came from the west coast and middle west to find job

opportunities after the depression. While some were from the homeland, a large percentage were Canadian born.

It was about this time the city started to buy up or expropriate land on Elizabeth Street starting from Queen to Albert, Albert to Louis and Louisa to Hagerman Streets. The businesses moved up to Dundas between Bay and Centre Street. Many people were affected by this expropriation either through loss of dwelling or business. At that time, the city promised the Chinese that they would not force out Chinatown. However, a by-law was later passed and proved otherwise.

In addition with the influx of immigrants, there is a social mobility upward and out of the district. This mobility is from the interior of the district to its fingers or suburbs and many move out as soon as they are socially and financially established. (3)

In the Toronto community, the 'bulldozer' forced out some residents, but as the children became educated and established in jobs catering to the general public, they moved out of the core area to Etobicoke, Scarborough and Don Mills.

Today the new City Hall built in 1964 stands on the site which used to house over half of Chinatown. Those pushing northward soon found themselves squeezed again by hospital expansion. A greater number moved west of the mushrooming office buildings of University Avenue. But the re-located community lacked a focal point such as Elizabeth Street had provided. In 1969, new leadership for the Chinese community came from an articulate newly assertive generation of young Chinese-Canadians who had learned the values of their distinctive community and were willing to fight for them. Save Chinatown Committees and the United Action of Chinese-Canadians brought hope to the threat of encroaching developer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north of City Hall. They sparked new concer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downtown working class neighborhoods. On June 15, 1969, three hundred and fifty Chinese-Canadians went to City Council in hope of retaining the area north and west of City Hall. They fought the proposed fifty-four foot widening of Dundas Street which would have eliminated the south side of Dundas.

Because of its close proximity to City Hall, it is very hard to turn down the high prices that developers can offer. Two million dollars was paid for the half block between Chestnut and Elizabeth Streets, north of City Hall. It was purchased by Circuit House, representing anonymous Swiss investors and a Holiday Inn was constructed on the site.

A thriving new commercial axis has sprung up along Dundas Street west to Spadina and north and south along Spadina. There has been a similar expansion to the Broadview area. Grocery stores and restaurants abound. In 1975, the Mon Sheong Home for the Aged was officially opened within this new downtown core, with funds provided by the municipal, provincial and federal levels of government as well as companies like the CPR. More importantly, over \$250,000 was rais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ty.

Six years ago,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Chinatown' was formed. It became the Toronto Chinatown Business Association in 1971, with a basic group of twelve businessmen from old Chinatown. Now with Chinatown expanding and the influx of new immigrants, the association is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Toronto Chi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 Its membership has multiplied more than ten times over and has become a united voice for the business community representing a broad spectrum of Chinese interests. The goals and objectives of the association are:

1. to promote trade and busines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2. to improve and develop the welfare and faciliti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3. to unite the Chinese business community by promoting a genuine spirit of cooperation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different trades and professions.
4. to promote contacts and exchange between local Chinese business and that of overseas.
5. to interpret and to keep members informed of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which are of concern to them.

It was this group that gained government consent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Chinatown. It petitioned the government to withdraw the plan to widen Dundas Street. It negotiated with the city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arking spaces on Elizabeth Street, as well as Chestnut and Centre Streets and requested more flexibility on matters concerning labels on import goods and negotiated with the government Public Health Department for an extension of time for local barbeque shop owners to design and construct special heating and cooling systems to preserve the original taste of barbequed meat. Recently, it worked closely with City Council to design Chinese street signs in the downtown core. During Chinese New Year, the association becomes the coordinator of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s for the whole Chinese community. Plans are underway for another Choy Sun Parade and lion dance with active participation by association members.

NOTES

1. Canada Statutes 48-49. Victoria, Chapter 71.
2. D. Y. Yuan, "Voluntary Segregation: A Study of New York Chinatown," in Milton L. Barron Ed. *Minorities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Alfred E. Knopf, 1967). p. 267.
3. W. E. Mann, *The Socail System of a Slum: The Lower War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1).

By William P. Wen

Bookroom

思雅舍
書舍

Sapere Aude

- HISTORY
- POLITICS
- LANGUAGES
- PHILOSOPHY
- LITERATURE
- CHINESE PRINTS
- CHINESE PAINTINGS .etc.

— MAIL ORDERS WELCOME —



205 DUNDAS ST
SUITE C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G 1C8
TEL: 598-0296

OPEN DAILY FROM 11:00 am to 8:00 pm

We Specializing in Chinese & Asian Books

The Crossroads is published monthly by The Crossroads Publishing Company at 205 Dundas Street West, Suite C. All rights reserved. Contents may not be reprint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Subscription rates: one year \$9, library and institutions \$13. (Outside North America, second class air mail \$20). To change your subscription address, please send your new address with your old address to The Crossroads, at least six weeks before you move. Manuscripts should be between two to four thousand words in length and will not be returned unless accompanied by a self-addressed envelope.

SAI-WOO Restaurant

製作精良

FAMOUS DISHES

裝置華麗

SEA FOODS

CHOP SUEY

SWEET AND SOUR



10% Off For Take-Out Orders
Special Businessmen's Lunche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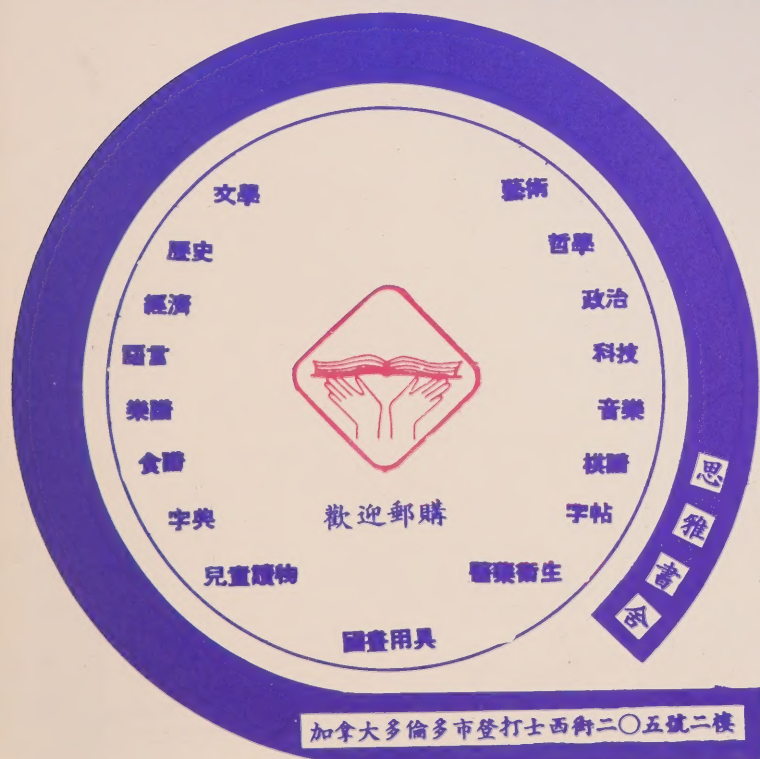
SAI WOO

Restaurant

加拿大安省多倫多市登打西街一二四至一三〇號

124-130 Dundas Street West, Toronto, Canada

M5G 1C3 Phones: 366-4988-9



三國演義 (羅貫中/人民出版社/二冊)	\$ 5.10
三國志演義 (羅貫中/香港商務/二冊)	\$ 5.25
三國人物與故事 (倪世槐/三民)	\$ 1.90
儒林外史 (吳敬梓/香港商務)	\$ 2.90
老殘遊記 (劉鶚著/香港太平書局)	\$ 2.40
西遊記 (吳承恩/香港商務/二冊)	\$ 4.90
徐霞客遊記 (徐宏祖/香港商務/精裝)	\$ 4.90
前漢演義 (蔡東藩/香港太平書局/二冊)	\$ 3.20
後漢演義 (蔡東藩/香港太平書局/二冊)	\$ 3.20
鏡花緣 (李汝珍/香港中華/二冊)	\$ 3.90
全清詞鈔 (葉恭綽編/香港中華/四冊)	\$ 16.00
全清詞鈔 (葉恭綽編/香港中華/精/二冊)	\$ 18.50
小說詞語匯釋 (中華書局/精裝)	\$ 10.00
詩詞曲語辭匯釋 (張相著/中華書局)	\$ 6.00
國學十二講 (曹聚仁著/香港三育)	\$ 5.25
毛詩正義 (六冊/香港中華書局)	\$ 14.00
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 (宏智書店)	\$ 6.40
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 (宏智書店)	\$ 6.80
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 (宏智書店)	\$ 8.00



風景 (木刻)

陳少萍

